

# Translation Quarterly

---

No. 89 2018

香港翻譯學會出版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翻譯季刊

二〇一八年  
第八十九期

《翻譯季刊》

二〇一八年九月 第八十九期

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Translation Quarterly*

No. 89, September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2018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ISSN 1027-8559-89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has entered into an electronic licensing relationship with EBSCO Publishing, the world's most prolific aggregator of full text journals, magazines and other sources. The full text of *Translation Quarterly* can be found on EBSCO Publishing's databases.



# 翻譯季刊

## *Translation Quarterly*

香港翻譯學會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 創刊主編 **Founding Chief Editor**

劉靖之 Liu Ching-chih

### 主編 **Chief Editors**

陳德鴻 Leo Tak-hung Chan 倪若誠 Robert Neather

### 副主編 **Associate Editors**

陳嘉恩 Shelby Chan 李 波 Li Bo  
李德超 Li Dechao 劉康龍 Liu Kanglong

### 編輯委員會 **Editorial Board**

嚴康焯 (主席) Foster Yim (Chairman)  
潘漢光 Joseph Poon 鄢 秀 Yan Xiu Jackie  
李忠慶 Lee Tong King 邵 璐 Shao Lu  
洪蘭星 Stella Sorby

### 顧問委員會 **Advisory Board**

劉靖之 Liu Ching-chih Mona Baker  
林文月 Lin Wen-yueh Cay Dollerup  
羅新璋 Luo Xinzhang 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謝天振 Xie Tianzhen Wolfgang Lörcher  
楊承淑 Yang Chengshu 沈安德 James St. André  
馬悅然 Göran Malmqvist

### 編務經理 **Editorial Manager**

馬偉東 Tony Ma

## 編者的話：

觀乎當今的翻譯研究，譯者不單不再隱身，更益發顯露出「叛徒」本色。如果翻譯果真是叛徒，那「翻譯」背叛對象是甚麼？如果是僅僅是原文的話，原本語言系統如何衡量另一個系統的適當性？如何以系統之內決定系統之外？各個語言系統互不相容，甚至排他，這給翻譯活動敞開了改變與創造的空間，顛覆了原文與源語文化在譯語文化的再現與接受。

本期共收錄四篇論文，研究文類和題材各異其趣，但不約而同地闡論了以上的主題。在開卷論文中，潘韓婷與張美芳就言語角色與功能、情態類別與情態取向等人際參數，考察了澳門三個政府機構在非典期間發佈的公示語及其翻譯，進而提倡“因勢制譯”，譯者不妨按照譯文發佈機構的角色、地位與公共關係，再考慮社會的文化語境，從而制譯翻譯策略。傅莉莉借鑒勒弗菲爾的“再書寫”論述，分析了上世紀三十年代兩部漢譯英的左翼文集：《活的中國》與《草鞋腳》，揭示了譯者如何透過作品選擇、副文本編輯、作家形象“塑造”及特定翻譯策略等手段，如何帶領中國現代文學“走出去”，當中中國的形象如何轉變，以及西方讀者如何接受這種“再現”，皆值得深思。先鋒派小說家馬原的“元小說”不啻是一種翻譯，他著名的“馬原圈套”襲仿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的迷宮敘事，交錯敘述幾個似乎不相關的故事，去掉全知的敘述者，並把小說的形式因素凌駕情節因素之上，暴露小說的虛構本質。他的代表作〈岡底斯的誘惑〉由Herbert Batts譯成英文，譯文大幅修改，改變了原著“自我指涉”的特色；對此，William Gatherer在本期唯一的英文論文有翔實的闡析。劉曉萍與范琳則轉研翻譯過程與科技，回顧了近十年來翻譯過程中眼動研究的最新進展。傳統的翻譯過程研究主要採用有聲思維法，即譯者在翻譯的同時，說出自己採用的

策略和遇到的問題等，但是這種方法會打斷譯者的翻譯加工思路，而且譯者的思維稍縱即逝，不可能全面回溯；眼動技術可以實時記錄翻譯行為，快捷、客觀又準確，日漸廣獲青睞。

本期書評有劉康龍介紹 Michael Cronin 的最新著作 *Eco-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nd Ecology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2017)，該書結合經濟學、人類中心主義及氣候變化等多個方面重建歷史語境，圍繞“翻譯、語言與生態”這個問題考察進入人類世後翻譯的角色和作用。

創刊主編劉靖之教授所著回憶錄現刊至第三部份，回顧了七十至九十年代大中華地區翻譯的演變，以及香港翻譯教育的成長路。劉教授提出，香港的翻譯傳統是殖民的、商業的、生活化的，因此既本土，亦實用，這對華文翻譯學究、行業生態與教育方針，均影響深遠。

陳嘉恩

二〇一八年九月

目錄 CONTENTS

iv 編者的話

論文 Articles

- 1 因勢制譯：機構權勢操控下的話語生產——以澳門非典公示語為例 潘韓婷、張美芳
- 21 譯文集如何文學“再書寫”？——以中國現代文學譯文集《活的中國》和《草鞋腳》為例 傅莉莉
- 48 翻譯過程的眼動實證研究十年瞰覽 劉曉萍、范琳
- 73 “Translating Ma Yuan’s Metafiction: An Analysis of the Loss of Self-reflexivity in Herbert Batt’s Translation of “The Spell of the Gangdise Mountains” (“Gangdisi de youhuo” 岡底斯的誘惑) William GATHERER

## 書評 Book Review

- 100 翻譯學的生態視角——《生態翻譯：  
人類世時代的翻譯與生態學》評介 劉康龍

## 回憶錄 Memoir

- 108 香港翻譯學會創會的二十年(1971–  
1991)(三) 劉靖之
- 121 稿約凡例 Guidelines for Contributors
- 125 徵求訂戶啟事 Subscribing to *Translation*  
*Quarterly*
- 127 訂戶表格 Subscription and Order Form





# 因勢制譯：機構權勢操控下的話語生產 ——以澳門非典公示語為例

潘韓婷 張美芳

## **Abstract**

Discourse and Translation Manipulated by Institutional Power: A Case Study of Macao SARS Public Notices (by Pan Hanting and Zhang Meifang)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the detailed text analytical model by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SFL", Halliday 1985) and the macro theoretical model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Fairclough 1989; 1995),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ree samples of SARS notices and their translations released in Macao by three different institutions during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crisis in the first half of 2003.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the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in the post-colonial society of Macao discursively constructed and reproduced their own positions, as well as how institutional power influenced the discursiv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translation). Drawing upon the concept of interpersonal function in SFL, the writers conduc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ARS notices and their translations with a focus on speech roles, speech functions, modality types and modality orientation, the findings of which are interpre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DA.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findings is carried on to explore how institutional power constructs discourse with particular institutional features through the configuration of linguistic recours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research only reveals the mechanism of how institutional power affects discursive production (/translation) but also offers a reference model for bilingual or multilingual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 一、引言

機構話語是批評話語分析的重要研究對象。一般認為，機構話語的成文及翻譯是機構意識形態的載體，會受到機構權勢的牽制（Mayr 2008; Pan 2015; Zhang and Pan 2015）。為了驗證這個假設並瞭解機構權勢影響話語生產（包括成文和翻譯）的機制，本文以2003年下半年“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非典型肺炎的一種，簡稱“非典”）爆發期間澳門三家機構發佈的公示語（簡稱“非典公示語”）為研究對象，分析不同公示語文本的言語角色（speech roles）和言語功能（speech functions），以探討不同機構權勢在該交際事件中的角色和關係，以及它們對機構話語產生的影響。

選擇非典公示語作為研究對象的理由如下：一、在非典這個特殊時期發佈的公示語可視為交際事件或“社會實踐”（Fairclough, 1995: 133）；二、公示語文本體現的語言特徵和語言選擇應能反映不同機構的社會角色以及它們與受眾的關係；三、非典公示語作為典型的機構話語，應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它背後的機構權勢和當時當地的社會文化語境。

本研究從批評話語分析的視角，參照韓禮德（M.A.K. Halliday）系統功能語言學中的人際功能概念，特別是其中的言語角色和言語功能與情態兩方面，以分析上述的非典公示語。希望通過調查三家不同政府機構的公示語文本的人際功能的語言特徵，探討這些語言特徵如何反映所涉機構的社會特徵，以及這些語言特徵在該公示語產生的語

境中的社會作用。討論的重點是，機構權勢如何通過語言資源的配置來建構帶有機構自身特色的話語。

## 二、話語、機構權勢與社會關係

話語 (discourse) 是本研究探討機構權勢的關鍵詞。艾格 (Agar 1985) 和赫巴馬斯 (Habermas 1987) 等學者曾從不同的角度探討機構權勢，認為機構或組織通過話語對受話者施加影響。這一類研究從語言學及社會學的角度出發，視語言為建構機構的手段之一，也是機構用來創造與它相符的社會現實及社會認同的重要手段 (Mumby 1988; Mumby and Clair 1997)。菲利浦斯等 (Phillips, Lawrence and Hardy 2004) 認為，“機構通過話語得以建立”，“其手段主要是通過文本傳播有關行為的信息，並以此影響他人的行為”。

話語建構社會現實，這是批評話語分析的重要理論假設。菲爾克勞 (Fairclough, 1995: 133) 認為，話語集三個維度為一體，即文本 (text)、話語實踐 (discourse practice) 及社會實踐 (social practice)。文本可以是口語或書面語，話語實踐包括語篇的生產與解讀，社會實踐指話語在文化語境的作用。菲爾克勞關於話語的社會性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基於他所引入的韓禮德的系統功能語言學。例如，菲爾克勞把話語看成社會實踐，強調話語與社會的對話關係，認為話語代表了社會現實，並為社會現實建構了意義。這一觀點呼應了韓禮德關於“語言是反映事物的一種手段，也是構成事物行為的一種手段”(Halliday 1978: 2) 的看法。菲爾克勞還指出，批評話語分析應把話語置於社會語境，關注點應放在產生話語的社會因素，這樣才能發現隱藏在話語的權力及意識形態。他認為，因為語言使用的特點從廣義上說可以由“深層社會結構”

決定，而這個深層社會結構包括了階級之間與社群之間的社會關係，也包括語言建構社會機構的方式等 (Fairclough 1995: 62)。這一觀點再次呼應了韓禮德提出的在貼近文本考察的同時，把文本跟它的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相聯繫的原則 (Halliday 1994)。菲爾克勞等學者認為，系統功能語言學是目前運用到批評話語分析中最具影響力的語言學理論，這是因為，“系統功能語言學的語言觀較其他語言理論更符合批評社會學的角度” (Chouliaraki & Fairclough 2000: 139)，且“對研究語言的社會建構與文化孕育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在批評話語分析中的應用效果十分顯著” (Mayr 2008: 16-17)。

### 三、話語內的人際互動

話語的三維性質要求話語分析也必須是三維的，這包括 (1) 對文本的語言描述；(2) 對文本與話語之間的關係作出描述；以及 (3) 對話語過程與社會過程的關係作出解釋 (丁建新、廖益清 2001)。在對文本的語言描述上，系統功能語言學為批評話語分析提供了清晰的語法分析框架，因此，本研究借用了系統功能語法中的人際功能概念，考察非典公示語的人際意義及非典公示語澳門社會中所體現的人際關係。

#### A. 言語角色與言語功能

韓禮德在討論語言在交際場合中所扮演的角色時，把小句 (clause) 當作一個交換過程 (Halliday 1994: 681-105)，並認為，“在講話這個行為中，講話者為自身選定一個言語角色 (speech roles)，從而給聽話人設定了一個預定的輔助角色”。

言語角色根據不同的交際目的可以分為兩大類：(i) 給予 (giving) 和

(ii) 求取 (demanding)。給予和求取又可根據不同的性質分為物品/服務 (goods-&-services) 和信息 (information)。不同的交際目的和交換商品的搭配，形成了以下四種基本的言語功能 (speech function)：提供 (offer)、命令 (command)、陳述 (statement) 及提問 (question) (表1)。這四種言語功能反過來對應了說話人所期待的四種回應，分別是聽話人接受說話人的給予、執行說話人的命令、認可說話人的陳述，以及回答說話人的提問 (Halliday and Matthiessen 2004: 108)。不過這樣的對應並不是絕對的。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也可以通過陳述句 (主要的言語功能是陳述) 來達到求取物品或服務的目的，例如通過 “You’d better come in” 這樣的陳述句來提出命令 (Thompson 2008: 40)。

交流角色	交換物	
	(a) 物品與服務	(b) 信息
(i) 給予	提供	陳述
(ii) 求取	命令	提問

表 1：言語角色與言語功能 (譯自Halliday and Matthiessen 2004: 107)

B. 情態類別與情態取向

如果說言語角色和言語功能是人際互動的顯著體現，那麼情態 (modality) 則是人際互動在文本中具體而細微的體現。要理解情態，先要瞭解“歸一性”(polarity) 這個概念。歸一性指的是言語判斷中“是”與“否”之間的選擇，比如“是”或者“不是”(is/isn’t) 及“要”或者“不要”(do/don’t) (Halliday 1994: 88–99)。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的選擇並不局限於“是”與“否”，而是在是與否之間還存在不同程度的可能性，稱為“情態”，比如“也許是”和“可能不是”等。人們通過情把情緒帶入所傳遞的信息當中，把信息定性，並表達不同的態度與判斷 (Mayr 2008: 19)。

韓禮德(Halliday 1994: 88–99)將情態分為兩類：命題(proposition)與提議(proposal)。命題是指用言語來傳遞某種信息，跟情態化(modalization)相關；提議則指語言交際中涉及物品或服務，與意態化(modulation)相關。更具體地說，情態化指人們在陳述的過程中，對所涉的信息除了給予肯定或否定之外，中間還有一些可能性，包括概率(probability)和頻率(usuality)。意態化指人們在提議某些規定或禁止時，其間也有一些可能性，包括意願(inclination)和職責(obligation)。意願和職責可以通過以下兩種方式的一種或兩種得以表達：(a)使用情態動詞作謂語，如“you should know that”；(b)使用擴展的謂語，如“You’re supposed to know that; I’m anxious to help them”。由此可見，提議是講話者和聽話者就物品或服務的交換；在這個交換過程中，講話者可以提供某種物件或某種服務，即意願，也可以要求聽話者做某事，即職責。

情態的表達可以有不同的方式。除了上述根據言語交換商品的不同性質所劃分的情態類別外，還可以從情態的主、客觀角度來劃分；韓禮德稱之為“取向”(orientation)。情態取向(modality orientation)描述不同的對話形式，以揭示不同對話形式在意義上的差異及對話語的影響(Halliday and Matthiessen 2004: 149–50)。比方說，“it is certain (that) that is true”和“I’m certain (that) that is true”，這兩種表達形式從表面上看，可能被當作是同一說法的不同表達方式，但從本質上來說，它們各表達了不同的意義。在第一種說法“it is certain...”中，講話者傾向於客觀描述，而在第二種說法“I’m certain...”中，講話者明確地做了主觀判斷。湯普森(Thompson 2008: 69)把這種情態取向也稱為“情態責任”(modal responsibility)，表示講話者是否明確地肯定或否定陳述來源，是否願意為所言負責，即是說，採取主觀判斷還是

客觀判斷。因此，情態取向或情態責任，可以用來考察講話者在多大程度上為自己所陳述的話語負責。

##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分析架構運用上節所述的系統功能語言學的概念。下文首先介紹本研究選用的文本對象與分析工具，並簡要說明研究的分析框架和步驟。

### A. 文本對象與分析工具

如前文所述，本研究的文本分析對象是2003上半年非典疫情在中華地區爆發期間由澳門三家機構發佈的公示語，分別是：澳門衛生局（Health Services of Macao SAR Government，縮寫MHS）、澳門民政總署（Civic and Municipal Affairs Bureau，縮寫IACM），以及澳門博物館（Museum of Macao，縮寫MOM）。三家機構發佈的公示語均以中文寫作，並同時翻譯成葡文和英文發佈，本文僅討論中英文版本。為便於標記，下文所使用的圖例和例句把澳門衛生局的非典公示語中文文本標記為ST-MHS，英文譯本標記為TT-MHS；澳門民政總署所發佈的非典公示語中文文本標記為ST-IACM，英文譯本標記為TT-IACM；澳門博物館所發佈的非典公示語中文文本標記為ST-MOM，英文譯本標記為TT-MOM。

我們選用了Nvivo10作為文本分析的輔助工具。Nvivo10是一款定性研究分析軟件，集合了定性標記，定量統計和製圖的功能，多用於社會學研究。我們利用這款軟件對三個文本對象進行語法參數標記和量化比較。由於三個文本的字數並不一致，我們在對語法參數作量化

統計時，採用該語法功能小句的字數佔文本總字數的比例（下文簡稱“比重”）來計算。

## B. 分析框架及步驟

本文以菲爾克勞斯（Fairclough 1995: 133）提出的批評話語分析三維度框架，即“文本分析—話語實踐—社會實踐”，作為研究的宏觀架構。文本分析的微觀架構則以系統功能語言學的人際功能理論為核心，集中考慮文本的言語角色、言語功能及情態類別和取向。如圖1所示，社會機構的聲音通過文本中的言語角色與言語功能進行傳遞，包括“提供”、“命令”、“陳述”和“提問”；社會機構的態度則主要通過情態來體現。情態化可通過概率和頻率來體現，意態化可通過職責和意願來體現。講話者的情態取向可揭示其對文本所述事件的觀點與態度，可以通過主／客觀表現及隱／顯性信息來源來推斷。此外，文本的情態參數和言語角色的差異，倒過來又顯示了不同社會機構對同一事件的態度，以及各個機構的社會角色及彼此的關係。

在具體的分析中，我們先比較三個機構所發佈的非典公示語文本在言語功能、情態類別及情態取向這三個語法參數上的異同，再比較公示語的原文與翻譯，從而考察文本如何利用語言資源來體現所代表機構的權勢和社會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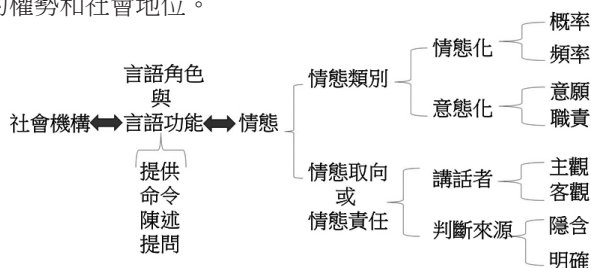


圖1 社會機構與言語功能



## 五、案例分析

本節根據上述分析框架，比較分析三篇非典公示語文本及其譯本中的人際語法參數，包括言語角色與言語功能、情態類別以及情態取向，以更直觀地瞭解話語所反映的機構權勢。

### A. 言語角色與言語功能

我們首先分析比較了言語角色和言語功能這兩種人際語法參數。三個非典公示語文本裡均嵌入了“給予”和“求取”這兩個基本的言語角色。通過分析交際的具體內容，我們發現文本的言語功能更傾向於“給予信息”和“求取服務”，即“陳述”與“命令”。

在澳門博物館的中文公示語文本(ST-MOM)中，“陳述”句是使用得最頻繁的言語功能，而“命令”句則在衛生局公示語原文(ST-MHS)中用得最多(圖2)。“陳述”的目的是提供信息，而不是要求信息接收者付諸行動。相反，“命令”則要求信息接收者採取相應行動。這就意味著，命令的發出者在交際事件中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在非典公示語這個交際事件中扮演較為權威的角色。澳門衛生局的公示語文本中使用的“命令”功能小句比重最高，體現了澳門衛生局在這個交際事件中最具權威和發言權。有趣的是，無論是“命令”小句比重最高的衛生局文本，還是“陳述”小句比重最高的博物館文本，在譯入英文時，“命令”小句比重均出現上升。圖3比較了原文和譯文中“命令”小句比重，直觀地展示了譯文比原文使用較多的“命令”功能小句。換言之，權威語氣在譯文中明顯增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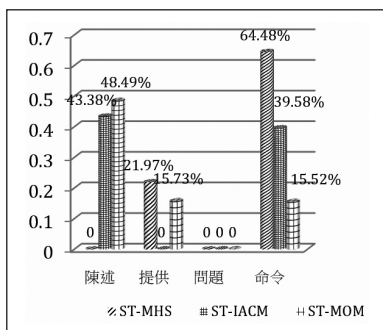


圖2 三則公示語的原文言語功能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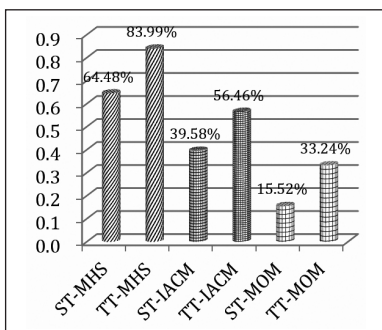


圖3 原文與譯文的“命令”功能比較

分析發現，導致譯文權威語氣增強的翻譯方法主要有兩種：增譯（amplification）和轉換（conversion）。增譯就是在譯文中增加帶“命令”言語功能的詞或小句。如例1，在翻譯“經常洗手”這個小句時，譯者添加了副詞“properly”，對“經常洗手”這個行為進行了限定並強調。轉換也稱為詞類轉換，傳統上指的是形容詞和名詞、名詞和動詞等不同詞類之間的轉換（Zhang & Pan, 2009）。在本研究中，“轉換”一詞引申為從一種言語功能轉換為另外一種言語功能，比如“陳述”功能經翻譯轉換為“命令”功能，如例2。例2源自衛生局的公示語翻譯（TT-MHS），原文小句“CDC特發出下列指引”是一個陳述句，講話者用於提供有關的信息，但是在譯文中使用了“advise”一詞，儘管在語法上該小句仍然是陳述句，但是在言語功能上已經轉換為“命令”，令該小句增添了命令性。這種情況類似於我們在闡釋“言語功能”時所列舉的例子。

例1.

ST: 經常洗手。(LT: Frequently wash hands.) (ST-MHS)

TT: Wash hands properly and frequently. (TT-MHS)

例 2.

ST: 鑒於鄰近地區目前不斷發生急性呼吸道綜合征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的個案，為預防有關疾病在本澳發生及傳播，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特發出下列指引。(ST-MHS)

TT: In view of an outbreak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in our neighboring areas, CDC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dvises** institutions and general public on the following precautionary measur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occurrence and spreading of mentioned infectious disease. (TT-MHS)

## B. 情態類別與情態取向

上文提到，情態化及意態化是情態系統兩大主要類別。在本研究中，意態化是反映非典公示語這個交際事件中三個機構權勢的重要參數，因為在意態化的分類中，“職責”顯示講話者的權威程度，而“意願”代表講話者配合行動和提供服務的主動程度。

從語言特徵來看，“職責”在言語功能上表現為“命令”，而“意願”則表現為“提供”。這種關聯性體現在三個公示語文本就情態類別的比較中：衛生局公示語原文 (ST-MHS) 使用了最大比重的“職責”情態，而博物館公示語原文則使用了最小比重的“職責”情態，這跟“命令”言語功能的比較結果趨同（見圖4）。除此之外，隨著“命令”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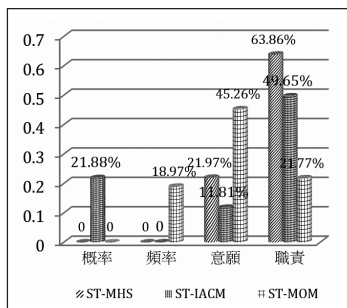


圖4：三篇原文的情態類別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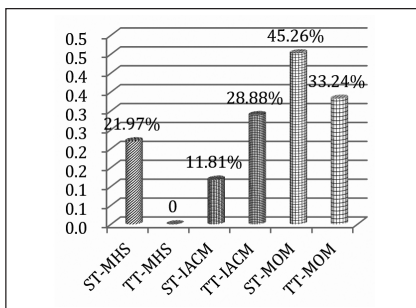


圖5：原文與譯文的“意願”情態類別比較

相對於“職責”在譯文所佔比例比原文增多，“意願”的使用率在衛生局公示語譯文(TT-MHS)和博物館公示語譯文(TT-MOM)中則在不同程度上減少了(見圖5)。在對衛生局公示語具體的文本分析中，我們發現，“陳述”小句經翻譯轉換為“命令”小句，是造成“意願”使用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因為“陳述”是提供信息，是“意願”的表現，“陳述”轉譯為“命令”，就會導致“職責”增加，“意願減少”。而在對博物館公示語具體的文本分析中，我們發現“意願”使用率減少與譯文刪減原文內容有關，如例3中的譯文就刪減了原文的後半個小句“已加大館內抽氣機強度”。由於字數刪減導致的“意願”率下降，跟由於小句功能的轉譯導致的“意願”率下降，兩者存在本質的區別，不能藉此認定博物館公示語譯文中的“意願”情態遭弱化。另一方面，民政總署公示語的譯文(TT-IACM)中的“意願”情態比重，幾乎是原文的兩倍，可能是使用了增譯法的結果(如例4所示)。

例3

ST: 為確保博物館內有空氣流通，已加大館內抽氣機強度。(ST-MOM)

TT: Maintain good indoor ventilation. (TT-MOM)

例4

ST: 民政總署忠告市民：(ST-IACM)

TT: The Civil and Municipal Affairs Bureau is warning to everyone that spitting on public places will cause diseases transmission. (ST-IACM)

以上是情態類別的比較情況，接下來我們要比較情態取向在三個不同公示語文本中的分佈。情態取向可分為兩種：主觀情態取向和客觀情態取向。主觀情態取向顯示講話者對所言的承諾。依此類推，文本中主觀情態取向的成分越高，講話者實現講話內容的決心就越大。通過比較三篇原文，我們發現，博物館公示語文本中的主觀情態取

向成分最高，所有描述所提供的非典防護措施的小句，均採取主觀情態取向，顯示出博物館積極回應澳門衛生局的號召、主動承諾執行衛生局的命令的態度。如例5所示，無論是原文（“本館建議”）還是譯文（“the Museum advises”），小句都以主動語態的形式，強調情態動詞“建議(suggest)”的施事者，表明建議內容來自“本博物館”和它的態度和立場。

例5

ST: 為預防呼吸道傳染性疾病感染，本館建議參觀者自備口罩，並多洗手。(ST-MOM)

TT: To prevent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contamination, the Museum of Macao advises all visitors to wear masks as well as wash their hands frequently. (TT-MOM)

民政總署公示語的講話者則採取了不同的策略。在該公示語的原文中講話者沒有出現在小句的主語位置。該公示語的第一個小句的主語是“隨地吐痰”，第二個小句的邏輯主語是“吐痰者”，但是後者沒有出現在小句中。該文本的製作者澳門民政總署可能要通過使用被動語態“可被重罰”來省略“重罰”的執行者，以體現“重罰”的公正。

例6

ST: 隨地吐痰可引致傳染散播，同時可被重罰。(ST-IA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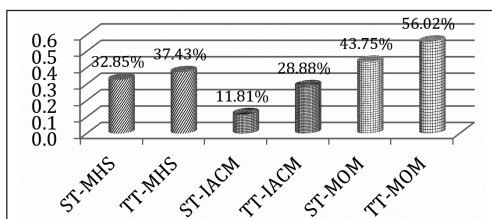


圖6：原文譯文間講話者主觀情態取向比較

以上是情態類別的比較情況，接下來我們要比較情態取向在三個不同公示語主觀情態取向的比重幾乎是原文的三倍。考察翻譯方法時，我們還發現了不同情態取向的轉換。如例7，原文小句由漢語四字詞“不便之處，敬希見諒”拼接而成，屬典型的漢語無主句；而在譯文中，主語被補回小句主位的位置，明確地揭示該句講話者的身份，顯示講話者願意為所言所述承擔責任。

例7

ST: 不便之處，敬希見諒。(ST-IACM)

TT: We are sorry for any inconveniences caused. (TT-IACM)

情態取向的另一種分類與陳述內容的來源相關，分為顯性來源和隱性來源。通過比較這兩種陳述來源對三則公示語文本，不難發現衛生局文本傾向隱性處理所陳述的內容來源（見例8），而博物館的公示語則傾向於明確陳述內容的來源（見例9）。這些公示語原文中的陳述來源特徵在譯文中再度加強，也就是說，原文中的隱性陳述來源在譯文中變得更加隱性，如衛生局的公示語翻譯；而原文中明確陳述來源的，經過翻譯也變得更加明確，如博物館的公示語翻譯。

例8

ST: 為預防非典型肺炎，保障公眾健康，所有外來人士到訪或辦理手續前，均需坐紅外線測量體溫。(ST-MHS)

TT: In order to prevent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and ensure public health, all visitors prior to their entry to the premises, are requested to have a temperature check via infrared detector. (TT-MHS)

例9

ST: 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衛生局的指引，本館對於預防呼吸道傳染性疾病採取以下措施。(ST-MOM)

T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from the Macao Health Services,  
the Museum is taking the following measures against the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illness. (TT-MOM)

綜上所述，三個非典公示語文本在言語功能、情態類別和情態取向等方面均表現出不同的人際語法特徵。澳門衛生局公示語文本傾向於使用“命令”言語功能和“職責”情態，情態取向偏隱性；澳門博物館公示語文本傾向使用“陳述”和“提供”這兩種言語功能和“意願”情態，情態取向偏主觀和明確；相對於上述兩個機構之公示語文本，民政總署公示語的語法參數值較為平衡，兼備上述兩個文本的語言特徵。所有這些語言特徵存在一個共通之處，那就是在個體文本中表現突出的語言特徵翻譯後更為突出。

## 六、解讀：帶有機構權勢操縱痕跡的文本證據

韓禮德指出，語言研究只是通向探索社會文化等超語言因素的一種途徑（Halliday, 1994: 70）。本研究中的超語言因素體現為話語背後的權勢，而權勢的較量，如前文介紹的菲爾克勞的批評話語分析框架所顯示，可以從話語秩序和社會秩序中揭示出來。

本研究的文本分析結果顯示，澳門衛生局的公示語使用“命令”性言語功能的頻率最高，主要用於要求公眾執行命令；澳門博物館的公示語則使用“陳述”性言語功能的頻率最高，主要向公眾傳達相關的信息；民政總署的公示語言語功能參數介乎上述兩者之間，“命令”與“陳述”功能參半。而在陳述內容來源的處理上，衛生局的公示語文本對陳述來源採取了隱性處理，博物館的公示語文本則對陳述來源採取了顯性處理。

上述文本分析結果與這三個機構在澳門社會的地位相符。根據調查，儘管這三個機構均隸屬於特區政府，屬政府機構，但各有不同的職能與分工。從澳門特別行政區官方網站提供的澳門政府架構圖看，<sup>[1]</sup> 澳門衛生局和澳門民政總署分別隸屬於社會文化司和行政法務司，兩司在級別上平級，由行政長官直接領導。而澳門博物館則是隸屬社會文化司文化局屬下的分機構，比前兩個機構低了一個等級。根據官網介紹，衛生局的職能之一就是“準備和執行關於推廣及保障衛生以及預防疾病所需的工作”。<sup>[2]</sup> 在這場與公共衛生健康緊密相關的非典危機中，衛生局在公眾眼中就是衛生方面的權威，責任包括對各種疾病的控制、預防及發佈相關的措施。因此，衛生局公示語使用的“命令”型言語功能頻率最高，又因內容來源已是不言而喻，故可對陳述來源做隱性處理。澳門博物館是文化機構，在這場非典危機中不具權威，因此只能轉述其他兩個權威機構的信息和要求，特別是轉達負責公共衛生健康事務的衛生局所發佈的命令。這也顯示了在非典公示語文本中，*低權勢機構的話語傾向於引述高權勢機構的話語*。用批評話語分析的術語來解釋就是“互文性”。所謂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指的是話語與話語互相關聯，這種關聯可以是追溯過去，也可以是共時互動或指向未來 (Fairclough & Wodak, 1997: 276)。話語中這樣的互文性可以幫助我們釐清特定交際事件的社會關係；例如，博物館的公示語開宗明義地指出信息的來源：“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衛生局的指引，本館對於預防呼吸道傳染性疾病採取以下措施”。引號中的小句在指向衛生局公示語的同時，也揭示了講話者（此處為博物館）在此交際事件中的從屬地位，並展示了博物館積極配合其他兩個機構工作的態度和意願。

從批話語分析的角度，我們可以認為，*文本證據反映了文本背後所代表的機構權勢的較量*；反之也可以認為，*是機構權勢的操控影響*



了話語的生產，並在文本中留下權勢操控的痕跡。本研究對文本的情態類別和情態取向的分析進一步驗證了這個假設：衛生局的文本大量使用“職責”情態，體現了“命令”的社會實踐，顯示衛生局在這項交際事件中擁有最高權勢；而博物館文本則大量使用“意願”情態，體現了“從命”的社會實踐，顯示了澳門博物館大力支持權威機構，配合衛生局落實抗非典措施的姿態。由於衛生局與澳門博物館的這種權勢關係，導致衛生局和澳門博物館文本中的區。此外，兩種語言特徵經翻譯得到進一步的突顯，也強化了兩個機構的權勢關係。

這種強化也體現在衛生局和民政總署。這兩個機構在特區政府中屬同等級別，只是職能有別。衛生局專門負責公共衛生及民眾健康的事務，民政總署則負責組織和管理公共活動。在一般情況下，民政總署在組織社會活動及與市民的交流方面更加活躍；但是在非典危機中，衛生局的專業和權威比民政總署略勝一籌。不過，根據澳門政府官網介紹，民政總署的首條職責就是“促進環境衛生，尤其確保公共地方的清潔及動物的監管，並與行使衛生當局權力的公共部門或實體合作”。<sup>[3]</sup>也因此，我們從文本分析中發現，民政總署並未囿於專業稍遜於衛生局就放低姿態，而是盡量維持本身的權勢，體現出與衛生局的合作關係。在民政總署的公示語中，沒有任何引述衛生局的話語，而是充分體現民政總署作為獨立執法機構的權威的公示語：“民政總署忠告市民：隨地吐痰可引致傳染散播，同時可被重罰”。後面的小句雖在表面上是陳述句，但它傳遞的信息已經超越了陳述功能；更確切地說，這個陳述句是警告和命令。由此看來，通過話語，本來在社會階層中處於優勢地位的群體，如民政總署和衛生局等機構，可進一步強化它們在此交際事件中的權威地位。而像博物館等從屬機構所發佈的話語，則通過與權威機構話語的互文，體現了對權威的服從。正如梅

爾 (Mayr, 2008: 14) 指出，話語“是權勢的實踐：人們服從於某些權勢是因為優勢文化群體通過話語將其權勢合理化”。

## 七、結語

本研究結合系統功能語言學的人際語法分析與批評話語分析，探討了包括翻譯在內的話語生產與權勢的關係。具體而言，本文就言語角色與功能、情態類別與情態取向等人際參數，考察了澳門三個政府機構在非典期間發佈的關於抗擊非典的公示語及其翻譯。考察結果顯示，公示語的語言選擇反映了發佈機構的社會角色、相關機構的關係，以及機構與公眾的關係。公示語的語言特徵在譯文中進一步突顯，令它所代表的機構權勢得到進一步強化。由此可見，譯者在翻譯此類帶有明顯機構背景的文本時，其態度取向是緊隨相關機構的，也就是本文題目所提出的“因勢制譯”。對非典時期的機構公示語的話語分析還揭示，機構權勢及其地位決定了機構話語的基調及其翻譯。我們認為，通過對機構話語及其翻譯的研究可以瞭解特定文化語境、特定交際事件中社會權力的關係。

從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可為翻譯的文本分析提供一個參考模式，即結合系統功能語言學所構建的具體細緻的文本分析模式與批評語言分析的宏觀理論模式相結合，通過定量考察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的方式，揭示文本中的語言及超語言因素所體現的話語內外的權勢，以及從話語秩序所折射出來的社會秩序。

\*本文是澳門大學跨年度項目“Politics, Media and Translation” (MYRG2016-00114-FAH)，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三五”規劃2017年度一般項目《粵港澳政府網站多模態翻譯批評研究》(GD17CWW07)的階段性成果。

## 注釋

- [1]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提供的澳門政府架構圖，網址：<http://portal.gov.mo/web/guest/org-chart>
- [2]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提供的澳門衛生局職能簡介：<https://www.gov.mo/zh-hant/apm-entity-page/gov-department-institutions-of-the-msar/apm-550/apm-552/>
- [3]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提供的澳門民政總署職能簡介：<https://www.gov.mo/zh-hant/apm-entity-page/gov-department-institutions-of-the-msar/apm-2/apm-169/>

## 參考文獻

- 丁建新，廖益清 (2001)，〈批評話語分析評述〉，《當代語言學》4: 305–310。
- Agar, Michael (1985).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Text* 3: 147–168.
- Chouliaraki, Lilie and Fairclough, Norman (2000).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Fairclough, Norman (199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London: Longman.
- and Wodak, Ruth (1997).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Discourse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Vol. 2.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Ed. T. A. Van Dijk.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58–284.
- Habermas, Jürgen (1987).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welve Lectur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Halliday, M.A.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London: Edward Arnold.
-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 and Matthiessen, Christian (200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 Mayr, Andrea (2008). *Language and Power: An Introduction to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New York: Continuum.
- Mumby, Dennis K. (1988). *Communication and Power in Organizations: Discourse, Ideology, and Domination*. Norwood, N.J.: Ablex Pub. Corp.
- and Clair, Robin P. (2004). “Organizational discourse.” In *Discourse as Social*

- Interaction*. Ed. T. A. van Dijk.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181–205.
- Pan, Hanting (2015). “Authority Reestablished via Modal Verb Translation: A Corpus-based study of Hong Kong Financial News Release Translation.” *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Studies*, 1(1): 145–167.
- Phillips, Nelson, Lawrence, Thomas B. and Hardy, Cynthia (2004). “Discourse and Institu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9: 635–652.
- Thompson, Geoff (2008).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Zhang, Meifang, and Pan, Hanting (2015). “Institutional power in and behind discourse: A case study of SARS notices and their translations used in Macao”. *Special Issue of Target: Discourse and Translation*, 27(3): 387–405.
- and Pan, Li (2009). “Introducing a Chinese Perspective on Translation Shif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hift Models by Vinay & Darbelnet.” *The Translator* 2(23): 351–374.

## 作者簡介

潘韓婷，女，中山大學外國語博士後，英語語言學（翻譯研究）博士；研究興趣：話語分析與翻譯研究。通訊郵箱：panht5@mail.sysu.edu.cn

張美芳，女，澳門大學英文系教授，博導，翻譯學博士；研究興趣：話語分析與翻譯研究、翻譯教學法、翻譯與跨文化交際。通訊郵箱：mfzhang@umac.mo

# 譯文集如何文學“再書寫”？ ——以中國現代文學譯文集 《活的中國》和《草鞋腳》為例

傅莉莉

## **Abstract**

How Translation Anthology Makes Literary Rewriting: Take Living China and Straw Sandals as Examples (by Fu Lili)

*As one genre of literary rewritings proposed by Lefevere, translation anthologies have not been adequately analyzed, but mostly they have been placed within the literary and social context in order to justify certain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This essa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wo English translation anthologies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Living China and Straw Sandals), attempt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How does a translation anthology conduct its literary rewriting? Through studying relevant texts and historical literatures, the writer identifies four rewriting means usually employed by translation anthologizers—selection of works to be translated, edition of paratexts, characterization of author, as well as the text translating, among which the last one plays a particularly crucial role. While presenting the source literature works to its target readers, it is also carrying out certain cultural and political agenda of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s.*

## 一、引言

“再書寫”(Rewriting)是“文學作品某一視域內形象的投射”(Lefevere 1992a: 10),其內涵並非“偏離”、“改變”或“歪曲”,而是為了系統的穩定做出的調和和妥協,是特定詩學、意識形態及社會關係制約下的結果。從這一意義上看,在描寫性翻譯研究中,“再書寫”作為中性詞,在漢語中更適合表達該概念。<sup>[1]</sup>

勒弗菲爾(André Lefevere, 1946–1996)將文集編纂和翻譯視為兩種重要的文學再書寫類型。譯文集(translation anthology)作為兩類文集的複合體,再書寫特點更加明顯。勒氏在論著中多次論及譯文集的再書寫現象(Levefere 1992b; 1995; 2007),通過歷時回顧和多本文集比較,闡明瞭多種限制因素(主要為贊助人、詩學、意識形態)對文本生產和接受的影響,由此強化了文學研究與社會語境的聯繫系,將翻譯研究帶離以“對等”(equivalence)為核心的語言學研究範式。至於譯文集本身的描述,則過於零散,多停留於外部描述,缺乏相對深入系統的闡述。

通過對比和分析兩部中國現代文學英語譯文集,本研究試圖析述文本和譯文集系統內部情況,探究譯文集“再書寫”的具體手段,即回答譯文集是“如何進行文學再書寫”的問題。

## 二、兩部譯文集相關情況介紹

《活的中國》和《草鞋腳》醞釀和編撰於上世紀30年代初,均將新文學以來不到20年的文學作品作為譯介對象。然而,在中國現代文學英譯史上,兩者卻佔有不同的位置:前者是在西方發行的第一部較為全面

展現中國現代文學的譯文集，<sup>[2]</sup> 後者是迄今最全面的中國“左聯”文學譯文集。<sup>[3]</sup>

兩部選集為外國編者主動“譯入”的產物，也是中國內外因素共同推動的結果。首先，兩部文集的編撰順應了世界範圍內興起的左翼思潮。一戰後，歐美知識分子開始批判和反思資本主義制度，左翼思潮盛行，共產國際的建立將之推向高潮，一時間成為了世界範圍內運動，也由此影響到中國。兩部文集的編撰者斯諾（Edgar Snow, 1905–1972）和伊羅生（Harold Issacs, 1910–1986）就是隨著這一熱潮，於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美國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現代中國的革命力量讓這兩位西方人振奮不已。斯諾時為《密勒氏評論報》（*Millard's Review*）的撰稿人，有感於中國知識界的變化以及西方世界對於現代中國的“視而不見”，遂於30年代初在上海與姚克<sup>[4]</sup> 合作翻譯魯迅小說，後在執教於北京燕京大學期間，開始編撰《活的中國》，燕大學生蕭乾和楊剛<sup>[5]</sup> 等人參與了選集的編譯工作。伊羅生則身為《大美晚報》（*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和《大陸報》（*China Press*）的撰稿人，同時主編英文刊物《中國論壇》（*China Forum*），<sup>[6]</sup> 該刊（《中國論壇》）在上海發行，為30年代進步刊物，除了抨擊中國時政之外，還積極譯介了相當數量的中國進步文學作品。其中，喬治·甘迺迪（George A. Kennedy, 1901–1960）的譯文倍受伊羅生青睞。<sup>[7]</sup> 後在有共產國際背景的出版商建議下，伊羅生開始著手編譯工作，預備出版代表中國“左翼力量”的文學作品，其中部分譯文就來自《中國論壇》。

其次，兩部譯文集也是中國左翼力量促成的結果。兩譯文集編撰之時，正值中國左聯走上歷史舞臺，在中國知識界和社會產生巨大影響之際。中國左聯作為“世界左翼作家聯盟”的重要分支，將融入世界左翼運動的希望寄託在這兩部文集上，將之視為與世界左翼知識份子和團

體進行交流的重要途徑(孔海珠, 2003: 144–145)。在編譯過程中左聯以及其領袖魯迅和茅盾給予了積極支持。<sup>[8]</sup>

兩部譯文集“身世”相似,再書寫的對象也相同,因為編輯立場和時代背景的變化,<sup>[9]</sup>就此展開了不同的文學敘述和再書寫。有鑒於此,本文選取了這兩部譯文集,期望在對照的過程中,釐清和再現兩部譯文集在進行文學再書寫時的具體手段。

### 三、譯文集的文學“再書寫”

相比較於其他文本傳播載體(如期刊、單行本),選集(anthology)突顯其編排性,即文本之間的關聯。而譯文集作為選集的特殊類型,還涉及文本內部的生產和再加工,包括文本翻譯和針對已有譯本的選擇和修訂。由此可見,譯文集的再書寫主要在文本間和文本內兩層面展開。

通過上述兩層面的觀察,本研究發現,譯文集再書寫採用的手段可概括為四方面:作品選擇、副文本編輯、作家形象“塑造”,以及特定翻譯策略的使用。尤其是前三類,能夠直抒文集的編輯目的,展現再書寫的內容,而後一種則作用於文本內部,極具書寫力量,或者進一步順應副文本再書寫內容,或者徹底展現編輯者和譯者的潛在心理和再書寫目的,以影響或者顛覆目的語讀者對原語文學的期待和理解。

#### A. 作品選擇

在選集中,作品的選擇可反映特定時期的文學現狀,也可體現編撰者的審美傾向和選集定位。兩部譯文集均輯錄了帶有時代印記的文學作品,主要表現在體裁上,除短篇小說外,還收入了中國現代文學發展最迅速的文類如雜文、白話詩和戲劇等。但在選擇標準上,兩



者大異其趣。《活的中國》重視現代中國正發生的事情，即真正的現實，《草鞋腳》則試圖展現中國進步知識份子的文學創作，重點是左翼作家作品。

《活的中國》分兩部分：魯迅作品和其他作家作品。<sup>[10]</sup>從作品選擇來看，編撰者斯諾並未在中國文學社團的分歧中選擇立場，他不僅挑戰了中國知識界的左翼文學標準，而且所選的作者和作品跟中國主流文學評論界認定的經典也有距離。除了左聯作家，《活》也收入了非左聯、甚至受左聯所批判的作家，比如林語堂、沈從文、被開除左聯的郁達夫，以及當時身份敏感的丁玲。<sup>[11]</sup>究其原因，在於斯諾的寫實主義（realism）立場，看重作品題材的現實性和多元性。例如，〈皈依〉出自當時名不經傳的青年作家蕭乾之手，講述了北京貧民被西方“救世軍”收買“靈魂”的故事；斯諾認為〈皈依〉反映了“西方文明對中國老百姓心靈的蹂躪”，因此指定蕭乾（1983: 8）將之譯出。此外，左聯作家孫席珍以革命題材小說聞名，斯諾卻選擇了孫氏刻劃農村小人物命運的作品〈阿娥〉。他看重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認為“中國農村姑娘”會“比戰爭題材的小說更能引起一般讀者的興趣”（孫席珍，1982: 383）。丁玲的作品〈水〉反映的是農民革命運動，斯諾刪除了最能反映革命主題的“逃難”和“造反”兩節，只選譯了第一節，用於呈現洪水來襲前普通村民的不安和焦灼，再現了20世紀初殃及大半個中國的洪災，而這場洪災曾引起西方媒體的關注，斯諾也曾親眼目睹水災給中國人民帶來的苦難。此外，在編譯過程中，斯諾還建議其合作者之一楊剛寫部自傳小說，希望在文集中增加有關中國新女性的故事。由此看來，斯諾在作品選擇方面自有標準，除了反映現代中國現實問題外，在他為魯迅撰寫的小傳中，提到了該文集潛在的詩學傾向，即重視作品中呈現的“普通人”（斯諾，1983: 12）。

而《草鞋腳》則將目光關注在“作者身份”上，選擇的16位作家均為左聯成員。<sup>[12]</sup>其中，青年作家佔一定比例，代表左翼文學的新生力量。在序言中，伊羅生（1981：589-590）指出，《草》的主旨有二：其一，向西方讀者“說明並介紹中國文學革命的發展狀況”；其二，介紹“一批在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殘酷鎮壓下的作家的作品”。《草》收入了新文學革命以來跨度18年的文學作品，試圖展現中國現代知識份子通過文學積極參與社會改造的努力，但因以“作者身份”為基本標準，作品選擇受到限制。《草》以作品發表時間為序，前半部為左聯成立前的作品，有代表中國新文學開端的魯迅小說、中國現代戲劇成就的〈卓文君〉以及極具“新時代”特徵的〈莎菲女士的日記〉，而後半部則為典型的“普羅作品”，具有固定的敘事模式，即以階級對立為基礎，圍繞“壓迫和反壓迫”主題展開情節和人物塑造。例如，蔣光慈的作品〈阿三〉角度比較新穎，選擇租界“壓迫者”印度巡警為主要人物，但以主人公階級覺醒的過程為線索進行敘述，最終回到了反帝反壓迫的主題。

除上述偏向外，兩部譯文集也考慮到國際接受，選擇了具有國際話題性質的作品，比如《活的中國》中林語堂的作品<sup>[13]</sup>、〈法律外的航線〉中的“美國揚子江巡邏隊”，以及〈皈依〉中外國宗教勢力在華的“騙教”活動。《草鞋腳》則選擇了轟動世界左翼群體的“左聯五烈士”事件中的柔石、胡也頻和殷夫的作品，“丁玲事件”中應修人和丁玲的作品。但總體上，兩者仍緊貼選集立意，分別突顯作品中的“中國現實”和“中國左翼力量”。

在文集編撰中，一方面作品選擇受編輯和出版目的制約，另一方面，偶然性因素也不可忽略，比如編輯者個人視閥、經歷和人際交往，決定了所選的作品因人而異，難免偏頗，在兩部文集中都有相關表現。然而，“以偏概全”也是文集的重要特點之一。此“偏”，恰恰證明瞭文集再書寫的必然性。

## B. 副文本編輯

“副文本”(paratext)在文集再書寫中,起著協調和連結各文本的作用,為正文本的再闡釋構建了話語空間。本研究所論及的副文本編輯,包括文集的標題、序言、作者介紹、附錄及作品的排列方式等。

文集內的副文本和編輯,正如展覽中展品的相關說明和擺放方式,在與正文本和讀者互動對話的過程中達成了意義的重建。在兩部譯文集中,意義的重建首先體現在標題。兩部文集都是“主題型”標題,直接傳達文集編輯的動機和意圖,指明了全體正文本的意義指向。在序言中,斯諾明確了該標題包含的選集主旨,是為了挑戰西方世界對於現代中國的“視而不見”,展現現代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包括“中國知識份子是怎样看待自己”和“正在改造著的中國人的那種精神、物質及文化的力量”(斯諾,1983:12)。因而,不論是小說中的人物形象還是傳達出的思想,都與中國傳統文學作品保持距離。而“草鞋腳”出自魯迅1932年11月北師大演講〈再論“第三種人”〉,對比演講中提及的“穿著皮鞋和西裝的”資產階級作家,此標題與文集扉頁上引用的魯迅講話,點明瞭標題所指即“普羅文學”作家,顯示該選集鮮明的政治立場。

其次,文集的體例和相關副文本,加強了文本間的關聯,界定了正文本的闡釋語境。《活》中的正文本基本按照作者當時文壇的影響力而排列,依照“作者簡介正文本”的模式展示。正文本內容通常照應簡介資訊,形成很直觀的互文闡釋關係。附錄則包含一篇介紹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章,<sup>[14]</sup>還有在當時看來比較全面的中國現代文學中英文資料,述及原文作品、期刊及前期出版的相關譯文集,可見《活》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整體重視,欲呈現出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燎原之勢。與之不同,《草》中的作品依照發表時間進行排列,意在說明“中國文學革命”的發展情況,呈現出中國現代文學“從人文浪漫主義關懷轉向明顯的政治和

意識形態色彩”的變化趨勢 (Isaacs 1974: xi)。<sup>[15]</sup> 作者間介與作品文本分而展示，其中全體作者的介紹成為相對獨立的文本群，相當篇幅描述了當時知識份子的革命經歷和境遇，還原了整體的、或者說更大的歷史語境，與正文本的互文關聯稍弱於《活》。附錄部分為茅盾編寫的〈中國左翼文藝定期刊編目〉，介紹了中國當時廿幾種進步文藝刊物。由此看出，《草》中正文本和副文本之間的關係相對獨立，所有文本被作為“左翼文學發展史”的資料予以展示，偏重文本的歷史價值。

在以編排為特點的文集中，副文本的限定和牽引，編織了文本、編撰者與讀者的話語空間，使原本鬆散無關聯的文本構成了具有共同指向的意義系統。而上述兩部文集的副文本，為正文本讀者搭建了兩個不同的認知空間，一個著眼於“作品的文學反映功能”，另一個則看重“作品的文獻價值”。

### C. 作家形象“塑造”

在譯文集中，一定的文本群服務於特定的文學觀點或現象，以加強譯文集系統的意義穩定，而“作者形象的塑造”在譯文集的再書寫過程中尤為最典型。在譯文集文本系統中，如果作者被給予某種標籤，編譯者會編撰相關的正文本和副文本以突顯它的這種標籤特徵，以實現文集文本系統意義指向的內在統一性。為了更清晰地說明該問題，本文選用魯迅作為觀察對象。

基於作品選擇和相關副文本，可以看出兩部譯文集給予了魯迅不同的定位和形象闡釋。《活》極力將魯迅塑造為中國現代作家的代表，突出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創作中的成就以及其作品的文學現代性。其作品的“現代性”主要表現在以“我”為敘述者的作品中包括〈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和〈風箏〉，在於以第一人稱敘述突出主體性，有別於中

國傳統文學主要以第三人稱敘事的創作手法。相關的副文本（包括魯迅照片、序言、作者介紹、魯迅傳記和附錄）則顯示了《活》上世紀30年代出版之際試圖“經典化”魯迅的意圖。同時，借用世界著名作家類比魯迅，認為魯迅在中國的政治和社會上的地位“如高爾基之於俄國”，而在文學創造上“如契訶夫”（斯諾，1983: 4），突出他的現實主義作家身份。在斯諾撰寫的〈魯迅印象記〉中，把魯迅置於中國文壇的風雲變化中，亦是強調魯迅的文學成就和號召力，但對其政治立場，雖有述及卻語焉不詳，不論對何為左翼，還是魯迅的政治影響力，在該小傳及序言中都沒有給予明確的闡述，有意與左翼思潮保持一定的距離。<sup>[16]</sup>

在《草》中，魯迅則成為中國左翼知識份子的代表。編者借助相關副文本（包括魯迅親撰序言、編者前言和作者個人自述），將魯迅置於宏大的歷史敘事中。在序言中，伊羅生不吝筆墨地回顧了中國近現代史及同時發生的文學和政治思潮，將身處其中的魯迅勾劃為“精神獨立”的、“絕不接受文學即政治”的進步作家（伊羅生，1981: 590）。此外，《草》中魯迅的個人自述也加強了他的形象，除了介紹家庭和教育背景外，還回顧曾遭遇過的人事糾紛和政治迫害，以及一貫的抗爭態度和最終採取的“左翼”立場，與他左翼領袖的標籤相互呼應。在選篇上，同樣如此。魯迅自選〈風波〉和〈傷逝〉兩篇，伊羅生後又添加了〈狂人日記〉、〈藥〉和〈孔乙己〉。正如伊羅生所言，這幾篇小說，尤其是早期作品奠定了魯迅在新文學無人能及的地位，體現了魯迅現實的、幽默的、犀利的、乃至刻薄的文風（Isaacs 1974: li）。其中，〈傷逝〉在風格上略顯不同，是魯迅少有的哀傷抒情的作品，是進步知識分子魯迅對新文化運動的反思，一定程度上，體現出魯迅的清醒和對當時當事永存的疏離。

在《草》出版之時（即20世紀70時代），魯迅在現代文學中的經典地位業已確立。因而，作為中國現代小說之父，“魯迅”亦是《草》推

介中國左翼文學的名片。從文集標題、封面、魯迅撰寫的序言、以及伊羅生70年代所作的序言等副文本中，可明顯看到這一點。<sup>[17]</sup>

由此可見，文集中文本系統的建構力量，即便關乎經典作家，在收入不同文集後，也會因文集各自的編撰目的和環境，獲得新的意義和定位。《活》與《草》兩部譯文集就是分別在“新文學成就”和“左翼文學發展歷程”兩種語境中定義了“魯迅”，以突顯兩本譯文集文本系統不同的意義指向。

#### D. 文本內的翻譯

譯文集比普通選集複雜，在於前者涉及編譯環節，包括作品翻譯和譯文處理等方面，以調和譯文讀者和原文的關係為目的。在翻譯過程中，《活》與《草》兩部譯文集採取了不同的翻譯策略，以關照不同的目標讀者群。

《活》偏向普通讀者，主要為上世紀30年代西方左翼知識份子，除了力圖再現語言上的中國特色以建構中國語境外，也可發現該選集潛在意識形態立場對譯本的左右和操控。某種程度上，《活》突破了作品選擇和副文本所建構的文本意義系統的“禁錮”，有意成為中國左翼文學和革命的傳聲筒。而《草》的首要目標讀者是對中國問題感興趣的專業人士，他們活躍在學院和學術機構內，因而，該文集採用的“學院派”翻譯，主要以原文和學術規範為目的。在翻譯過程中，通過特定語體和闡釋手段，該選集對中國現代文學進行了某種意義上的“提升”，以適應特定讀者群的閱讀。

##### 1. 《活的中國》中的“現代”中國

在序言中，斯諾明確了該文集在翻譯中的“不忠實”，強調採用“詮釋

而非複印”原作品的翻譯策略，並堅信這種方法“在精神上和在內在涵義上對原作是忠實的”（斯諾，1983: 5）。該策略主要考慮作品的接受，希望譯文“面向”目標讀者：

〔翻譯〕以對中國毫無瞭解的讀者為對象，一定得把原作所描寫的事物完全弄懂才可著筆；譯的時候要用最準確無誤的語言把自己所理解的傳達給讀者。（蕭乾，1983: 7）

由此可知，該“詮釋”型翻譯至少包含兩層含義：其一，譯文傳達的是譯者對原文的理解，因此，並不停留在文字表面的對等；其二，譯文對象為普通讀者，因而，譯文須是讀者易於理解和樂於接受的。有鑒於此，《活》採用了多種翻譯方法對原文進行詮釋，既致力於保證譯文的可接受度，也致力於在譯文中保留來自中國的異質文化，同時也努力實現《活》想要實現的特定意圖。

《活》借助“異質”物質文化和語言表達，呈現出了異於西方的文本世界，以偏向直譯的方法展現了一個充滿異域風情的文本“中國”，這一點以魯迅小說的翻譯最為突出。儘管斯諾在序言中抱怨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寫作拖沓，在翻譯過程中，他還是盡可能地保留或者顯化原文中的文化意象，包括有文化含義的物質詞匯如例1和例2，在傳達表層意象的同時，譯者也對其含義做瞭解釋。此外，原文中的固定表達比如成語和俗語，也盡可能地通過直譯予以保留和突顯，如例3和例4。

例1

而且那村口的魁星閣也確乎已經望得見。（〈離婚〉，頁59）<sup>[18]</sup>

Already, in fact, the shrine of Kuei-hsin, God of Literary Examinations, was visible at the mouth of the village. (Snow 1937: 88)

例2

你看，這一點是“水銀浸”……。（〈離婚〉，頁60）

This is a mercury stain, the result of the mercury that was put in corpses in olden times to keep them from decaying too rapidly. (Snow 1937: 90)

例3

那小畜生不分青紅皂白，就夾臉一嘴巴……。〈離婚〉，頁61)

But, without investigating at all, without distinguishing between green, red, black, and white, the little beast smacked my face. (Snow 1937: 92)

例4

……大抵非懶即饞，或者饞而且懶，左右不如意，……〈祝福〉，頁41)

They were too lazy, or they were gluttonous, or in extreme cases they were both lazy and gluttonous, and in truth were totally undesirable, from the extreme left to the extreme right. (Snow 1937: 62)

另外，譯者通過音譯，在文本中還點綴了有中國特色的“音響”，包括漢語中的感歎詞，如“Hai!” (Snow 1937: 32)，“Hao!” (Snow 1937: 33)及間單的詞句，如例5和例6。

例5

“**得了麼？**”

“得了。”〈藥〉，頁19)

“Te-liao-mah?” She asks.

“Yes, I have it.” (Snow 1937: 33)

例6

“誰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兒子麼？**那個小傢夥！**”〈藥〉，頁21)

“Whose?” demands Big Uncle. “Can he be other than the son of the fourth daughter-in-law of the Hsias? That little tung-his\*”

\*Literally, ‘thing.’—TRANSLATOR. (Snow 1937: 36)

在西方讀者的視域下，上述譯文帶來的不僅是挑戰，還有陌生化的表達和資訊為閱讀增添的新鮮和愉悅感。在異域文化中，此類異化翻



譯，旨在突出“中國味道”，也不啻是對原文的再書寫，在英語世界中搭建了該選集特殊的文化語境。

而在情節上，《活》的闡釋尺度則較大，除了因考慮閱讀的順暢而作出刪節和增補外，還有意添加了有關中國的現代資訊。該“現代”資訊，在此譯文集中主要被闡釋為左翼思想。斯諾（1983: 1）在序言中指出：“現代中國和現代中國人孕育著新的活力，進行著新的探索”，但並未點明其內涵。在譯文中，其具體所指被顯化，反映在〈移行〉、〈泥濘〉和〈法律外的航線〉等作品中，主要包含以下幾方面。

#### a. 批判小資產階級，強化階級概念

在中國左翼文學中，階級矛盾成為核心問題，小資產階級淪為批判對象之一。〈移行〉描述了前革命者桑華的生活，譯文有意強化桑華的小資產階級身份，明顯地重塑和“再加工”了其形象。

##### 例7

六姐傻了似地瞧著她，又瞧瞧桌上的東西，糖果、**檯燈**、剩了半杯的威士卡蘇打……（〈移行〉，頁269）

Her cousin gaped at her stupidly, and then at the table laden with sweets, an opium lamp, and a glass of half-finished wine. (Snow 1937: 271)

##### 例8

連報也不看，頂多翻一下報屁股和電影廣告。（〈移行〉，頁282）

She read nothing but romantic stories and the cinema advertisements. (Snow 1937: 281)

##### 例9

“五叔五嬸給你的那種教育大概很有點分量的，”她說：“他們只有，只有你這麼一個女兒，他們就把你造成一個……”

桑華習慣地瞟鏡子一眼，可沒移動一下她的姿勢。

“一個甚麼：一個嬌小姐。”（〈移行〉，頁267）

“Uncle and Aunt have given you a good education, I suppose,” she said. “You are their only daughter. No doubt they determined to make you —”

“What?” Shang Hwa stole a glance at the glass, and was pleased with what she saw there and did not move.

“What? Well, a bourgeois wife.” (Snow 1937: 269)

通過添補和突顯，展現了小資產階級的軟弱、虛榮和生活上的墮落（如例7和例8）。另外，有別於原文立場上的含蓄，譯文中頻現 *bourgeois*, *comrade*, *revolution* 等標明人物身份的詞（如例9），顯化了原文中被遮掩的階級屬性。

#### b. 宣傳中國紅軍和其革命理念

可以說，該選集是斯諾1937年出版的成名作《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 的先聲。《活》所選作品在源語中對政治立場常諱莫如深，而在譯文中則不僅直接點明，而且還增加了對於革命紅軍的正面描寫。在〈泥濘〉和〈法律外的航線〉的譯文中，均進行了再書寫和部分的改寫，亮化了中國共產黨軍隊形象，並澄清和宣傳了中共革命理念。

##### 例10

他直脖子喊了半點鐘，要大家不要多疑。（〈泥濘〉，頁115）

He hoped there would be no more misunderstanding: this idea of “communal wives” was a bourgeois falsehood put out against them. (Snow 1937: 148)

##### 例11

“我打了十幾年仗了”他抬抬頭接著說，“真沒見過！男男女女一起出馬。  
婆娘些褲兒一捲，撲過河來拿起梭鏢穿你。連娃兒些都不好惹，——老頭

子，笑？不是好吃的果兒啊！跑去試一試吧，不搞得你屁滾尿流那才怪哩！……”（〈法律外的航線〉，頁333）

“I’ve been fighting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but never anything like these Reds! Do you know what? It’s true their women pull off their trousers, wrap them on their shoulders, and swim the river. They come among our troops and try to win us over to their side. Some of them—What are you laughing at, old fellow? They’re no easy fruit to digest! They have a hundred and one methods, and that’s why they’re dangerous. Plenty of our men have been trapped by them.” (Snow 1937: 323– 324)

上述兩例譯文都對“共妻”謠言進行瞭解釋和諷刺，例11甚至不惜改動情節內容，將諷刺發揮到極致。此外，〈法律外的航線〉還增加了結尾（見Snow 1937: 333），直接點明瞭反帝反壓迫的主題。

### c. 提升勞動人民的形象和立場覺悟

不同於啟蒙為主的五四文學，在左翼文學中，勞動人民不再是批判的對象，而是需要團結的對象，是革命的主力軍。在該文集中，部分“有瑕疵的”工人和勞動人民形象被“提升”和美化，如〈消息〉中的工人領袖阿福。

#### 例12

自從有了這回事以來，兒子就變得高了一點似的，**更不把娘看得起**。（〈消息〉，頁155）

Since it had begun her son seemed to her to have ascended into a world which she did not understand, a world which she could not enter. (Snow 1937: 165)

#### 例13

“你們，那個會，也要老婆子嗎？……”“甚麼會？”那人<sup>[19]</sup>故意逗著她說。他覺得這老太婆很有趣的。（〈消息〉，頁161）

“Is it true or not? Does your society admit old woman?” “Not wicked women like you!” laughed Ah Fu. Then he nodded his head, and told her that it admitted all humanity that wanted to work. (Snow 1937: 172)

借助部分情節和內容的變化，譯文減輕了原文中阿福對母親的不屑，弱化他的傲慢態度，並為他的形象增添更多人情味。此外，在〈柏子〉中，同樣也有意拔高了“江湖浪子”水手柏子的覺悟。除了簡化文中的情愛細節，譯文還改變了結尾，將歸於平淡的情節，換為了柏子對未來的憧憬和對當下生活的質疑（見Snow 1937: 187）。

由此可見，《活》中借助翻譯進行的再書寫是極其明顯的，不僅有文化“異質”的顯化，而且還有人物形象的改動和意識形態的安插。

## 2. 《草鞋腳》中的精英化文學

在《草》中，伊羅生並未明確表達具體的翻譯理念和思想，僅在序言中簡要地介紹了選集的編譯情況。然而，不論是最初編譯，還是70年代的再修訂，<sup>[20]</sup>明顯是以原文為導向的翻譯。例如，《草》和《活》共同收入甘迺迪的譯文〈為奴隸的母親〉，但經由《草》正式出版前的再修訂，該譯文出現變化。

### 例14

臍帶繞在她底身上，胎盤落在一邊，……（〈為奴隸的母親〉，頁71）

- The navel string was twisted about it. (Snow 1937: 103)
- The navel string was twisted about it, and by its side the afterbirth had dropped. (Isaacs 1974: 218)

### 例15

“是呀，你也知道人生底快樂麼？所謂：‘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

（〈為奴隸的母親〉，頁78）

- “Aha! Do you know about the joys of life too?  
‘Flower-candles for the wedding night.  
A list of gold for the candidates’ names.” (Snow 1937: 111)
- “Aha! Do you know about the joys of life too?  
‘The night that wedding candles are placed in the nuptial chamber,  
The day when names are listed on the gilded plaque’ ”  
\* Announcing those who have passed the government examination for  
official position. (Isaacs 1974: 226)

可以看出，《草》中的譯文將忠實作為了翻譯標準，不僅重視資訊的完整（例14），而且還涉及到文化和語言層面的意義對等（例15）。然而，儘管是在忠實的前提下，《草》還是通過一定的語言和編輯手段，重塑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印象。西方傳統漢學界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評價整體不高，認為其文學性匱乏，同時，白話文寫作使文學陷入市俗化。《草》則通過翻譯和編輯，強化了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精英印象，使它符合學院派讀者的閱讀習慣和期望，主要手段包括：

#### a. 譯文語言的正式化

首先，表現在相關概念和專有名詞的規範和統一。如例16和例17，通過對比修訂前後的譯文，<sup>[21]</sup> 可以發現，具體明確的術語和背景解釋取代了初譯本中生硬的直譯。在加強規範的同時，增加了更多的語意層次。

##### 例16

可是意外地，號房帶來的卻不是巡捕，而是四十多歲的瘦男子，穿著中山裝。（《喜劇》，引自茅盾，1983: 99）

-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it was not a policeman that the doorman brought with him, but a weazened gentleman of about forty, dressed in a Chungshan uniform. (Mao Dun 1932)

-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it was not a policeman that the doorman brought with him, but a weazened gentleman of about forty, dressed in a Sun Yatsen uniform. (Isaacs 1974: 246)

例17

“是五年前。那時上海還是孫傳芳的勢力，那時國民革命軍還沒有出師北伐。”（〈喜劇〉，引自茅盾，1983: 100）

- “Yes, five years ago. Shanghai was still in control of Sun Chuan-fang. That was before the army started northward.” (Mao Dun 1932)
- “Yes, five years ago. Shanghai was still in control of Sun Ch’uan-fang. That was before the Kuomintang Revolutionary Army started out o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Isaacs 1974: 246)

其次，表現在部分譯文語體上的“提升”，相關詞彙及句型有明顯書面化傾向，如例18和例19。然而，與原文相比較，雖然句式和語言上偏向正式，譯文卻穩妥有餘，生動不足，喪失了不少原有語氣。在註釋中，語體正式化傾向則更加明顯。而這類語體轉變也正是考慮了《草》的讀者的閱讀和接受所作出的規範化處理。

例18

再往上仔細看時，卻不覺也吃一驚，——分明有一圈紅白的花，圍著那尖圓的墳頂。……華大媽忙看他兒子和別人的墳，卻只有不怕冷的幾點青白小花，零星開著；便覺得心裡忽然感到一種不足和空虛，不願意根究。（〈藥〉，頁24）

But a closer look produced a shudder of amazement-for there, clearly encircling the rounded tip of the grave, was a wreath of red and white flowers. ... Mother Hua took a hasty look at her son’s grave and at the others, but she saw nothing beyond a few bluish wildflowers braving the cold here and there. She was possessed by a sudden feeling of emptiness and was reluctant to examine further. (Isaacs 1974: 22–23)

例19

**我真肉麻那滿紙的“愛呀愛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引自魯迅、茅盾，1983: 41）

The pages are filled to overflowing with declarations of loves, “this love” and “that love.” This only disgusts me. (Isaacs 1974: 138)

b. “音譯+註腳”的普遍使用

對於特定的文化和背景知識，《草》基本上按照“音譯+註腳”的方式進行翻譯和闡釋，確保了原文資訊的完整。音譯實為文化詞彙在目的語缺省情況下的權宜之計，在學院派的翻譯中，卻是向專業讀者顯現異質文化的最理想途徑。同時在目的語（即英語）中，這些具有異化特質的威妥瑪拼音，如英語中夾雜的拉丁文或他國語言，無形中增加了原文本的文化和歷史內涵。

例20

他對人說話，總是滿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為他姓孔，別人便從描紅紙上的“上大人孔乙己”這半懂不懂的話裡，替他取下一個綽號，叫作**孔乙己**。（〈孔乙己〉，頁30）

His speech was heavily interlarded with classical particles which people only half understood. Because his surname was K'ung, he had been given the nickname I-chi, from the meaningless line in the elementary copybooks: “Shang ta jen k'ung I chi.” \*

\* Literally this could mean “Above the great man-” followed by three meaningless syllables, *k'ung-i-chi*, was the surname of Confucius and since many Chinese names are trisyllabic, the people of the place gave these three syllables to the old man as his surname and given name. Actually all calligraphic copybooks began with these characters simply because they included all the basic strokes needed for learning how to write Chinese characters. Since many had begun to study but never gotten far, the words were widely known, even by the unlettered. (Isaacs 1974: 26 – 27)

例21

凝想一下，提起筆來在蠟箋上一並排寫“功高嶽牧”四個大字。第二張寫的是“威鎮東南”。又寫第三張，是“德隆恩溥”。（〈潘先生在難中〉，引自葉聖陶，2011: 67）

After thinking for a moment he scrawled four characters across the shining paper: *Kung Kao Yo Mu*\*. On the second piece he wrote: *Wei Chen Tung Nun*\*. On the third he wrote: *The Lung En P'u*\*.

\* “Greater in Service than Yo and Mu,” referring to a famous statesman and a general in the mythical days of the Emperors Yao and Shu.

\* Power Threatening East and South.

\* Eminent Virtue and Broad Benevolence. (Isaacs 1974: 106)

之後的註腳是學院派常用的註釋方法，亦是延展專業讀者閱讀的重要途徑。如例20，注釋“趕超”譯文，有明顯“厚翻譯”傾向，為讀者闡釋了“孔乙己”這個本不起眼的綽號背後豐富的文化意義。除了文化闡釋外，該文集的註腳也澄清歷史背景和相關文獻出處。不論在廣度還是深度上，均體現其“專業文獻”特點。

c. 文化調和的翻譯手段

雖然是學院派翻譯，強調規範和原文導向，《草》並未忽視文化異質和讀者接受之間的平衡。在譯文和註腳中，譯者發揮了積極的協調作用，平和地展現了兩文化間的碰撞、融合和交流，體現了譯者相對客觀的文化翻譯立場。

例22

康大叔見眾人都聳起耳朵聽他，便格外高興，**橫肉**塊塊飽綻，越發大聲說……（〈藥〉，引自斯諾，1983: 21）

Uncle K'ang noted a general pricking up of ears and grew highly animated. His **yellow skin** blew itself out and his voice took up a higher pitch. (Isaacs 1974: 19)



例23

但我豈肯為了這些無意識的引誘而迷戀一個十足的南洋人！（〈莎菲女士的日記〉，引自魯迅、茅盾，1983: 41）

Yet am I to be attracted by this Nanyang Apollo just because of his senseless beauty? (Isaacs 1974: 151)

例24

他有十多本金聖歎批評的《三國志》，時常坐著一個字一個字的讀；他不但能說出五虎將姓名，甚而至於還知道黃忠表字漢升和馬超表字孟起。革命以後，他便將辮子盤在頂上，像道士一般；常常歎息說，倘若趙子龍在世，天下便不會亂到這地步了。（〈風波〉，引自魯迅，2006: 51）

He owned the ten volumes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with commentaries by Chin Sheng-t'an. He had read them so often, word by word, that he was not only able to repeat the names of the Five Great Generals but he even knew that Huang Chung was also called Han Seng and that Ma Ch'ao was known as Meng Ch'i\*. ...If only Chao Tzu-lung (one of the great generals) were living, he used to sigh, the world would not be so evil a place.

\* This is equivalent to praising an American's erudition because he knows the story of George Washington and the cherry tree. (Isaacs 1974: 37)

例25

七斤嫂正沒好氣，便用筷子在伊的雙丫角中間，直紮下去，大喝道，“誰要你來多嘴！你這偷漢的小寡婦！”（〈風波〉，引自魯迅，2006: 53）

Seven Catty brought her chopsticks down on the little girl's head between her two braids. “Who asked you anything, you... you husband-stealing widow!”\*

\*Invective or other disparaging remarks would be frequently addressed to a third person or even to an inanimate object. Here Six Catty becomes the innocent object of Mrs. Seven Catty's wrath against Mrs. Pa-I. (Isaacs 1974: 41)

在翻譯和編輯過程中，編譯者雖對中國文化中的異質成分十分重視和敏感，卻沒有忽略目標讀者的感受。《草》用類比和糅合的方法，在

保留異質的同時進行調和，拉近譯文與讀者的距離。不論是例22和例23的增譯，還是例24和例25的注釋，都是採用偏向歸化的文化闡釋策略，而此歸化顯然也是立足於學院派讀者的認知水準和文化立場之上。這種文化姿態，實際上是將中西文化放在平等位置上進行交流和對話，與《活》中一味突顯中國文化的異質性是不同的。

《草》的學院派翻譯與其出版背景相關。該譯文集出版於20世紀70年代，正值西方漢學的現代轉向與中美關係緩和之際。同時，出版社的大學背景決定了該譯文集的功能，主要用作教科書和學習參考書，目標讀者是具有專業背景的學者和學生。在翻譯和編輯中，上述措施基於學院和學術規範，重新塑造了中國現代文學文本的形象，使它更符合專業讀者的使用和閱讀。

由此可見，文本翻譯在譯文集文本系統中佔據重要位置，不僅關乎原文本的展示，而且還肩負一定的文化和社會功能。《活的中國》通過信息的顯化和情節的再書寫，將潛在的文化和政治目的“暗渡陳倉”；《草鞋腳》則通過語言手段和文體的再書寫，調整文化姿態的同時，進入了新的文化場域。

#### 四、結語

譯文集的編撰，絕非任意所為，而是受語境限定。上述再書寫的手段，展現了文本群落內部、不同文本群落之間，以及單個文本內部的意義組合和互動。在此過程中，再書寫為源語文學和作品添加的新內涵和活力，是文集編撰的價值體現。在四種再書寫手段中，翻譯的書寫力量令人刮目相看，在譯文集的文學再書寫過程中直接影響到源語文學的接受和解讀，並且在異域文化中為源語文學

整體印象的形成起了關鍵作用。

勒弗菲爾曾說過，各種文本闡釋形式比如文學批評、傳記、文學史、戲劇改編、文集編撰、翻譯等，都是在創造另一個文本，重新書寫了原文的文學和文化形象，是文學文本跨越時空距離得以生存和流傳的必經之路(Levefere 1992a: 4-5)。本文涉及的兩部譯文集的再書寫，是文本為適應異域語境所作的調整，也是編譯者有意為之的加工結果。不論怎樣，都為中國現代文學的“走出去”作出了最初的努力。鑒於兩本譯文集的影響力，80年代初期湖南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同名的原文文集。在新的歷史環境和語境下，這兩部源語選集分別承擔了不同的歷史任務，展開了又一次的文學再書寫，22恰似文本的旅行，出走異地，最終迎來的不僅僅是回歸，還有新的旅程。

## 注釋

- [1] Rewriting常被譯為“重寫”和“改寫”，在漢語語境中有明顯的價值評判含義。本文選用“再書寫”與之對應，在於其意義相對中性。
- [2] 《活的中國》出版於1936年，後曾多次重印。第一部在英語世界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譯文集為1930年米爾斯(E.H.F. Mills)翻譯的《阿Q的悲劇和其他現代中國短篇小說》*The Tragedy of Ah Q and Other Modern Chinese Stories*，該文集轉譯自敬隱漁1929年在法國出版的法文譯文集《中國現代作家選集》*Anthologie des Conteurs Chinois Modernes*。
- [3] 第一部左聯小說集為甘迺迪翻譯的《來自中國的短篇故事》(*Short Stories from China*)，該文集共出版了三次，出版社為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2) London: Martin Lawrence; 及3) USSR: Cooperative Publishing Society of Foreign Workers，時間在1933至1935年之間。該選集序言為史沫萊特(Agnes Smedley, 1892-1950)所寫。
- [4] 姚克(1905-1991)，原名姚誌伊、姚莘農。除了魯迅小說外，還曾翻譯了曹禺的《雷雨》，並從事戲劇創作。
- [5] 楊剛(1905-1957)，原名楊季征、楊續，畢業於燕京大學，為左翼人士，受蕭乾邀請參與翻譯。斯諾還提及Ku T'ung-chih(疑為顧宗沂)也為譯者之一(Snow 1937: 15)。
- [6] 1932年1月創刊，1934年1月停刊，共出版39期，為共產國際資助刊物。

- [7] 甘迺迪後成為美國著名漢學家，中文名為金守拙，耶魯大學教授。《草腳鞋》共收入甘迺迪的九篇譯作，篇目為*Medicine, K'ung I-chi, Intoxicating Spring Nights, Living Together, Slave Mother, Comedy, One Certain Night, The Three Pagodas*及*Words of Blood*。
- [8] 魯迅間接地參與了《活》和《草》兩部文集的編撰。在《活》的序言和斯諾採訪魯迅的筆記中，可以看出魯迅對斯諾編撰思想的影響。魯迅與茅盾曾為《草》選篇，擬定了文集目錄，但伊羅生並未遵循，僅有九篇與此相同。見〈魯迅、茅盾關於英譯中國短篇小說集《草腳鞋》的書信和資料手稿〉，載於《文獻》1979(1): 9-28。關於篇目改動原因，筆者認為，70年代正式出版的《草腳鞋》更多關照的是文學革命發展的歷史維度。
- [9] 兩者的出版時間相差40年，1936年斯諾編譯的《活的中國》由倫敦的喬治·C·哈拉普公司出版。伊羅生雖然聲稱在1934年基本完成《草腳鞋》的編譯，到1974年才由美國麻省理工大學出版社出版。據伊羅生序言，原因有二：其一，因伊羅生陷入了共產國際內部鬥爭，出版社拒絕出版由他編撰的文集；其二，《活》的出版，讓《草》失去了市場價值。
- [10] 收入了15位元作家的24篇作品，魯迅〈〈藥〉〉、〈〈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風箏〉〉、〈〈論“他媽的”〉〉、〈〈離婚〉〉、柔石〈〈為奴隸的母親〉〉、茅盾〈〈自殺〉〉、〈〈泥濘〉〉、丁玲〈〈水〉〉、〈〈消息〉〉、巴金〈〈狗〉〉、沈從文〈〈柏子〉〉、孫席珍〈〈阿娥〉〉、蕭軍〈〈大連丸上〉〉、節選自〈〈八月鄉村〉〉的〈〈第三支槍〉〉、林語堂〈〈憶狗肉將軍〉〉、蕭乾〈〈皈依〉〉、鬱達夫〈〈鷓鴣行〉〉、張天翼〈〈移行〉〉、郭沫若〈〈十字架〉〉、楊剛〈〈日記拾遺〉〉、沙汀〈〈法律外的航線〉〉)。其中，楊剛的*Fragment from a Lost Diary*為其英文創作小說，後由文潔若翻譯名為〈〈日記拾遺〉〉，收入《活的中國》(1983)。
- [11] 因受當時丁玲叛變傳言的影響，在與斯諾的交談中，魯迅先生也曾提及對丁玲“文學未來也不抱希望”(斯諾，1987: 7)。
- [12] 包括魯迅〈〈狂人日記〉〉、〈〈藥〉〉、〈〈孔乙己〉〉、〈〈風波〉〉、〈〈傷逝〉〉、郁達夫〈〈春風沉醉的晚上〉〉、葉紹鈞〈〈潘先生在難中〉〉、〈〈多收了三五鬥〉〉、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某夜〉〉、蔣光慈〈〈阿三〉〉、樓適夷〈〈鹽場〉〉、〈〈死〉〉、胡也頻〈〈同居〉〉、柔石〈〈為奴隸的母親〉〉、茅盾〈〈喜劇〉〉、〈〈春蠶〉〉、〈〈秋收〉〉、應修人〈〈金寶塔銀寶塔〉〉、王統照〈〈五十元〉〉、夏征農〈〈禾場上〉〉、丘東平〈〈通訊員〉〉、何穀天〈〈雪地〉〉，還收入現代劇(郭沫若〈卓文君〉)和新詩(殷夫〈血字〉)。
- [13] 在賽珍珠(Pearl Buck, 1892-1973)協助下，林語堂1935年在美國出版著作*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引起轟動，登上了美國當年的暢銷書榜。
- [14] 作者為妮姆·威爾斯(Nym Walc)，斯諾第一任妻子海倫·斯諾(Hel Snow, 1907-1997)，此處為其筆名。該文名為〈當代中國文學運動〉，較全面歷時地梳理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情況。

- [15] 本文源自英文材料的引文，如不特別說明，均為筆者所譯。
- [16] 附錄〈現代中國文學運動〉一文中，對左翼有所提及，交代了左翼在中國的發展狀況，以及受到國內強權的壓制，但僅將其納入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脈絡中作為眾多思潮和流派的分支作以介紹，並未表現出明顯的立場上的傾向。
- [17] 該文集被重新發掘，也得益於魯迅與該文集的關係（參見注8）。鑒於此段因緣，韓南教授（Patrick Hanan, 1927–2014）極力建議伊羅生夫婦將該文集整理出版，見文集伊羅生所作序言（Isaacs, 1974: xliv）。
- [18] 如未標明，本文中文例句均來自《活的中國》（斯諾，1983）。另，例中黑體和底線為筆者所注，用以突顯。
- [19] 例中那人實際為另一革命者，譯文中變為阿福，並對語言內容作了部分變化。
- [20] 《草》的翻譯和修訂工作經歷了兩個階段：30年代和70年代。在《草》30年代的譯者隊伍中，楊啟葆發揮了重要作用，承擔了大部分譯文的翻譯和審稿工作。楊啟葆為左聯成員，受魯迅和茅盾領導（Isaacs 1985: 39）。可初步推斷，楊啟葆在翻譯過程中，有明顯的“忠實”傾向。在70年代出版之際，出版社組織了修訂，考慮資訊完整和語言問題，還重譯了個別譯文。
- [21] 前為30年代於《中國論壇》發表的最初譯文，後為修訂之後的文集譯文。
- [22] 《活的中國》（1983）和《草鞋腳》（1982），均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樣進行了文學再書寫。前者為紀念“中國人民的朋友”斯諾。在副文本中增加了蕭乾對於斯諾的回憶文章、斯諾採訪魯迅的筆記以及原文文集的編輯後記，強化了該出版動機。後者為紀念魯迅百年誕辰。副文本中增加了茅盾對這段編撰經歷的回憶，並將魯迅定義為新文學領袖身份，並未強化魯迅的左翼立場。同時，在基於魯迅和茅盾擬定的目錄基礎上，重新選擇了篇目，與伊羅生所選作品有了很大不同，作家和題材類型更多樣化，突出的是新文學的成就。

## 參考文獻

- 顧鈞（2016），《美國漢學縱橫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孔海珠（2016），〈伊羅生主編《中國論壇》的變故——從共產國際絕密檔案說起〉，《檔案春秋》9: 50–53。
- （2003），《左翼》，上海：1934–1936》，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 孔華潤（1989），《美國對中國的反應——中美關係的歷史剖析》，張靜爾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李輝(1999),〈伊羅生:在托洛茨基與史達林之間——捲進中國革命漩渦的美國記者〉,《百年潮》12: 64-70。

黎辛(2001),〈我常想起伊羅生〉,《百年潮》8: 48-55。

魯迅(2006),《魯迅小說全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茅盾編(1982),《草鞋腳》,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呂黎(2011),《中國現代小說早期英譯個案研究(1926-1952)》,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論文。

茅盾(1983),《茅盾選集(第三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倪婷婷(2015),〈楊剛的英文小說《日記拾遺》及相關問題考析〉,《首都師範大學學報》3: 105-110。

倪秀華(2013),〈翻譯與行動主義——以斯諾編譯《活的中國》為例〉,《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6: 98-102。

裘克安編(1982),《斯諾在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斯諾(1973),《我在舊中國十三年》,北京:三聯出版社。

——編(1983),《活的中國》,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魯迅同斯諾談話整理稿〉,安危譯,《新文學史料》3: 7-12。

孫席珍(1982),〈我和斯諾交往的回憶〉,見《斯諾在中國》,裘克安編,北京:三聯書店: 382-385。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2005),《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蕭乾(1983),〈斯諾與中國新文藝運動——本版代序〉,見《活的中國》,愛德加·斯諾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10。

徐靜、李傳璽(2012),〈《活的中國》蕭乾的貢獻與所受的影響〉,《安慶師範學院學報》4: 13-17。

楊剛(1937),〈評《活的中國》〉,《上海大公報》,1月17日,第13版。

伊羅生(1981),〈《草鞋腳》序言〉,見茅盾編,《草鞋腳》,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589-620。

Frank, Armin (2004). "Anthologies of Translation." I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Eds. Mona Baker and Kirsten Malmkjaer.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3-16.

Genette, Gerard (1997).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bbs, Donald A. and Li, Yun-chen, ed. (1975). *A Bibliography of Studies and Translation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18–194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Isaacs, Harold, ed. (1974). *Straw Sandals: Chinese Short Stories 1918–1933*.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Isaacs, Harold (1985). *Re-encounters in China: Notes of a Journey in a Time Capsule*.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Lefevere, André (1982). “Mother Courage’s Cucumbers: Text, System and Refraction in a Theory of Literature.”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12(4): 2–20.
- (1992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1992b). “Anthology: Anthologizing Africa.” In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Ed. André Lefeve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24–137.
- (1995). “German Literature for Americans 1840–1940.” In *International Anthologies of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Ed. Harald Kittel. Berlin: Erich Schmidt, 40–55.
- (2007). “Translation and Canon Formation: Nine Decades of Drama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Eds. Román Álvarez and M. Carmen África Vidal.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38–155.
- Mao Dun (1932). “Comedy.” In *China Forum* (Jun. 18). Ed. Harold Isaacs. Shanghai: China Forum, 5.
- Snow, Edgar, ed. (1937). *Living China: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 作者簡介

傅莉莉，復旦大學外文學院博士生，浙江財經大學外語學院講師。研究興趣：文學翻譯。電郵地址：15110120001@fudan.edu.cn; lilifu79@126.com.

# 翻譯過程的 眼動實證研究十年瞰覽

劉曉萍、范琳

## **Abstract**

Eye-Tracking Technology on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A Ten-Year Snapshot (by Liu Xiaoping and Fan Lin)

*On-line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TPR) is as important as off-line research. Eye-tracking technology gives an edge on the on-line translation process studies. First introduced by O'Brien in 2007, eye tracking TPR has gained its popularity in translation research year by year. This essay reviews eye-tracking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last decad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and other readings, difficulties of source texts, different levels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translation products. In the field of readings in translation and other tasks, comparativ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ranslation reading is indeed more difficult than other types of reading, which can be exemplified by early or late eye-tracking measures. Studies which manipulate syntactic orders or structures find that translators' mother tongue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second-language processing. It is also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there is conflicting evidence on the L1-to-L2 or L2-to-L1 translation difficulty, which is open to further exploration. Besides, scholars are also interested in translators' strategies, especially the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hose experienced translators in translation processing. Most studies demonstrate that more experienced translators follow a more fixed pattern, i.e., fewer fixations and shorter fixation*



*durations. Some studies also show that the more skilled translators display a horizontal processing in translation, while the less skilled translators show a vertical processing pattern. Moreover, studies on eye-tracking translation process are also closely connected to translation product qualities, which triangulate the studies on translation processing research. Future eye-tracking translation studies can be conducted from various research angles or research methods. For instanc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ranslation processing and working memory, comparisons on translation directions, expertise study, a better definition of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are all waiting for further explorations. Another way for eye-tracking translation research is to be combined with other techniques such as 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 More importantly, a more convincing cognitive translation model based on more empirical data collected by eye-trackers can be built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rocessing mechanism in translation. This critical review intends to shed light on future eye-tracking translation process studies.*

## 一、引言

眼動追蹤技術 (eye-tracking technology) 從19世紀 Louis Émile Javal 通過鏡子觀察受試眼球的運動情況開始，經歷了百餘年的發展歷程。如今，眼動追蹤技術無論從精度、記錄速度還是生態效度 (ecological validity) 上都取得了巨大進步，真正實現了眼動情況的實時測量，從而幫助人們更加有效地探討認知加工過程。頭戴式、眼鏡式、遙測式和桌面式等不同種類的眼動儀可以滿足使用者不同的研究需求，被廣泛地應用在神經科學與心理學、工業工程、市場營銷和人機交互等領域。眼動追蹤技術的發展引起了翻譯過程研究學者們的注意，O'Brien (2007) 率先利用眼動追蹤技術考察了筆譯人員在使用翻譯

記憶軟件 (translation memory) 過程中由於原文與譯文的匹配程度不同所引起的眼球變化，進而推导出認知負荷的差異。如果以此作為當代眼動技術進行翻譯研究動起點，那麼翻譯的眼動實證研究已經開展了整整十年。O'Brien的後續研究 (O'Brien 2008; Doherty & O'Brien 2014 等) 發現利用眼動追蹤數據對機器翻譯輸出的可讀性 (readability) 與可用性 (usability) 得到的評價數據基本準確可靠，這些研究為機器翻譯和計算機輔助翻譯研究的拓展帶來了頗多啓示。此外，EYE-TO-IT 歐洲項目使用眼動追蹤、鍵盤記錄 (Keystroke Logging) 及腦電 (Electroencephalography, 簡稱EEG) 相結合的技術開展了對翻譯 (包括口筆譯)、閱讀及語言處理的研究 (劉艷梅、冉詩洋、李德鳳, 2013)，深化了翻譯過程研究。近年來國際知名出版社如 Samfundslitteratur, John Benjamins 及 Peter Lang 等的翻譯期刊或論文集，均不乏利用眼動追蹤技術對翻譯過程進行研究的論文。這些出版社出版的部分專輯中有半數或超過半數的文章都與翻譯過程的眼動研究相關。國內學者劉艷梅、冉詩洋和李德鳳 (ibid.) 對眼動追蹤技術與翻譯研究結合的可行性與代表性研究做了宏觀介紹，馬星城 (2017) 介紹了近年來視譯過程的相關眼動研究，這些介紹為國內學者瞭解眼動技術在翻譯過程研究中的進展提供了參考。不過，這些研究尚未涵蓋最新的研究，而且介紹也不夠詳盡，本文聚焦2007年至2017年最新的翻譯過程眼動實證研究，研究範圍包括上述出版社出版的專輯、翻譯學研究國際權威期刊及國內外碩博論文數據庫，蒐集整理關於翻譯過程眼動研究的文獻，回顧並加以評述。

## 二、翻譯過程實證研究概述

傳統的翻譯過程研究主要採用有聲思維法 (think-aloud protocols)，即

譯者在翻譯的同時，說出自己採用的策略、遇到的問題等，是收集思維過程的內省 (introspective) 法。翻譯過程不是機械的語法轉換，而是譯者通過一步步地實施翻譯步驟，達成目標的過程，這些步驟可以通過短時記憶存儲並被回憶 (李德超 2008)。但是這種方法會打斷譯者的翻譯加工思路，而且轉瞬即逝的思維有可能不會被譯者全面回溯。相比之下，能夠實時記錄翻譯行為，並且不打擾譯者正常閱讀和翻譯行為的鍵盤記錄和眼動追蹤，滿足了翻譯研究者在線研究的需求，並日益受到青睞。眼動技術可以客觀準確地記錄眼動發生的時間、眼跳的目標及注視的位置 (白學軍、李馨、閻國利 2015: 85)。利用眼動技術提供的記錄時間來揭示閱讀理解過程的前提是由 Just & Carpenter 提出的兩個理論假設。一是即時加工假說 (immediacy assumption)，即所視即時被加工，完成後眼睛才會移動；二是眼—腦假說 (eye-mind assumption)，即所視即所思，兩個過程同步 (閻國利 2004: 51)。基於這兩個假設，眼動追蹤技術使真實及時記錄並反映翻譯這一轉瞬即逝的認知活動變成了現實。Hvelplund (2011: 18) 考察了1999年到2009年有關譯者認知資源分配的實證研究文獻，發現自1999年至2008年，主要採用鍵盤記錄法，而此後研究者更多採用了眼動追蹤或者眼動與鍵盤記錄相結合的方法。

### 三、翻譯過程的眼動實證研究

目前，眼動追蹤技術與翻譯過程研究的結合主要體現在翻譯閱讀 (如 Jakobsen & Jensen 2008; Schaeffer et al. 2016)、理解與產出的協調 (如 Dragsted & Hansen 2009)、翻譯的方向性 (如 Pavlovic & Jensen 2009; Chang 2009)、翻譯中的並行加工 (如 Balling, Hvelplund & Sjørup 2014)、隱喻

翻譯（如Sjørup 2013）、翻譯中的認知努力（如Hvelplund 2011）及譯者能力（如Ehrensberger-Dow & Massey 2013）等方面。

## A、翻譯閱讀過程的眼動模式研究

很多翻譯活動要求譯者在閱讀中進行語言產出，而這一活動通常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的。翻譯過程的起點是閱讀，學者們對翻譯過程的眼動研究，也都以閱讀為起點，翻譯的閱讀加工自然也成為研究焦點。研究者通過對比不同翻譯水平受試的閱讀情況、操縱閱讀文本信息、比較翻譯閱讀和其他類型的閱讀加工過程、挖掘翻譯閱讀與譯文質量的關係等角度，探究翻譯過程的眼動規律，從而揭示翻譯過程的心理機制。

眼動技術在閱讀研究中取得了長足進步。研究者已經就閱讀中詞加工、句法加工、語段加工和個體差異等方面開展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雖然翻譯中的閱讀研究尚未像閱讀的眼動研究那麼細緻和深入，但是學界也嘗試了一些宏觀的研究，例如比較不同翻譯形式（如筆譯和視譯）的閱讀過程、源語文本與譯語文本的閱讀、翻譯閱讀與其他類型閱讀過程的對比等。此類研究率先由 Dragsted & Hansen（2007）開展。他們運用眼動追蹤、鍵盤記錄和Praat語音軟件等多種技術手段，對比分析了視譯和筆譯兩種翻譯過程及產品的差異。研究表明，較之筆譯者的眼動數據，視譯者的注視次數少、注視時間和凝視時間皆長，這說明視譯者的翻譯過程更加連貫，以局部文本加工為主，而筆譯者經常大面積掃讀源語文本，以整體文本加工為主。Dragsted & Hansen（2009）在 Dragsted & Hansen（2007）的基礎上，擴大了受試數量，結論與之前的研究基本一致。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還考察了一位在視譯與筆譯過程中具有持續優異表現的譯者，通過訪談瞭解到該譯者長期從事口語交際的教學工作，這使其可以輕鬆應對視譯

任務；同時，熟練的盲打技術也有助其筆譯的加工。這些優勢都使他可以高效地配置認知資源，造成極少的停頓，產出更加流利的譯文。

Sharmin, Špakov, Rähä & Jakobsen (2008a, 2008b) 對比了在有/無任務完成時間限制的條件下筆譯過程的注視特徵，發現在有時間限制的條件下，譯者對源語文本的注視時間顯著減少，而對譯語文本的注視時間顯著變長。Hvelplund (2011) 的研究證實了上述研究，並且發現在有時間限制的條件下，注意力單元 (attention units) 影響源語文本的注視，譯語文本的閱讀導致瞳孔直徑增加。上述研究都表明譯語文本比源語文本閱讀更加複雜，對認知資源佔有更具挑戰性，這很有可能是由於譯語文本的閱讀需要同時進行鍵盤輸入、整合源語文本與譯語文本多元處理等因素導致的。

Jakobsen & Jensen (2008) 分析了職業譯員與學生在處理四種任務 (閱讀理解、為筆譯做準備的閱讀、視譯及打字筆譯) 時的認知努力。研究表明，閱讀目的對凝視時間等眼動指標有著明顯的影響，任務複雜與眼動模式存在關聯。基於本研究，Alves, Pagano & da Silva (2011) 開展了相關研究，比較了任務難度依次遞增的三種閱讀活動——閱讀並回答相關問題、閱讀並概述、視譯——對眼動模式的影響。通過對比發現，在總任務時間、注視次數及注視時間等眼動指標上，他們的實驗 (ibid.) 並未出現與 Jakobsen & Jensen (2008) 一致的任務複雜度效應。作者指出，眼動指標的考察除了需要考慮任務複雜度的因素之外，還要考慮受試背景 (語言能力和任務熟悉度等)、任務順序及數據過濾 (filter) 等因素。

學者們不僅針對翻譯閱讀過程本身開展了研究，也針對機器翻譯譯文的譯後編輯 (post-editing) 開展了研究，普遍認為，譯後編輯的閱讀過程與人工翻譯的閱讀過程這兩類認知活動。在眼動指標上差異顯

著。Carl et al. (2011) 通過初步研究 (pilot study) 報告了基於機器翻譯的譯後編輯比人工翻譯更為高效。他們同時注意到源語文本與譯語文本的注視呈非對稱性分佈。Mesa-Lao (2014) 指出譯後編輯對譯語文本注視次數更多，而人工翻譯對源語文本注視和凝視時間更長。Elming, Balling & Carl (2014) 的研究也證實了上述結論。與上述結論不同，Nitzke & Oster (2016) 指出無論是通用文本還是專業文本，譯後編輯和人工翻譯的眼動軌跡在譯語文本上沒有差異，區別僅存在於源語文本的加工上。

近年來，機器學習及人機交互技術的應用，把傳統模式的機器翻譯譯後編輯帶入了與這些新技術相融合的新譯後編輯時代（如Ortiz-Martínez et al. 2016；Alves et al. 2016）。計算機通過在線學習、譯者反饋及時更新參數，從而提高譯後編輯的效率。Alves et al. (2016) 的研究證實了具有實時學習能力的機器翻譯譯後編輯優於傳統的譯後編輯，它可以減少注視時間和注視次數，降低譯者認知負荷。

有關翻譯過程中閱讀研究的最新成果可見Hvelplund (2017) 與Schaeffer et al. (2017)。Hvelplund (2017) 比較了四類閱讀加工：源語文本正常閱讀、源語文本閱讀同時打字筆譯、譯文正常閱讀，以及譯文閱讀並打字編輯，發現四種模式閱讀的注視時間與瞳孔直徑大小具有顯著差異。Schaeffer et al. (2017) 發現閱讀理解與翻譯閱讀在早期眼動指標（如第一遍閱讀）和晚期（凝視時間和總閱讀時間）加工方面的眼動模式上都存在巨大差異，翻譯閱讀的同時激活源語和譯語文本，這對詞彙通達及後詞彙加工過程都有重要意義。經過十年左右的發展，對翻譯的閱讀研究已經從傳統的口筆譯對比研究，拓展到了翻譯中的閱讀與其他自然或非自然情境下的閱讀對比研究，翻譯的閱讀研究也因此得以向縱深發展。此外，最近的研究

也更注重區分早期和晚期眼動指標對翻譯閱讀加工進行更細緻地分析，這都推進了翻譯閱讀加工機制的研究。

## B、對翻譯閱讀文本操控的影響

隨著翻譯過程研究的深入，研究者除了利用眼動技術關注翻譯過程的閱讀加工，同時也深入閱讀過程本身，通過對閱讀文本內部變量的操縱更加細緻地考察翻譯過程。Jensen, Sjørup & Balling (2009) 考察了丹麥語的不同語序對翻譯過程的影響，結果表明與目的語英語語序不同的VS (動詞在主語前) 丹麥語結構帶來了更大的認知負荷。Seeber & Kerzel (2012) 考察了不同德語句式在同聲傳譯過程中認知負荷的差異，與上述研究結論基本一致。

Shreve, Lacruz & Angelone (2010) 通過操控句法複雜度，比較了學生在完成視譯和筆譯任務時候的眼動差異。研究發現，與筆譯過程相比，視譯條件下的複雜句比簡單句引起了更長的注視時間、更多的注視次數和回視等。研究者認為，在筆譯條件下，複雜句不會對短時記憶造成過大壓力，譯者可以隨時重新分配認知資源；然而，視譯者則需要時刻面臨來自源語文本的「視覺干擾」(visual interference) 的挑戰。因此，句法複雜度效應在視譯表達過程中表現地更加明顯。Alves, Gonçalves & Szpak (2014) 運用眼動與鍵盤追蹤的數據對比了關聯理論中概念編碼 (conceptual encoding) 與程序編碼 (procedural encoding) 的加工特點。概念編碼實質為對概念性信息的編碼，主要通過提取實詞實現，程序編碼是指一個詞 (或其他語言表達) 所編碼的信息，是專門為在理解的推理階段引導聽話人至意指的解釋而設置的，主要通過提取虛詞實現。他們的研究表明程序編碼比概念編碼需要更多的認知努力。Schaeffer et al. (2016) 的研

究說明語義與語言結構都會對早期及晚期眼動指標造成影響，並且發現源語與譯語語序的一致性、以及具有較少譯語匹配的源語詞彙都可以產生較強的跨語言啟動 (priming) 效應。同樣，Bangalore et al. (2016) 也發現了英語譯為德語、英語譯為丹麥語及英語譯為西班牙語過程的句法啟動效應。

還有研究通過對比字面表達與隱喻表達來實現對翻譯文本難度的操控。Sjørup (2011; 2013) 先後考察了隱喻文本對翻譯認知加工的影響。研究發現，隱喻文本引起了更長的注視時間，採用直譯而非意譯的翻譯策略為譯者首選，不過譯語與源語不同的隱喻意象會引發更多的認知努力。在語法隱喻方面，Alves, Pagano & da Silva (2014) 結合眼動技術與鍵盤追蹤的方法，證明了無論源語文本是否存在語法隱喻，均不對翻譯加工的認知負荷產生影響。

還有學者對翻譯的方向性 (母語譯出外語和外語譯入母語) 進行了考察，如 Pavlovic & Jensen (2009) 和 Chang (2009; 2011)。這些研究都表明較之外語譯為母語，母語譯為外語會增加認知加工難度。不過，儘管上述研究都採用了注視時間作為眼動指標觀察不同翻譯方向帶來的認知負荷差異，其結果又有矛盾：Pavlovic & Jensen (2009) 在實驗結果中沒有得到由翻譯方向性帶來的顯著性差異，而 Chang (2011) 的研究卻獲得了顯著性差異，而且他認為注視時間可以作為考察翻譯方向性認知負荷差異的有效指標，同時他還提出可以採用眨眼頻率作為認知負荷的考察指標。這些研究中的爭議有待日後深入研究。

上述研究很多體現了母語對二語加工的影響，句序、句子結構的相似性，以及舉發啟動效應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翻譯加工，這些為研究雙語者的語言理解與加工帶來了頗多啟示。



## C、不同水平譯者的眼動模式對比研究

通過比較高低翻譯水平者的翻譯過程，可以找出二者差異，從而針對低水平者開展有效的翻譯訓練。該類研究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卡耐基梅隆大學 McDonald & Carpenter (1981) 的研究。儘管當時的實驗儀器無法與今日同日而語，但是它卻是迄今為止最早的翻譯過程的眼動研究。他們使用美國應用科學實驗室生產的眼動追蹤器，考察了職業譯員與業餘譯者（均為熟練雙語者）在有／無上下文語境線索提示的條件下，理解源語、加工歧義習語（如 *hit the nail right on the head* 等）、視譯以及檢測校正誤譯的過程。該研究表明，在歧義習語興趣區的第一遍閱讀過程中，兩組譯者的閱讀速度與其他研究的默讀速度相仿；當字面義翻譯與下文語境相悖時，譯者將回視歧義習語，重新組塊（*chunking*）。該研究還發現，譯者的注視軌跡與其對歧義習語加工的正確與否相一致。如果加工正確，眼動模式顯示為整體注視歧義習語；相反，如果加工錯誤，則眼動模式為分段注視歧義習語（McDonald & Carpenter 1981: 239–240）。從兩組受試上看，職業譯員能夠成功地對歧義習語進行組塊，並且擁有豐富的目的語表達，而業餘譯者不具備這些技能。

除了對短語結構的翻譯過程開展了研究，學者也開始關注在翻譯過程中更高層的語篇單位——句法結構對不同語言水平譯者眼動模式的影響。Chmiel & Mazur (2010) 考察了會議口譯專業研究生在完成視譯任務時的眼動模式，組間變量為一年級和二年級研究生，組內變量為句法複雜度（簡單句和複雜句）和詞頻。實驗表明，眼動指標在興趣區內既無組內顯著差異，也無組間顯著差異。這一結論與 Shreve, Lacruz & Angelone (2010, 詳見上文) 相悖。作者指出，在判定視譯任務的認知負荷方面，句子可讀性（*readability*）比句法複雜度更為有效。

除了上述從語言材料本身角度對不同水平譯者進行考察，也有研究試圖從其他角度尋找突破。以從源語輸入到譯語產出的時間差為突破口，Timarova et al. (2011) 對比了專家譯員與學生譯員在筆譯中的眼—鍵時距 (eye-keyspan) 與同聲傳譯中的聽—譯時距 (ear-voicespan)。研究發現，專家譯員的眼—鍵時距表現出更加穩定的規律，而學生譯員不具備穩定特徵；兩組受試在同聲傳譯的聽—譯時距未見趨勢性特徵，因此未體現明顯不同。

Ehrensberger-Dow & Massey (2014) 對比了熟手譯員和生手譯員使用網絡資源輔助翻譯的情況。較之生手譯員，熟手譯員在網絡上搜索信息時目的更加明確，注視次數更少，閱讀時間更短。Hvelplund (2016) 採用注意力單元時長 (attention unit duration) 與瞳孔直徑作為考察指標，發現熟手譯員比生手譯員可以更加從容靈活地分配認知資源，具備更大程度的自動加工能力。

還有研究將高低水平者與教學啟示相聯繫，可參見 Pluzyczka (2013)。作者對16名學生和一名職業譯員視譯過程的眼動模式開展了研究。研究發現，較之學生譯員，該職業譯員視譯中的注視次數更少，注視時間更短。但是，與 McDonald & Carpenter (1981) 所持的譯文正確性可以依據眼動特徵來判定的觀點不同，Pluzyczka (2013: 117) 謹慎認為，注視時間與注視次數由譯者的閱讀習慣決定。譯文錯誤分析的結果發現，由語言遷移造成的錯誤佔據較大比例，而熱點圖 (heat maps) 和視線軌跡圖 (gaze plots) 並未捕捉到學生在這些地方的異常眼動，說明學生們對錯誤毫不知情，因此教師應在教學中引導學生有意識地避免語言遷移錯誤的發生。

大多數對不同水平譯者的翻譯加工開展的眼動研究表明，生手譯員與熟手譯員存在加工差異，熟手譯員的注視時間更短，注視次數更少，加工效率更高。

#### D、翻譯策略的眼動研究

翻譯過程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深入瞭解譯者的加工過程，瞭解其加工策略，做到揚長避短，並且把優秀譯員的翻譯策略加以推廣。因此，通過捕捉譯者眼動的軌跡、考察譯者實時採用的翻譯策略，也引起了學者的關注。翻譯策略研究的焦點主要集中於翻譯是序列加工還是並行加工的過程。序列加工是指在完全理解源語輸入的基礎上再進行譯文產出；而並行加工則是指譯文的詞彙單位在源語意義被完全理解之前就被持續並行地激活。Dragsted (2010) 觀察到較之生手譯者，熟手譯者能夠把注意力同步分配給源語文本和譯語文本，採取平行加工模式，而生手譯者更多采用序列加工。

Balling, Hvelplund & Sjørup (2014) 對翻譯策略的研究涉及多種變量：源語與譯語詞序的同異、不同類型的閱讀（翻譯閱讀、一語閱讀和二語閱讀）。研究發現，與譯語相悖的語序引發了更長時間的源語文本凝視，結果支持翻譯過程的平行加工，即源語文本閱讀中對譯語結構有所預期，也從另一側面體現了源語文本對譯語文本句法結構的啟動效應。

Huang (2011) 以閱讀和朗讀作為眼動數據基準，分析母語為漢語的學生視譯過程。實驗表明，學生在視譯初期，主要進行閱讀理解的認知處理；在興趣區的第一遍閱讀之後，才開始進行與翻譯認知相關的信息重組 (reformulation) 和語言產出。其結果支持序列式加工。與此研究類似，Chen (2013) 以職業譯員為受試，以閱讀和朗讀作為眼動數據基準，挖掘職業譯員視譯過程中的眼動規律。研究表明，在興趣區的第一遍閱讀過程中，職業譯員不僅進行閱讀理解，也開始了翻譯相關的認知處理。對比Huang (2011) 的數據，Chen發現兩類受試在視譯過程中採取不同的策略，學生譯員採用序列式加工的翻譯策略，而職業譯員則採用平行式加工的翻譯策略。Chen還對比了兩組受

試譯文的流利性和準確性，結果表明職業譯員的產品質量優於學生譯文質量。作者推論職業譯員在重新閱讀的時候，可以進行比生手譯員信息重組更加高級的「潤色」加工，從而產出更佳的譯文。

除了對並行加工還是序列加工的翻譯策略進行考察，還有學者聚焦翻譯加工的其他策略。Carl et al. (2011) 與 Dragsted & Carl (2013) 利用眼動追蹤與鍵盤記錄結合的辦法考察了專家和學生譯員的譯語產出模式，發現熟手譯員更傾向於拿來就譯、小語境計劃，譯後修改的模式，而學生譯員則更傾向於在開始階段通篇適應、大語境計劃、隨譯隨改的策略。

對翻譯策略加工的研究進一步印證了不同水平譯者之間的差異，尤其是熟手譯者採用平行加工模式，這使得熟手譯者有著更加高效的翻譯加工過程。

## E、與翻譯產品相關的眼動研究

在翻譯過程研究的一個重要作用是服務翻譯教學，提高譯文質量。因此，許多學者嘗試把眼動技術蒐集到的視譯過程數據與譯文質量相結合的研究。

借鑑口語流利性研究的維度，翻譯過程研究者也開展了有關翻譯產品流利性的考察。例如，上文提到的 Dragsted & Hansen (2007) 不僅分析了筆譯與視譯的閱讀眼動模式，還依照停頓、準確性、直譯與意譯等指標考察了產品質量，發現筆譯譯文質量並不優於視譯譯文。由此，作者認為花費近12倍的時間進行筆譯，得不償失，建議在筆譯訓練中應引導譯者更相信第一直覺的目的語輸出。

Dragsted & Hansen (2008) 結合譯者的眼動特徵，發現 Translog 記錄的停頓並不足以說明譯者雙語轉換代價，所以把停頓作為翻譯區

段 (translation segments) 有其局限性，也正是基於此項研究作者提出了頗具影響力的眼—鍵時距概念。Shreve, Lacruz & Angelone (2010; 2011) 比較了視譯與筆譯產出中的停頓、重複及修補等非流利 (disfluency) 現象，發現源語中的難點對視譯造成了更大的干擾，眼動指標與非流利產出有明顯的相關性 (apparent correlation)，而且譯文非流利現象也是採用「延時修補策略」的結果 (Shreve, Lacruz & Angelone 2011: 116)。

再如，Su (2013) 分析了母語為漢語的學生在譯文產出中的停頓現象，指出不同位置的停頓代表了不同的認知處理過程 (Boomer & Dittman 1962)。在第一遍和第二遍閱讀中，學生譯員產生較多的伴隨結構停頓 (juncture pause，指正常語法停頓) 的注視，而且會注視後面即將產出的語篇，這表明學生在視譯初期，理解並重組即將產出的內容；而在第三遍閱讀中，學生譯員多產生伴隨遲疑停頓 (hesitation pause，指句中由於產出困難引起的停頓) 的注視，而且停頓多以回視開始，這表明困難的字詞、句法對受試造成了較大的認知負荷，受試正在自我監測譯文的產出。Su認為，學生譯員的認知處理過程與自然語言 (spontaneous speech) 產出過程極為相似。Hsieh (2014) 在Huang (2011)、Chen (2013) 和Su (2013) 研究的基礎上，採用多元論證法 (triangulation)，對比分析學生譯員和職業譯員在視譯過程中的停頓差異。研究發現，從結構停頓和遲疑停頓的數量上看，職業譯員均少於學生譯員；並且學生譯員的遲疑停頓比結構停頓更多。眼動數據分析顯示，兩組受試在結構停頓和第一遍閱讀過程中的注視位置截然不同，學生譯員傾向於向前閱讀，即興趣區右側，而職業譯員關注正在翻譯的部分，注視點位於興趣區內；另外，學生譯員在結構停頓與遲疑停頓中的注視次數也明顯多於職業譯員。因此，作者推斷，職業

譯員的認知加工過程與學生譯員不同，也不同于自然語言產出過程。

翻譯過程研究者不僅聚焦了翻譯流利性的考察，也著眼於不同源語對翻譯產品質量的作用。Korpál (2012) 分別以德語與英語作為源語邀請受試進行視譯，發現德語源語的視譯產生了更多的注視次數、更長的注視時間和凝視時間，並且譯文質量也相對較差。作者認為以動詞結尾的德語句式及複合名詞的德語詞形比相同語義的英語句式及非複合英語詞形產生了更大的翻譯認知負荷，源語的特定語言對 (language-pair specificity) 差異很有可能對翻譯過程和產品帶來影響。

由上述瞰覽可以看出，近十年來，翻譯過程的眼動研究探究了翻譯過程的閱讀活動、文本因素、個體差異、翻譯策略和產品質量等諸多方面，這些實驗提供的注視時間、注視次數、凝視時間和注視位置等眼動數據，較好地揭示了翻譯過程的實時特徵，取得了眼動追蹤翻譯過程的一些成就。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以往的研究還存在一些問題，有待解決。

## 四、問題與展望

未來研究可以在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和與理論構建等方面不斷完善先前研究，將翻譯過程的眼動研究推向深入。

### A、研究內容有待深化

首先，學界對翻譯閱讀和翻譯策略的研究數量較多，但是對翻譯過程中的記憶研究較少。實際上，翻譯者，尤其是口譯或視譯者，如何在即席的條件下迅速提取目的語，如何在句子複雜的情況下做好信息保持和處理，都依賴於良好的記憶能力，尤其是良好的工作記憶能

力。大量眼動實證研究表明，工作記憶與閱讀推理、閱讀能力及歧義句加工等關係密切。然而，翻譯過程中的工作記憶與翻譯閱讀及翻譯產品，尤其是視譯閱讀及視譯產品等變量之間的關係，還有待研究。第二，不同源語、不同方向翻譯的比較研究略顯不足。母語信息和外語信息在人們理解、存儲、提取等環節上差異顯著（桂詩春，2000：390—399）。因此，有必要利用眼動儀器深入追蹤不同方向的翻譯過程在眼動模式上會帶來哪些異同，以及不同源語輸入對譯者翻譯的過程及產品造成的影響。這些問題的回答將有助於學界加深人們對不同源語信息的提取、組塊等加工過程的理解。再次，研究結果的相悖之處需要深入探究。眼動特徵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翻譯譯文產出的正確性，不同學者給出了近乎相反的結論：任務複雜度效應也似乎只是在有些實驗中有所顯現，而在其他研究中並未出現。這些相悖的實驗結論值得深思，如何在實驗中有效地剔除干擾變量，使用哪種數據分析及過濾方法，可以更加客觀真實地還原翻譯過程的實質，以及如何解釋所得到的相似或者相悖的結論，都有待學者們探索解惑。

## B、如何有效地開展翻譯專長研究有待探索

翻譯專長研究離不開“職業譯員”，而首先要解決的就是職業譯員的定義問題。翻譯界並沒有職業譯員這一說法或職業，大多數翻譯實驗的職業譯員都以從事口譯為主。並且，不同實驗中的職業譯員從事口譯的時間也不盡相同，三年、五年、十年，更長或更短，所以職業譯員的界定缺乏一個操作定義。實際上，可以借鑒PETRA項目對翻譯專長的概念（Martín 2009：25），結合翻譯實踐，細化其中的具體指標，擺脫經驗主義對職業譯員的桎梏，從而使得對職業譯員的翻譯專長研究在操作上有的放矢。其次，使用不同種類的眼動儀器從不同角

度對職業譯員的翻譯過程進行深入探索。遙測式眼動儀允許受試可以在較大範圍頭動，讓受試在自然的狀態下進行實驗，基本上可以保證翻譯研究的生態效度；而桌面式眼動儀可以獲得卓越的注視精度和超高的空間分辨率。因此，二者之間的選擇是研究者在進行翻譯研究時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具體來講，如果生態效度至關重要，就可以選用遙測式眼動儀，通過控制字號大小和每行字數等辦法平衡生態效度與數據準確性之間的關係（Korpál 2015: 208）；如果想捕捉職業譯員精準的眼動軌跡，可以採用採樣率高的桌面式眼動儀。另外，目前所蒐集到的職業譯員在翻譯過程中的眼動模式是零散的，還不足以系統歸納總結出職業譯員翻譯過程的眼動規律，這就需要學界進一步努力，嚴格界定實驗變量，如句法複雜度和任務複雜度等概念，增大受試樣本量，對比分析不同類型職業譯員的翻譯專長者的眼動模式，揭開整個翻譯過程眼動規律的神秘面紗，進而還可以與其他認知活動的眼動模式橫向對比，促進專長研究的縱深發展。

### C、研究方法可以更加多樣化

首先，可以嘗試採用縱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y）的方法。現有的翻譯研究都比較關注此時此刻譯者的表現，缺乏對翻譯技能發展變化連續性的考察，而專長是可以通過練習，尤其是刻意練習（deliberate practice）獲得的（Ericsson, Krampe & Tesch-Romer 1993）。在不同時間對相同個體的視譯能力進行測量，同時瞭解譯員期間如何練習，發現他/她進步與否，都可以從方向上為翻譯練習和翻譯教學帶來頗多啓示。其次，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相結合似乎更加科學可靠。通過眼動儀器，可以蒐集到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眼動情況的實時表現，而這些眼動數據的解讀如果只靠研究者借助統計工具的分析梳理，恐



怕未必能代表譯者認知加工的全部過程，因此有必要通過同步錄音錄像、語音轉寫、語音分析軟件和譯後訪談等多種手段，對所蒐集到的眼動數據進行全方位解讀，瞭解譯者翻譯過程中的所看所思所想，避免由實驗者依據定量的眼動數據進行主觀分析所帶來的狹隘。再次，目前的很多眼動儀已經實現了與腦電和核磁共振技術的同步記錄。因此，眼動技術可以結合腦電及核磁共振等手段同步探測翻譯過程，全面揭示翻譯過程實質。

#### D、翻譯過程理論模型的構建

現有的翻譯過程模型（Weber 1990; Gile 1995; Agrifoglio 2004; 萬宏瑜，2006）雖然涉及了翻譯過程中的閱讀、記憶、協調和產出這幾個不可或缺的翻譯過程元素，但是這些元素是怎樣發生的，元素之間又有何關聯，現有的翻譯理論模型沒有解釋。另外，微觀上說，筆譯、口譯或視譯之間有何區別與聯繫？視覺干擾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譯者的閱讀與翻譯？這些問題也還不能從現有的模型和解釋中找到合理的回答。令人欣慰的是，眼動追蹤技術可以幫助人們記錄視譯的實時過程，透過眼動的軌跡深入瞭解人們的認知過程，在揭示翻譯過程心理實質的基礎上，建立更加科學合理的翻譯認知模型。

### 五、結語

本文主要回顧並且評述了近十年來翻譯過程中眼動研究的最新進展。借助眼動儀器，學者們已經對職業譯員、學生譯員在進行翻譯任務過程中閱讀的特徵、採取的策略，以及產品質量等方面進行了探索。隨著眼動技術的發展，人們對翻譯過程研究的深入，透過更加細

微的眼睛變化的軌跡，相信學者們一定可以透過「心靈之窗」揭開更多翻譯過程的秘密。

\*本文在研究過程中得到了作者主持的中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項目“英漢視譯過程的眼動研究”(項目編號15 YJCZH098)的資助。特此鳴謝。

## 參考文獻

- Agrifoglio, Marjorie (2004). "Sight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nstraints and Failures". *Interpreting* 6(1): 43–67.
- Alves, Fabio, Adriana Pagano and Igor da Silva (2011). "Towards an Investigation of Reading Modalities in/for Translat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Using Eye Tracking Data". In *Cognitive Explorations of Translation*. Ed. Sharon O'Brien. London: Continuum, 175–196.
- (2014). "Effortful Text Production i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9(1): 25–51.
- Alves, Fabio, Arlene Koglin, Bartolomé Mesa-Lao, Mercedes García Martínez, Norma B. de Lima Fonseca, Arthur de Melo Sá et al (2016). "Analysing the Impact of Interactive Machine Translation on Post-editing Effort". In *New Directions in Empirical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Exploring the CRITT TPR-DB*. Eds. Michael Carl, Srinivas Bangalore and Moritz Schaeffer. New York: Springer, 77–94.
- Alves, Fabio, Jose Luiz Gonçalves, and Karina. S. Szpak (2014). "Some Thoughts about the Conceptual/Procedural Distinction in Translation: A Key-Logging and Eye-Tracking Study of Processing Effort". In *MonTI Special Issue: Minding Translation, Con la traducción en mente*. Ed. R. Muñoz Martín. Alicante: Publicaciones de la universidad de Alicante, 151–175.
- Balling, Laura Winther, Kristian Tangsgaard Hvelplund and Annette C. Sjørup (2014). "Evidence of Parallel Processing During Translation". *Meta* 59(2): 234–259.
- Bangalore, Srinivas, Bergljot Behrens, Michael Carl, Maheshwar Ghankot, Arndt Heilmann and Jean Nitzke (2016). "Syntactic Variance and Priming Effects in Translation". In *New Directions in Empirical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Exploring the CRITT TPR-DB*. Eds. Michael Carl, Srinivas Bangalore, and Moritz Schaeffer. London: Springer, 211–238.

- Boomer, Donald S., and Allen T. Dittman (1962). "Hesitation Pauses and Juncture Pauses in Speech". *Language and Speech* 5(4): 215–220.
- Carl, Michael, Barbara Dragsted, Jakob, Daniel Hardt and Arnt L. Jakobsen (2011). "The Process of Post-Editing: A Pilot Study". In Proceedings of the 8th International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Cognitive Science Workshop. Eds. Bernadette Sharp, Michael. Zock, Micheal Carl, and Arnt L. Jakobsen.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131–142.
- Chang, Chieh-Ying (2009). *Testing Applicability of Eye-tracking and fMRI to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An Investigation into Directionality*. Ph.D. Dissertation,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 (2011). "Translation Directionality and The Revised Hierarchical Model: An Eye-Tracking Study". In *Continuum Studies in Translation: Cognitive Explorations of Translation*. Ed. Sharon O'Brien. London: Continuum, 154–174.
- Chen, Deh-I (2013). *Differences in Comprehension Process Between Experienced and Novice Interpreters—An Eye Movement Study*. M.A.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Chmiel, Agnieszka and Iwona Mazur (2010). "Eye Tracking Sight Translation Performed by Trainee Interpreters". In *Tracks and Trek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Eds. Catherine Way, Sonia Vandepitte, Reine Meylaerts and Magdalena Bartłomiejczyk.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89–205.
- Doherty, Stephen and Sharon O'Brien (2014). "Assessing the Usability of Raw Machine Translation Output: A User-Centered Study Using Eye Trac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30(1): 40–51.
- Dragsted, Barbara (2010). "Coordination of Reading and Writing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 Eye on Uncharted Territory". In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Eds. Gregory M. Shreve and Erik Angelon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41–62.
- (2008). "Comprehension and Production in Translation: a Pilot Study on Segmentation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Reading and Writing". In *Looking at Eyes: Eye Tracking Studies of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Processing*. Eds. Susanne Göpferich, Arnt L. Jakobsen and Inger M. Mees.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9–29.
- (2009). "Explor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Hybrids: The Case of Sight Translation". *Meta* 54(3): 588–604.

- and Inge Gorm Hansen (2007). “Speaking Your Translation: Exploiting Synergies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In *Interpreting Studies and Beyond*. Eds. Franz Pöchhacker, Arnt L. Jakobsen and Inger M. Mees.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251–274.
- and Michael Carl (2013). “Towards a Classification of Translation Styles Based on Eye-tracking and Keylogging Data”. *Journal of the Writing Research* 5(1): 133–158.
- Ehrensberger-Dow, Maureen, and Garry Massey (2013). “Indicators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Translators’ Self-Concepts and the Translation of Titles”. *Journal of Writing Research* 5(1): 103–131.
- and Garry Massey (2014). “Cognitive Ergonomic Issues in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from Psycholinguistics and Cognitive Science*. Eds. John W. Schwieter and Aline Ferreira.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58–86.
- Elming, Jakob, Laura W. Balling and Michael Carl (2014). “Investigating User Behaviour in Post-Editing and Translation Using the CasMaCat Workbench.” In *Post-Editing of Machine Translation*. Eds. Sharon O’Brien, Laura W. Balling, Michael Carl, Michael Simard, and Lucia Specia.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147–169.
- Ericsson, K. Anders, Ralf T. Krampe and Clemens Tesch-Romer (1993). “The Role of Deliberate Practice in the Acquisition of Expert Performance”. *Psychological Review* 100(3): 363–406.
- Gile, Daniel (1995).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Hsieh, Jen-hsuan (2014). *Comparing Cognitive Processes during Pauses Between Experienced Interpreters and Novice Interpreters: Eye Movements In Sight Translation*. M.A.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Huang, Chih-Chieh (2011). *Tracking Eye-Movements in Sight Translation-the Comprehension Process in Interpreting*. M.A.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Hvelplund, Kristian Tangsgaard (2011). *Allocation of Cognitive Resources in Translation: An Eye-tracking and Key-logging Study*. Ph.D. dissertation,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 (2016). “Cognitive Efficiency in Translation”. In *Reembedding Translation*

- Process Research*. Ed. Ricardo Muñoz Martí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49–170.
- (2017). “Four Fundamental Types of Reading During Translation”. In *Translation in Transition: Between Cognition, Computing and Technology*. Eds. Arnt L. Jakobsen and Bartolomé Mesa-Lao.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Jakobsen, Arnt Lykke and Kritian T. H. Jensen (2008). “Eye Movement Behaviour Across Four Different Types of Reading Task”. In *Looking at Eyes: Eye-Tracking Studies of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Processing*. Eds. Susanne Göpferich, Arnt L. Jakobsen and Inger M. Mees.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103–124.
- Jensen, Kritian T. H., Annette C. Sjørup and Laura W. Balling (2009). “Effects of L1 Syntax on L2 Translation”. In *Methodology,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Eds. Inger M. Mees, Fabio Alves and Susanne Göpferich.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319–336.
- Korpala, Paweł (2012). “On Language-Pair Specificity in Sight Translation: An Eye-Tracking Study”. In *Internationale Fachkonferenz des BDÜ: Übersetzen in die Zukunft*. Eds. W. Baur, S. Kalina and F. Mayer. Berlin: BDÜ Fachverlag, 522–530.
- (2015). “Eye-tracking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The Growing Popularity and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Accessing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Eds. L. Bogucki and M. Deckert.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99–212.
- Martín, Ricardo Muñoz (2009). “Expertise and Environment in Translation”. *Mutatis Mutandis: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Traducción* 2(1): 24–37.
- McDonald, Janet L. and Patricia A. Carpenter (1981). “Simultaneous Translation: Idiom Interpretation and Parsing Heuristics”.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20(2): 231–247.
- Mesa-Lao, Bartolome (2014). “Gaze Behaviour on Source Texts: An Exploratory Study Comparing Translation and Post-Editing”. In *Post-Editing of Machine Translation: Processes and Applications*. Eds. Sharon O’Brien, Laura Winther Balling, Michael Carl, Michel Simard and Lucia Specia.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19–245.
- Nitzke, Jean, and Katharina Oster (2016). “Comparing Translation and Post-Editing: An Annotation Schema for Activity Units”. In *New Directions in Empirical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Exploring the CRITT TPR-DB*. Eds. Michael

- Carl, Srinivas Bangalore and Moritz Schaeffer. London: Springer, 293–308.
- O'Brien, Sharon (2007). "Eye Tracking and Translation Memory Matches".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14(3): 185–205.
- (2008). "Processing Fuzzy Matches in Translation Memory Tools: An Eye Tracking Analysis". In *Looking at Eyes: Eye Tracking Studies of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Processing*. Eds. Susanne Göpferich, Arnt L. Jakobsen and Inger M. Mees.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79–102.
- Ortiz-Martínez, Daniel, Jesús González-Rubio, Vicent Alabau, Germán Sanchis-Trilles and Francisco Casacuberta (2016). "Integrating Online and Active Learning in a Computer-Assisted Translation Workbench". In *New Directions in Empirical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Exploring the CRITT TPR-DB*. Eds. Michael Carl, Srinivas Bangalore and Moritz Schaeffer. New York: Springer, 57–76.
- Pavlović, Nataka and Kristian T. H. Jensen. (2009). "Eye Tracking Translation Directionality". In *Translation Research Projects 2*. Eds. Anthony Pym and Alexander Perekhrenko. Tarragona: Intercultural Studies Group, 93–109.
- Plużyczka, Monika (2013). "Eye-Tracking Supported Research into Sight Translatio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Eye-Tracking Analysis*. Eds. Sambor Gruzca, Monika Plużyczka and Justyna Zajac.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05–138.
- Schaeffer, Moritz, Barbara Dragsted, Kristian Tangsgaard Hvelplund, Laura Winther Balling and Michael Carl (2016). "Word Translation Entropy: Evidence of Early Target Language Activation During Reading for Translation". In *New Directions in Empirical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Exploring the CRITT TPR-DB*. Eds. Michael Carl, Srinivas Bangalore and Moritz Schaeffer. New York: Springer, 183–210.
- Schaeffer, Moritz, Kevin B. Paterson, Victoria A. McGowan, M. J. White and Kristen Malmkjær (2017). "Reading in Translation". In *Translation in Transition: Between Cognition, Computing and Technology*. Eds. Arnt L. Jakobsen and Bartolomé Me-sa-Lao.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7–54.
- Seeber, Kilian. G. and Dirk. Kerzel (2012). "Cognitive Load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Model Meets Dat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16(2): 228–242.
- Sharmin, Selina, Špakov, Oleg, Räihä, Kari-Jouko and Arnt Lykke Jakobsen (2008a). "Effects of Time Pressure and Text Complexity on Translator's Fixations". *Pro-*

- ceedings of Eye Tracking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symposium (ETRA 2008)*. New York: ACM Press, 123–126.
- (2008b). “Where on the Screen Do Translation Students Look While Translating and for How Long?” In *Looking at Eyes: Eye-Tracking Studies of Reading and Translation Processing*. Eds. Susanne Göpferich, Arnt L. Jakobsen and Inger M. Mees. Copenhagen: Samfundslitteratur, 31-51.
- Shreve, Gregory M., Isabel Lacruz and Erik Angelone (2010). “Cognitive Effort, Syntactic Disruption and Visual Interference in a Sight Translation Task”. In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 Eds. Gregory M. Shreve and Erik Angelon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53–84.
- (2011). “Sight Translation and Speech Disfluency”. In *Methods and Strategies of Process Research: Integrative Approach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Eds. Cecilia Alvstad, Adelina Hild and Elisabet Tiseliu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93–120.
- Sjørup, Annette Camilla (2011). “Cognitive Effort in Metaphor Translation: An Eye-Tracking Study”. In *Continuum Studies in Translation: Cognitive Explorations of Translation*. Ed. Sharon O’Brien. London/New York: Continuum, 197–214.
- (2013). *Cognitive Effort in Metaphor Translation: An Eye-tracking and Key-logging Study*. Ph.D. dissertation,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 Su, Ya-Wei (2013). *Cognitive Process During Pauses in Interpreting Output: from Eye Movements in Sight Translation*. M.A. Thesis,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Timarová, Sárka, Barbara Dragsted & Inge G. Hansen (2011). “Time Lag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In *Methods and Strategies of Process Research: Integrative Approach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Eds. Cecilia Alvstad, Adelina Hild and Elisabet Tiseliu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21–146.
- 白學軍、李馨、閆國利 (2015), 〈漢語閱讀眼動控制：20年研究的總結〉,《心理發展與教育》1: 85–91。
- 桂詩春 (2000),《新編心理語言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李德超 (2008),〈有聲思維法在翻譯教學中的運用——TAPs翻譯研究對翻譯教學的啓示〉,《中國翻譯》6: 34–39。
- 劉艷梅、冉詩洋、李德鳳 (2013),〈眼動法在翻譯過程研究中的應用與展望〉,《外國語》5: 59–66。

馬星城 (2017), 〈眼動追蹤技術在視譯過程研究中的應用——成果、問題與展望〉, 《外國語》2: 81-90。

萬宏瑜 (2006), 視譯過程的認知研究對本科口譯教學的啟示, 博士學位論文, 上海外國語大學。

閻國利 (2004), 《眼動分析法在心理學研究中的應用》,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 作者簡介

劉曉萍, 天津外國語大學副教授, 北京外國語大學博士生, 研究興趣為心理語言學及語言跨學科研究, 已在《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及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等國內外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廿餘篇。

電郵: lxpjts@126.com。

范琳,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 博士, 博士生導師, 研究興趣為心理語言學, 已在 *Cognition and Emot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外語教學與研究》、《當代語言學》、《外國語》、《現代外語》、《外語研究》等國內外期刊發表論文近百篇。



# **Translating Ma Yuan's Metafiction: An Analysis of the Loss of Self-reflexivity in Herbert Batt's Translation of "The Spell of the Gangdise Mountains" ("Gangdisi de youhuo" 岡底斯的誘惑)**

*William Gatherer*

## ***Abstract***

*Ma Yuan 馬原 (1953– ) is wide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uthors of the Chinese "avant-garde movement" (xianfengpai 先鋒派) of the 1980s and has been accredited as being one of China's first authors of "metafiction" (yuanxiaoshuo 元小說). Ballad of the Himalayas: Stories of Tibet is the first dedicated collection of Ma Yuan's works to appear in English and is a collection of translations of short stories and novellas including "Gangdisi de youhuo" 岡底斯的誘惑, which is arguably one of the author's most famous works. This paper will analyse "The Spell of the Gangdise Mountains", Herbert Batt'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Gangdisi de youhuo", to determine how the text's complex self-reflexive narrative structure is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This study will conclude that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mplemented by the translator have resulted in a radically-altered translated text in comparison to the original and that, in particular, many of the original text's self-reflexive devices have been lost thereby significantly altering the*

*potenti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ext.*

*Keywords: Ma Yuan, metafiction,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avant-garde fiction.*

## 1. Introduction:

Ma Yuan 馬原 is highly regarded within China as being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uthors of “experimental literature” (*shiyuan wenxue* 試驗文學) within the “avant-garde movement” (*xianfengpai* 先鋒派) of the 1980s and has been accredited as being one of China’s first authors of “metafiction” (*yuanxiaoshuo* 元小說). Interest in Ma Yuan’s work was recently reignited within China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Niugui sheshen* 牛鬼蛇神 in 2012 after it had been assumed that the author had permanently withdrawn from a prolific writing career, having not published any work of fiction for over twenty years. Within China, therefore, Ma Yuan is still seen as a provocateur and innovator and his works (the majority of which are short stories and novellas) that revolutionised fiction in the 1980s are still seen as challenging and iconoclastic. Outside of China, Ma Yuan’s influence has been significantly less pronounced largely due to the fact that relatively few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his works are available. In 1992, just after Ma Yuan had reached the peak of his influence in China, Henry Zhao’s excellent article “Ma Yuan the Chinese Fabricator”(1995) alerted many readers to the brilliance of China’s influential author of metafiction, however translations have remained relatively sparse. Herbert Batt’s recently published *Ballad of the Himalayas: Stories of Tibet* (2011) is the first dedicated collection of Ma Yuan’s works to appear i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this in itself is a great and long overdue milestone in providing English speakers access to the author’s works. Herbert Batt’s collection contains translations of eight short stories and novellas by Ma Yuan, including arguably the author’s two most famous works, “Xugou” (*Fabrication* 虛構) and “Gangdisi de youhuo” 岡底斯的誘惑<sup>[1]</sup> translated here as “The Spell of the Gangdise Mountains”. Many literary critics have attempted to analyse “Gangdisi de youhuo” in an attempt

to pin down the key structural and thematic features of the author's writing. In particular, "Gangdisi de youhuo" is often presented as a "fragmented" or "kaleidoscopic"<sup>[2]</sup> narrative suggesting a mixture of postmodern structural destabilisation in which narratives are somehow refracted or fragmented, alongside a kind of Bakhtinian multivocal text that seemingly jumps between different voices, representations and contexts. Fundamentally, however, "Gangdisi de youhuo" is a narratologically complex and highly self-reflexive text which should be interpreted with a detailed understanding of literary self-reflexivity and narratology, so that the text can be read through its "fragmented" metafictional structure.

This paper will draw on various facets of metafiction theory and narratology to engage i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Herbert Batt's translation against the original text.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evidence that Herbert Batt's translation of "Gangdisi de youhuo" has produced a text which is radically different to the original, to the extent that the original and translation hav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terpretive possibilities. In essence, some of the strategies that the translator has used to translate "Gangdisi de youhuo" have greatly reduced the text's self-reflexivity and because of this I argue that Herbert Batt's "The Spell of the Gangdisi Mountains" and Ma Yuan's work of metafiction "Gangdisi de youhuo" have to be considered as radically different texts.

## **2. Metafiction and Narrative Theory**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 translated work of metafiction, this paper will draw upon key works of metafiction theory and aspects of narratology to engage in the following three stag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Gangdisi de youhuo": Firstly I will provide an overview of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metafictional features of the original text. Secondly I will identify any significant structural and textual deviations within the translation in comparison to the original. Thirdly I will provide conclusions on how the translated text functions in a different way to the original thereby assessing its adequacy as an accurate translation.

Within this framework a key element of evaluating the relative merits of Batt's translation is a detailed deconstruction of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self-reflexive devices of the original text. "Gangdisi de youhuo" is a highly metafictional text which employs a range of self-reflexive devices which influence the interpretive possibilities of the text in highly specific ways. Whilst no one single theorist single-handedly established the concept of metafiction, Patricia Waugh's *Metafic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lf-conscious Fiction* is perhaps the central text within metafiction theory. In this ground-breaking work Waugh gives the following overarching description of metafictional texts:

*Metafiction* is a term given to a fictional writing which self-consciously and systematically draws attention to its status as an artefact in order to pose questio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ction and reality. In providing a critique of their own methods of construction, such writings not only examine the fundamental structures of narrative fiction, they also explore the possible fictionality of the world outside the literary fictional text. (Waugh 1984: 2)

Within Waugh's excellent exploration of the then relatively newly established genre of metafiction, the concept of "self-reflexivity" is examined as a unique literary characteristic that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within works of metafiction. In addition to basing my approach to metafiction on Waugh's intricate exploration of the dynamics of literary self-reflexivity, I will be drawing heavily upon the work of Wenche Ommundsen. In *Metafictions?* (1993) Ommundsen provides an interpretation of metafiction through her "three models" approach whereby metafiction can be understood as a genre, as a tendency inherent in all fiction, and as a form of reading.<sup>[3]</sup> Whilst Ommundsen presents these three individual possibilities for how metafiction can be understood, it is not possible to isolate any one individual model as the "correct" way to approach metafictions. Instead, these three models themselves are mutually reliant upon each other to the extent that metafiction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a literary genre, literary tendency and a form of reader response. What this means within a deconstruction of the

metafictional elements of Ma Yuan's works is that literary self-reflexivity is an intricate concept that is inherently linked to naturalised literary conventions; any translation of a metafiction therefore must take great care to ensure that the text's overt declarations of fictionality in which the text "draws attention to its status as an artefact" (ibid.) must be faithfully maintained; any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at in any way diminish the self-reflexive qualities of the text will have a serious impact on how the translated text functions.

In addition to a basic grounding within metafiction theory, as "Gangdisi de youhuo" has an intricate narrative structure, specific narratological tools are required to be able to identify the basic structural components of the text accurately. In particular, Ma Yuan's works have often been identified as containing "narrative shifts" in which the text seems to jump between different "view points" or "perspectives". The narratologist Mieke Bal addresses some of the problems with vague terms such as "perspective" and "view point" which to her convey the idea of a "psychosomatic process, strongly dependent on the position of the perceiving body". Defining a narrative process using these heavily personalised terms causes difficulties when dealing with a text that does not come from an identifiable character or personalised narrator figure. This concept also becomes problematic through the narration of elements that are not normally perceivable to the character or narrator from whose perspective we are "viewing" events. However the main issue with referring to narrative perspective or viewpoint is that:

They do not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on the one hand, the vision through which the elements are presented, and on the other, the identity of the voice that is verbalising that vision. To put it more simply: they do not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ose who see and those who speak. (Bal 1985: 143)

In addressing these inconsistencies Bal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narrative focalisation" a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which can avoid some of the ambiguities of referring to "view points" and "perspective" and resolve the fundamental issue of identifying through whom (or what) a piece of narrative

is perceived and represented within the text. Bal's (1985: 142) theory of focalisation broadly refers 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elements presented and the vision through which they are presented". The concept of focalisation is made up of two elements, that which sees, and that which is seen. These terms are described as the focaliser and the focalised object, representing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of the focalisation process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Bal also differentiates between internal or "character-bound" focalisation and "external" focalisation: Character-bound focalisation essentially refers to the text being presented through the perception of a particular character within the text. This focalisation can include both first- and third-person narratives but the key element of this concept is that the narrative focalisation is logically identifiable as deriving from a particular character within the text. External focalis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s when the narrative is being perceived through an "anonymous agent" outside of the events and characters within the text. Within my analysis therefore I will b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various "focalisers" within the text as this is a key narratological tool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how one the text's key self-reflexive devices (i.e., it's frequently shifting poly-vocal narrative) is able to function. Fundamentally this study will address the following key questions:

- 1) Wha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has Herbert Batt used to translate "Gangdisi de youhuo" and have there been any significant omissions, restructuring, or modifications made to the English text?
- 2) To what extent have the specific metafictional features of the original text been lost with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 3) How i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Gangdisi de youhuo"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text and what implications does this have on how the translated text can be interpreted?

This paper will evaluat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Gangdisi de youhuo" through 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which incorporates specific literary theories and narratological tools, which are crucial to a complete literary analysis of the original text in order to analys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ranslation.

### 3.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Original Text and the Translated Text

####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Gangdisi de youhuo”

When critics refer to Ma Yuan's narrative as “fragmented” and “kaleidoscopic” they are more than likely referring to “Gangdisi de youhuo”, which is perhaps one of the author's most complex narratives. In particular, the narrative focalisation structure of “Gangdisi de youhuo” is extremely complex and at times highly ambiguous to the extent that the reader is frequently unable to determine who is “speaking” within the text and to whom. In addition, the main narrative threads within the texts are heavily intertwined and often hard to differentiate as the text appears to jump between different voices and different narratives in a highly disorientating manner. After a careful analysis of each chapter within the text, however, the following narratives and focalisers can be identified:

**Narrative one** (Qiongbu's narrative): Chapters 3 and 6

Narrative focalisation: external focalisation, second-person narration

Narrative focaliser: possibly the “old author”

**Narrative two** (the sky burial): Chapters 4, 8 and 10

Narrative focalisation: external focalisation, “reader” addressee present

Narrative focaliser: unknown

**Narrative three** (Dhonyo and Dhondop): Chapters 11, 12, 13 and 14

Narrative focalisation: external focalisation, “reader” addressee present

Narrative focaliser: possibly Lu Gao

#### Chapter 1

Narrative focalisation: internal first-person focalisation, direct address<sup>[4]</sup> to

“you” addressee

Narrative focaliser: unknown

**The “old authors’ chapters”:** Chapters 2 and 5

Narrative focalisation: internal first-person focalisation, direct address to “you” addressee and to Qiongbu, Yao Liang and Lu Gao as addressees

Narrative focaliser: the “old author”

**The “analysis chapter”:** Chapter 15

Narrative focalisation: external focalisation, “reader” addressee present

Narrative focaliser: unknown

**The “narrator’s chapters”:** Chapters 7, 9 and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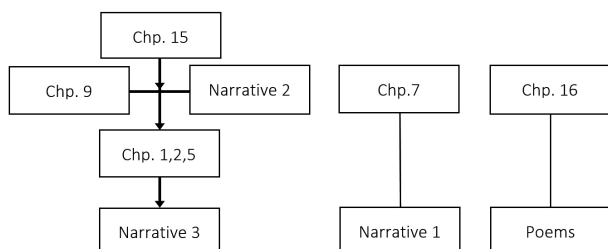
Narrative focalisation: external focalisation, “reader” addressee present

Narrative focaliser: unknown

As can be seen within the outline above, the relevant chapters comprising the different logical narrative threads within the text are often placed “out of sequence”, so, for example, Qiongbu’s narrative is interrupted by the narrative of the sky burial when the reader moves from chapter 3 to chapter 4. Within the transitions from the end of a particular chapter to the beginning of another, the reader is rarely, if at all, given any indication, either through diegetic textual indicators (through conventionalised introductory phrases of contrast like “Meanwhile”, for example) or through extradiegetic subheadings or other conventionalised narrative framing devices, that the narrative has shifted to another “voice” telling a different “story”. The individual logical narratives are therefore interwoven by the text’s chapter sequencing.

In addition to identifying the separate narrative components of the text, it is also possible to analyse the individual narrative levels within which these elements operate. Within the structure below, there are four narrative levels with chapter 15 sitting on the highest level and three subsequent hypodiegetic levels below it.





**Diagram 1** Narrative levels in “Gangdisi de youhuo”

Diagram 1 accommodates each individual element of “Gangdisi de youhuo” and structures them in a four-level narrative hierarchy along the lines of identifying individual narrative focalisers within the text and the individual narrative levels on which they operate. Repeatedly, however, the information required to establish a clear narrative structure for interpreting the text is either unclear or absent. Furthermore, the relationship which each of the 16 chapters within the text share with each other is also complicated by the non-linear ordering of the main narratives in the text. Diagram 1 i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most likely way of interpreting “Gangdisi de youhuo”’s structure whilst accommodating the inherent ambiguities within this structure. Not only are parts of the text ambiguous, but they are also contradictory in that there are numerous logical incompatibilities within the text. For example, the three separate statements from different chapters within the text below all contradict each other in a way that destabilises the text’s narrative structure:

我直說了吧，是叫你參加我的探險隊，我是組織者也是隊長，還有個顧問。

(Ma 1993: 1)

I’ll be straight with you, I’m here to get you to join my expedition, I am an organiser and the group leader, we’ve also got an advisor.

姚亮是隊長，窮布是第一個隊員。(Ma 1993: 4)

Yao Liang was the group leader, Qiongbu was the first member of the group. 經過姚亮推薦，陸高成了這支小隊伍的隊長，姚亮甘當副手。結果是四個人各司其職，都弄了個不大不小的官銜。窮布是嚮導，老作家是當然的顧問。

(Ma 1993: 27)

On Yao Liang's recommendation Lu Gao became the leader of the expedition and Yao Liang was the assistant. As such the four of them all had their duties with each being given his own title. Qiongbu was the guide, the old author was an advisor.

The main contradiction throughout the statements above is the identity of the leader of the expedition and thus the identity of the first-person narrative focaliser of chapter one. If we match up the first statement and the second, then Yao Liang is the expedition leader and therefore the identity of the "I" focaliser in chapter 1. However, the focaliser in chapter 1 explicitly states that he or she is not Yao Liang, and furthermore the identity of the leader of the expedition is contradicted later in the text through being identified as Lu Gao. The process of contradiction therefore has consequences in terms of establishing facts within the narrative but also has wider consequences in terms of the narrative's structure.

In order to analyse "Gangdisi de youhuo"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pproach the text's structure as unstable and contradictory in a narratological sense. The way that this seemingly irresolvable structure can be rationalised and interpreted, however, is to acknowledge that this unstable and contradictory structure acts as a metafictional device within the text and, importantly, any representations within the text are implicitly compromised by this narrative structuring. Although separate logical narrative threads can be located within the text, they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being in the "wrong" place within the text, regardless of the seemingly chaotic chapter organisation of the text. Furthermore, the disorientating polyvocal structure of the text is a direct consequence of a particular focalisation strategy the author has used, which compromises the reader's ability to know who is "speaking" and to whom. Again, this is a core feature of the text and the representations within the text have to be read through the manner in which they are being represented.

"Gangdisi de youhuo" has a complex and highly reflexive narrative structure which inherently influences the way the entire novella can be

interpreted. Given the complexity of the text's structure which I have only briefly deconstructed above, I will now demonstrate how Herbert Batt's "The Spell of the Gangdise Mountains" has altered the text and its narrative structure in such a way that thi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Gangdisi de youhuo" becomes highly problematic. Broadly speaking, Batt's translation alters the nature of the original text in two major ways, firstly through editing out of certain passages within the text, and secondly through radically restructuring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text.

## **B. Textual omissions within the translation:**

It is certainly the case that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process will require a certain degree of editing, modification, shifts in structure and finally deliberate omissions. Given the importance of naturalness of expression within a translated literary work. In this sense, every literary translation will contain a certain level of textual omissions; however, within Batt's translation an extremely large volume of text has been omitted entirely. In total, over 1,400 characters of Chinese text have been omitted from the translation, including an entire chapter (chapter 16) which does not feature in any way within the translated version: These omissions constitute elements of the text that have not been translated at all, rather than text lost as part of a translation shift whereby certain words or phrases are omitted for the sake of an idiomatic translation. Whilst any particularly high volume of omitted text does not necessarily directly correlate to a problematic transl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text that has been omitted reveals that many of the original text's key metafictional elements have been entirely cut out as a consequence. Apart from the complete omission of chapter 16, several key passages in which the text's self-reflexivity is facilitated have been omitted from the translation. Right from the start of the highly self-reflexive first chapter for example, the following text is completely omitted:

可我一直鬧不清楚，姚亮為甚麼要說——《海邊也是一個世界》

呢？我不明白這個字是甚麼意思。莫非姚亮早知道陸高將來要上大學？知

道你大學畢業要到西藏？知道註定還有一個關於陸高的故事：

《西部是一個世界》？不然為什麼姚亮要說：海邊（東部）也是個世界呢？姚亮肯定知道一切。天吶，姚亮是誰？（Ma 1993: 2）

But I've never been sure why Yao Liang would say

*It is also another world by the sea?* I don't understand what the word "also" means here. Could it be that Yao Liang knew that Lu Gao would go to university, and knew that after he graduated he would go to Tibet? Could Yao Liang have known that it was destined that there would be a story about Lu Gao:

*It is another world in the West?* Otherwise why would Yao Liang have said that it is also another world by the sea (in the East)? Yao Liang definitely knows everything. God, who is Yao Liang anyway?<sup>[5]</sup>

Whilst this is by no means the only textual omission within the short opening chapter, it is certainly the most significant. The extremely strong intertextuality in the passage above is entirely removed from Batt's translation, which does not include any references to either of these texts; the first of which is Ma Yuan's first published work and the second of which is a fictional "hypothetical" text connected to the former. As is the case within several other chapters of "Gangdisi de youhuo", Ma Yuan's frequently used Lu Gao/Yao Liang pseudocouple<sup>[6]</sup> often act as "author" figures who have written fictional texts within other texts by Ma Yuan or are (as is the case here) sometimes attributed as being the "authors" of real works by Ma Yuan. The intertextuality omitted within Batt's translation strongly diminishes the self-reflexivity of the Lu Gao/Yao Liang pseudocouple, which, considering the other modifications carried out within chapter 1, appears to be a deliberate strategy on the part of the translator. In addition, the removal of the highly self-reflexive passage above seems to have caused a logical problem with the translation as the original text as follows:

西姚亮講了關於你和陸二的故事，姚亮使我們知道了你，為了這一點我感謝姚亮。（Ma 1993: 2）

Yao Liang told the story about you and Lu 'Er, it's because of Yao Liang that we know about you and for this I have to thank Yao Liang

is translated by Batt as:

Yao Liang wrote that story about Lu Gao in Tibet—he let us know about you. I have to thank Yao Liang for that anyway. (Ma 2011: 196)

The main issue here is that “the story of you and Lu 'Er” has been changed into “that story about Lu Gao in Tibet”, which is clearly an inaccurate translation. “Lu 'Er” is the name of Lu Gao's dog in one of Ma Yuan's earliest short stories “Haibian yeshi yige shijie”, which is directly referenced within the original but has been removed from Batt's translation. This omission of the text's intertextual elements, therefore, has resulted in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The removal of the text's intertextuality seems to be a deliberate choice on the part of the translator and any logical issues caused by this approach have resulted in a modification of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text.

The other most significant example of self-reflexive intertextuality within the original text can be found in Chapter 16, in which two poems “written” by Lu Gao and Yao Liang are given after the following introductory passage:

姚亮一直自詡是個詩人，陸高叫他情種。詩人也罷，情種也罷，姚亮倒全不以為然。姚亮有時也開陸高的玩笑，野人是姚亮送陸高的雅號。陸高偶爾也作詩，甚至不遜於姚亮的詩。當有人問及姚亮，問他為甚麼要到這塊號稱第三極的不毛之地來，姚亮完全以一個大詩人氣勢和氣度答覆這問話。也有陸高的。(Ma 1993: 47)

Yao Liang often talked himself up as a poet, Lu Gao thought that he was a sentimental type. Whether he was a “poet” or “sentimental” didn't matter as Yao Liang never agreed with Lu Gao. Sometimes Yao Liang would make fun of Lu Gao and gave him the nickname “yeti”. Lu Gao would also occasionally write poetry, some of which was better than Yao Liang's. Whenever anyone

asked Yao Liang why he came to this barren land which has been called the third pole, Yao Liang would always answer this question with the manner and air of a great poet. Lu Gao's poem is also below.

Within Batt's translation Chapter 16 has been entirely removed. This textual omission of over a thousand Chinese characters is by far the most significant individual alteration of the text. The two poems within chapter 16 of the original are attributed to Yao Liang and Lu Gao, which adds another layer of intertextuality to the text. Both of these poems revolve around the poets who have left China for Tibet, which clearly is consistent with the expectations of Yao Liang and Lu Gao as characters within the text, and also contain references to the stark and remote landscape of Tibet and also strong imagery drawn from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wildlife of Tibet. The poems therefore increase the verisimilitude of Yao Liang and Lu Gao as "characters" within the text which is in contrast to the highly unstable and self-reflexive references to the pseudocouple within chapter 1. As a consequence, chapters 1 and 16 create a highly self-reflexive paradox in that Yao Liang and Lu Gao are presented as characters, narrative focalisers, authors of real extra-diegetic texts, authors of fictional extra-diegetic texts, and authors of diegetic poetry. This almost absurdly overlapping and contradictory logic is a deliberate self-reflexive device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author's other works of metafiction and, in particular, his often highly self-reflexive utilisation of Yao Liang and Lu Gao. Within Batt's translation, however, this self-reflexivity has been entirely removed.

Whilst chapters 1 and 16 include by far the most significant textual omissions, elsewhere throughout the text there are significant recurring omissions which further diminish the text's self-reflexivity. Take for example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apter 4 of the original which has been entirely omitted within the translation:

姚我不在他的相貌上兜圈子了，不然讀者肯定要認為這是個愛情故事(理由很明顯：先有個漂亮姑娘，然後再說小伙子也蠻漂亮，不是麼?)。聲明不是愛情故事。(Ma 1993: 9)

I'm not going to go round in circles describing his features though, otherwise readers will think this is a love story (the logic is clear: first there is a beautiful girl then a ruggedly handsome man, no?). I am declaring that this is not a love story.

The omitted text above includes a passage of direct address to a reader narratee and a self-reflexive “authorial” incursion, both of which strengthen the text's self-reflexivity. Likewise, there are also several other instances of relatively small omissions in which the “reader” is removed from the text:

就這樣說定了。讀者已經知道陸高分在地區體委做幹事工作。(Ma 1993: 8)

And so it is agreed. The reader already knows that Lu Gao was assigned to the Tibetan Physical Education Commission.

The passage above, for example, is translated by Batt as “That's settled. And Lu Gao is assigned as a secretary to the Tibetan Physical Education Commission” (Ma 2011: 217). This is by no means an isolated example as the term *duzhe* (讀者 reader) appears within the original text seven times, whilst the translated text only has two instances of the word “reader”. In addition, the term *duzhe* appears within the original on numerous different levels within different narrative focalisation structures, whereas Batt's translation restricts the reader's presence to two chapters: one belonging to the “author's chapters” and the other within the “analysis chapter” (according to my categorisation above). Within the original, “authors” and “readers” appear throughout the text in a seemingly illogical way in that they are not restricted to the highest narrative level but rather can appear within hypodiegetic levels of the text which, in turn, weaken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 separate levels of the narrative. In addition to this relatively subtl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reader” within the translation, there are also several instances where self-reflexive references to the “story” (故事 *gushi*) are also removed as is the case within the examples below:

故事到這裡就算結束了 (Ma 1993: 32)

The story just about finishes here

後面自然還有關於頓珠的故事。(Ma 1993: 42)

Naturally there will be more stories about Dhondhop next.

那故事裡雖然沒有講到野人和羊角龍，仍然使巨脈岡底斯山充滿了誘惑。

(Ma 1993: 27)

Although that story doesn't have any wildmen or monsters with goat horns, it is nonetheless imbued with the allure of the Gangdisê Mountains.

A frequently used metafictional device by the author is to include a strong presence of the “author”, “reader”, “story” and even “text” within the narrative. Coupled with the dynamics of direct address, Ma Yuan's works of metafiction often appear to include authors openly “discussing” the text with readers in a highly self-reflexive way. Considering how unstable these “author” figures can become within Ma Yuan's novels (as is certainly the case within “Gangdisi de youhuo”), the author-reader-story-text dynamic is one of the key self-reflexive elements of the text and several elements of this metafictional device have been compromised and diminished within Batt's translation. In doing so Batt's translation presents a much more stable and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of a primary diegetic author/narrator addressing a “reader” about hypo-diegetic “stories”, however this stabilised structure greatly restricts the text's self-reflexivity.

### **C. Textual additions:**

Whilst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ext has been omitted from the translation there are also several examples of textual additions within the translation. These additions constitute elements of meaning that cannot be located within the original and therefore have been entirely created by the translator, rather than instances where an idiomatic translation requires a certain degree of flexibility in handling the original text. For example, the following passages from the last chapter of Batt's translation are not present in any way within the original text:

It's time to end this story. You've been to the mountains to stalk the wildman, you've been to a sky burial, you've heard Lu Gao's tale of the two brothers Dhonyo and Dhonsup [sic].<sup>[7]</sup> (Ma 2011: 254)



So of course you expect the author to tie everything up on the last page, right?  
(Ma 2011: 254)

Oh right! I forgot! Yao Liang and Lu Gao never found the wildman. (Ma 2011:  
255)

As is often the case with the other additions within the text, the translator has frequently felt 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role of the author/narrator figure and to disambiguate the often unclear and contradictory identity of the narrative focaliser. Within the first addition above the narrator is framing the three main narratives of the text like a vernacular story teller in what I would argue as being an almost condescending voice. Telling the “reader” that they “have been to the mountains” infantilises the reader in a way that is completely at odds with the techniques broadly used within Ma Yuan's novels. Ma Yuan portrays a range of complicated author/reader dynamics, some of which are obsessively analytical to the point of paranoia, some can be almost hostile (as in “Xugou” for example), whilst others are compromised by the unstable and contradictory identities of the “author” figure; however, he never portrays the reader as a passive recipient of a message delivered from a powerful all-controlling and father-like author figure. The additions shown above all in some way strengthen the autonomy and power of the narrator/author and the division between the diegesis and the hypo-diegesis, and in doing so undermine the text's structural self-reflexivity.

## D. Restructuring of the text:

In addition to the omission of key, highly metafictional elements of the original text and the addition of elements of meaning not contained within the original, Batt's translation also radically alters the text on a structural level. In addition to the omission of chapter 16, the order of chapters has been heavily restructured as follows:

Original chapter order: 1,2,3,4,5,6,7,8,9,10,11,12,13,14,15,16,

Translation chapter order: 1,2,3,5,6,7,4,8,10,9,11,12,13,14,15,16

Within Batt's translation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chapters have been reorganised with an obvious logic in mind: as demonstrated within the overview of the text's structure above, "Gangdisi de youhuo" contains three major narrative threads and several other self-reflexive elements which are all intertwined within a narrative structure which jumps between different sections of the text in an often disorientating way. Batt's reorganisation of the chapter sequence groups together these individual narratives, so they are logically separate elements within the text; and to strengthen this process, Batt also adds subheadings in these three narratives, so the chapter structure is as follows:

1. "The Hunt" – Parts I,II,III,IV,V,VI
2. "The Sky Burial" – Parts I,II,III
3. "The Singer of the Epic" – Parts I,II,III,IV,V,VI

As highlighted above,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Gangdisi de youhuo" is such that the narrative jumps between different narrative threads in an often imperceptible and sometimes disorientating way. Batt's translation has decided to "re-organise" the text so that the chapters which share the most logical diegetic connections are placed next to each other and framed under three distinct subheadings. Such a strategy implies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dynamics of the original text as the translator has approached the author's original narrative structuring as being somehow deficient and in need of logical reorganisation. The individual narratives and narrative elements are now compartmentalised and "labelled" under specific and entirely invented chapter headings so that the text has now been altered from a chaotic and disorientating narrative into a logically partitioned triptych of three "stories of Tibet". In doing so, a whole range of self-reflexive narrative devices have been lost from the text to the extent that the fundamental narrative features of the original text's structure have been entirely removed. The text's power to disorientate, to jump back and forth between narratives, to blur the lines between the various different "voices" within the text, and to create a sense that the narrative is lacking authorial mediation, has been entirely cut out from the translation.

## 4. Conclusion:

### Interpretive Divergences between "Gangdisi de youhuo" and "The Spell of the Gangdise Mountains"

Translation theory has, throughout its history, frequently identified (and re-identified) a basic dichotomy between "literal" translation that maintains the "integrity" of the original, and "sense-for-sense" translation that somehow moves the text towards the reader. Between these relatively simplistic polar opposites is a huge range of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issues which, particularly in the cas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can often present the act of translation as an almost impossibly complex task. "Gangdisi de youhuo" is far from being an easy text to translate primarily due to its complex narrative structuring. Indeed, given the number of misunderstandings and problematic interpretations of Ma Yuan's works that have built up over the last 30 year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any English translation of one of the author's most challenging metafictional works could elicit a difference of opinion from keen readers of Ma Yuan's works. Herbert Batt's translation of Ma Yuan's "Gangdisi de youhuo", however, employs a translation strategy that has involved a range of significant alterations, omissions and adjustments to the original text, many of which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text as I have highlighted above. In total over 1,400 characters of Chinese text from the original have been omitted (including an entire chapter), several minor but nonetheless significant textual additions have been made. Most significantly, the text has been radically restructured not only in terms of the chapter sequencing but also with added subheadings which now label and compartmentalise the separate narratives. The divergences between the original and the translated text therefore go way beyond what could be considered minor and isolated examples necessary to produce an idiomatic translation and strongly suggest that the text itself has been rewritten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or form of reading. In this regard, it is very revealing to analyse the wider context of the collection in which this particular English translation is situated: *Ballad of the Himalayas: Stories of Tibet* is a thematically

orientated collection of Ma Yuan's works which specifically represents only the author's works that are related somehow to Tibet. The outer sleeve of this collection, for example, makes a strong thematic association between Ma Yuan and a specific form of engagement with Tibetan culture:

An aficionado both of western postmodernist fiction an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Daoism, Ma Yuan portrays the disorientating interaction of traditional Tibetan life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so as to render absurd the rational premises of what we usually call "the modern world".

However, the role that Tibet plays within Ma Yuan's novels is an extremely complicated one and it would certainly be wrong to categorise Ma Yuan as a "Tibet writer". Tibet features in only a minority of the author's works, and even within the author's works that are either set in Tibet or involve Tibetan themes in some form, Ma Yuan is in no way attempting to be a travel writer or a chronicler of Tibetan life:

Although his works are mostly set in Tibet, he cannot be considered a chronicler of Tibetan life, for his use of Tibetan loci is so superficial and casual that Tibet is only the convenient anchorage of his fiction rather than an object of observation. (Zhao 1995: 313)

Here Zhao is not stating that Ma Yuan's Tibet works do not have any significance in terms of the sensitivities of Han-Tibet relations. Indeed, when read in a realist way individual elements of "Gangdisi de youhuo" explore a range of extremely complex and politically sensitive post-colonial issues: The sky burial, for example, could function as an allegory for Tibet's rejection of Han Chinese cultural voyeurism; the "old author" could be seen as a Tibetan sympathiser who has abandoned the relentless logic of Han Chinese modernisation for the humanising mythologies of "primitive" Tibet; as such, this "story" could be presenting a reconfiguration of the Han Chinese colonial gaze towards Tibet. However, the key point within Zhao's statement above is

that within Ma Yuan's works Tibet is not "an object of observation": the self-reflexive nature of Ma Yuan's texts precludes the possibility of any standard realist reading of the text's represented world to exist unproblematically and any attempt to strengthen the mimetic functions of the text at the expense of its self-reflexivity will ultimately lessen the impact of Ma Yuan's works. The introduction to *Ballad of the Himalayas: Stories of Tibet*, written by the extremely influential Yang Xiaobin, who wrote one of the most insightful commentaries on Ma Yuan's postmodernists sensibilities, even foregrounds the fragmentary and polyvocal nature of Ma Yuan's texts which ultimately has been diminished within this thematically focused collection of translations: "Ma Yuan's narrative heterogeneity dissipates the illusion of an intact subject, fragmenting the narrative persona that projects signification" (Yang 2011: ix). Yang also goes on to describe "Gangdisi de youhuo" specifically as a fragmented narrative of many sections and voices:

These sections, pieced together without explanation, construct a multifarious structure. The unified narrative voice that predominates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is disintegrated. Ma Yuan leaves inexplicable gaps among these voices and, therefore, presents a void in the narrative subject. (ibid.)

Given the fact that Yang specifically refers to the fragmented structure of the text which is "pieced together without explanation" as being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text itself, it is even more difficult to justify why so much editing and restructuring has taken place with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ndeed, I would strongly suggest that there i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Yang's introduction and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being employed within this collection. Whilst Yang is acutely aware of the dynamics of self-reflexivity, the translation attempts in numerous ways to diminish this very feature. That so many edits and readjustments have been made to the text is precisely because "Gangdisi de youhuo" is extremely self-reflexive and when read in a certain (realist) way seems to be distorted, out of sequence, fragmented and self-sabotaging. The opening quotation of the text, for

example, even signposts the text's self-reflexivity and the impossibility of forcing any one particular reading onto the text by creating an endless metafictional loop: if, as the opening quotation states, "no one can make you believe a hunting story",<sup>[8]</sup> then paradoxically, when read self-reflexively this statement can equally be understood as saying "no one can make you believe that no one can make you believe a hunting story" and therefore "no one can make you believe that no one can make you believe that no one can make you believe a hunting story". ... This endlessly reflexive metafictional paradox does not render the text meaningless, instead it ensures that any meaning that the reader derives from the text is a function of both what is being represented in the text and the narrative architecture through which it is being represented. Or to put this simply, it is not a case of analysing what is being narrated but rather what is being narrated, by "whom" and to "whom". As such, "Gangdisi de youhuo" is a highly metafictional "polyvocal" text in which various different "voices" narrate, write, control and, in turn, are narrated, written and controlled. The reader and the author float problematically among the kaleidoscopic fragments of texts that if reorganised, recalibrated and restructured seem to be separate realist texts falling across distinctly identifiable narrative levels of "stories within stories". However, the text cannot and should not be restructured, as it is not "fragmented" in the sense that it is deficient or malfunctioning, but rather it is interwoven, deliberately distorted and compromised, so that no one reading of the text can settle as the dominant mode of interpretation::

With such a complex distribution of subjectivity, many of Ma Yuan's fictions resemble a kaleidoscope in their dazzling shifts of narrative voices. In 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Lure of the Gangdisi Mountains", for instance, "I" comes to Lu Gao's house in the pouring rain; but soon another character tells his own story in the first person, and then yet another character takes over and tells the story of his friend, a Tibetan hunter, which is followed by a story told from Lu Gao's point of view but by an implicit narrator. In this way the novel proceeds with unrecoverably (sic.) fragmented narrative subjectivity. Since,

it seems, any character can pick up the narratorial voice at any time, there is no single authority to dominate the narrative text. Instead, the characters sometimes even acquire sufficient authority to argue and debate with the main narrator. As a result, the text seems to be immersed in a broadly participatory effort of fiction-making. (Zhao 1995: 313)

When fiction ceases to be an act of observation and instead becomes a “participatory effort of fiction making”, how can the reader interpret the represented worlds of the text and the various subjectivities that are controlling the “narratorial voice”? Should we, for example, “believe” in the old author who extols the virtues of Tibetan mysticism, or should we believe in the author’s incursion apologising for this act of “sophistry”? When two opposing forces are operating against each other in this way, whom should we trust? Traditionally, the hierarchy of fictional narrative is such that higher narrative levels control lower narrative levels, so that when an “author” “speaks” to the “reader” in the primary diegesis about the events and characters represented within the “hypo-diegesis”, the power dynamics within the text are established. Likewise, the naturalised conventions of omniscient externally focalised narrative mean that the reader is able to float imperceptibly through a represented world with the narrator controlling and commenting on the narrative subjects being “observed”. “Gangdisi de youhuo”, however, exceedingly diminishes the ability of any one “voice” to gain hegemonic control of the text, and it is this, when read against the post-colonial elements of the text, that is perhaps the most powerful function of the entire text: the narrative is not representing an alternative view of history (that Tibet is not primitive and inferior to Han culture) through the same manipulative and obsolete lexicon that represents the dominant discourse in the first place (which presents Tibet as being inferior to Han culture and therefore in need of modernisation), but rather it is presenting a self-reflexive counter discourse, in which the reader can see the problematic nature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not only this very counter discourse but also of the original discourse that it is in opposition to. Ironically, therefore, through

simultaneously creating and destroying its own verisimilitude, the text is also corroding the hegemony of existing representations of Tibet. This I believe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aspects of Ma Yuan's works and indeed it is why Zhao (1992: 91) has described the avant-garde fiction of the 1980s in China:

[A] fiction which, by refraining from interpretative prompting, deliberately obliterates its intentional context and shuns interpretative guidance. Any reading is then both a desired reading and a deviant reading.

Batt's translation, however, has significantly diminished the text's fragmentary and contradictory nature and in doing so has reduced the ability for such a "desired" reading and a "deviant" reading to co-exist.

Given the complex metafictional nature of the original text, translating "Gangdisi de youhuo" must be carried out with a great deal of sensitivity towards the intricate structure of the original. It is in this regard in particular that Batt's translation of "Gangdisi de youhuo" is at its most problematic, for rearranging, reordering, and "logically" restructuring the text in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by removing many of the text's most overt instances of self-reflexivity, Batt has engaged in a logical assault on the original text that destroys the powerfully iconoclastic and intricately postmodern nature of the text. Put simply, the text cannot be rearranged, edited and restructured without also being compromised:

Juxtaposition usually induces a metaphorical relationship hidden behind seemingly unrelated things, which could help build a sense of totality. In Ma Yuan's collage, however, even this vague and dubious relationship is annihilated, and every event, however casually and incompletely narrated, is self-sufficient and self-completed on its own, not dependent on other events to form a causal, temporal, or spatial network in order to determine its position. Fortuity then reigns in the narrated world, and the binarisms of past/present, here/there, and self/other turn out to be only human efforts to reorganize the world. (Zhao 1995: 315)



Unfortunately, Ma Yuan's rejections of the "human efforts to reorganise the world" through presenting a "kaleidoscopic" narrative of fragments false juxtapositions, has in itself been reorganised in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In identifying the text as being out of order, poorly structured, and therefore deficient, Batt's translation has culturally recalibrated one of the finest works of metafiction by one of China's most important modern authors as a "Story of Tibet" and in doing so has reestablished the very narrative structuring and binarisms that the original so brilliantly problematised.

## Notes

- [1] "Xugou" wa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May edition of *China Culture* (*Shouhuo* 收穫) in 1986 whilst "Gangdisi de youhuo"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985 in the February edition of *Shanghai Literature* (*Shanghai Wenzue* 上海文學).
- [2] In referring directly to "Gangdisi de youhuo" Henry Zhao (1995: 313) states for example that "With such a complex distribution of subjectivity, many of Ma Yuan's fictions resemble a kaleidoscope in their dazzling shifts of narrative voices."
- [3] For a full overview of the 'three models' approach to metafiction see chapter 2 of Ommundsen (1993).
- [4] Metafictions often employ a narrative technique referred to as 'direct address' within which the 'reader' occupies the role of the primary addressee of the text through a narrative structure which adopts "face-to-face interaction conventions". A key component of this technique is the usage of a "you" narratee, "intimate vocatives" (such as "dear readers") or "phatic elements" (such as "we", "us" or "ours") emphasising the fact that the reader and narrator share the same spatiotemporal context. Metafictions, therefore, often represent a "dialogue" between the narrator and the narratee taking on the role of the reader, the presence of whom acts as a clear statement of the text's self-reflexivity through an awareness that it is being read rather than being experienced in any real sense. For a full explanation of this concept see Georgakopoulou (1991).
- [5] Unless specifically referenced otherwise, all translations are my own.
- [6] I use this term deliberately as a reference to analysis on Samuel Beckett's frequent usage of coupled characters, such as for example, Mercier and Camier within *Mercier*

and Camier and Vladimir and Estragon in *Waiting for Godot*. Yao Liang and Lu Gao have been understood by many critics in China as a symbolised 'ego' and 'id' duality, representing two sides of the author's conscience. However, I believe Yao Liang and Lu Gao are best understood as a pseudocouple as they are often employed highly self-reflexively and are often engaged within a complex relationship with the 'author' within the text.

[7] This is an individual misspelling of the name "Dhondhop" which is used elsewhere throughout the translation.

[8] Batt's translation attributes this quote to Pär Lagerkvist (1891–1974) however this is a mistransla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拉格洛孚” which actually refers to Selma Lagerlöf (1858–1940).

## References

- Bal, Mieke (1985). *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Batt, Herbert (2001). *Tales of Tibet: Sky Burials, Prayer Wheels, & Wind Horses*. Ed. and trans. H. J. Batt.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 Georgakopoulou, Alexandra (1991). *Discursive Aspects of Metafiction: A Neo-Oral Aura?* Edinburgh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2, 1(13).
- Ma Yuan (1993). *Xugou*. Wuhan: Changjiang wenyi chubanshe.
- (2011). *Ballad of the Himalayas: Stories of Tibet*. Trans. by Herbert J. Batt. Introduction by Yang Xiaobin. Portland, ME: MerwinAsia.
- McHale, Brian (1992). *Constructing 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 Ommundsen, Wenche (1993). *Metafictions?* Carlton: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Press.
- Waugh, Patricia (1984). *Metafic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lf-conscious Fiction*. London: Methuen.
- Zhao, Henry (1992). "The Rise of Metafiction in Chin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LV(1), 90–99.
- (1993). *The Lost Boat: Avant-garde Fiction from China*. London: Wellsweep.
- (1995). "Ma Yuan the Chinese Fabricator". *World Literature Today* 69(2), 312–316.

## About the Author

William Gatherer is a lecturer in Chinese transl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within the Master of Arts in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MACTI) program. Dr. Gatherer'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focused on literary theory, narratology, metaficti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in particular the works of the Chinese author Ma Yuan (馬原). In addition to lecturing in Chinese translation, Dr. Gatherer is also a practising NAATI accredited Chinese translator.

## 書評



# 翻譯學的生態視角—— 《生態翻譯：人類世時代 的翻譯與生態學》評介

劉康龍

**Michael Cronin: *Eco-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nd Ecology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178 pp.**

**ISBN: (hardback) 978-1-138-91683-8; (paperback) 978-1-138-91684-5**

### 一、背景介紹

邁克爾·克羅寧 (Michael Cronin) 是愛爾蘭都柏林城市大學的教授，著有在譯學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生態翻譯：人類世時代的翻譯與生態學》一書。該著作從不同維度探究了生態翻譯，並對生態和翻譯的結合提出了鮮明而發人深省的觀點。在此之前，作者已經出版了好幾本與該主題相關的譯學著作，包括《翻譯與全球化》( *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 2003 )、《翻譯與身份》( *Translation and Identity*, 2006 )，以及《數字時代的翻譯》( *Transl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2013 )。這些著作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繫，從不同的側面剖析了翻譯的角色與影響。此最

新的又一力作，對翻譯這一重要人類活動作了更加深入的分析，並以新穎的角度考察了翻譯如何影響人類所處的生態環境，對生態翻譯研究提供了啟發性的視角。

人類世，又稱人新世，由1995年諾貝爾獎得主、荷蘭大氣化學家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於2000年提出。克魯岑認為人類活動的碳排放、氣候暖化、海平面上升及森林砍伐等等，已經可以對橫跨千年、萬年的地質時代造成巨大而又不可逆的影響，這種影響足以構成一個新的地質時代。自此，人類活動已經將地球從一萬兩千年前開始的“全新世”推進到“人類世”。在這個背景下，一系列探討人類世的專著相繼出版，如《人類世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 Anthropocene*, 2016）與《人類世或資本世？自然、歷史與資本主義危機》（*Anthropocene or Capitalocene? Nature,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2016），克羅寧的著作則為這一股研究熱潮提供了一個翻譯學的獨特視角。

克羅寧將其研究範圍界定為“應對人類環境改變的各種挑戰之一切形式的翻譯思想和實踐”（2）。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該書所涉及的研究領域甚為廣泛。當然，書中內容並非局限於“人環境改變的各種挑戰”的翻譯問題，也包括環境如何反作用於人類自身活動的各個方面。其中的一個挑戰是，人類該如何去理解生態環境變化的主體和對象。為此，作者借用了蒂莫西·莫頓（Timothy Morton）對“超對象”（Hyperobject）的定義：超物件是相對於人類而言大量分佈在空間和時間的物件（Morton, 2013: 1）。超對象可以是黑洞、全球暖化或大氣變化。由於人類通常僅能在某一特定時空體驗到超對象的影響，因而“不可能對其在整體上予以把握”（2）。作者深入考察了翻譯作為資訊傳播媒介這一工具屬性，就翻譯如何在人類世這一全新語境下協調人

與自然生態的關係，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從作者自身這些年的研究脈絡而言，探討了翻譯現象，作者先借用全球化的話語框架（Cronin, 2003），繼而將翻譯置於數字時代背景下（Cronin, 2003）來進行探討，再到本書從人類世的語境下考察翻譯與生態的關係，這一系列的論述一脈相承，層層推進，從更加恢弘的背景下來研究翻譯活動與現象。由於本書的概念較新，亦是翻譯學與生態學（嚴格意義上探討翻譯與自然生態關係）少有的開篇巨作，因而讀起來稍顯晦澀。但我們相信，該著作對生態翻譯的洞見必將深刻影響未來譯學領域的研究，會是這個領域的一本重要著作。

早在2003年，克羅寧在《翻譯與全球化》（2003: 165–172）一書中，便提出“翻譯生態學”的概念，所關注的是少數語言與強勢語言之間的辯證關係，即全球語言生態中少數語言的地位、角色與生存的問題。在本書中，作者從“注意力”（attention）角度對這些問題作了進一步的探討。他指出，“翻譯生態學”或“生態翻譯學”在中國已經形成一股研究熱潮，這個視角被用來探討翻譯這一領域、翻譯的背景及翻譯的過程。他還提到，“生態翻譯”一詞先由克拉夫·斯葛（Clive Scott）提出，關注的是譯者的“心理生理”與譯文文本之間的聯繫（2）。在本書中，克羅寧並沒有遵循這兩條脈絡並不僅僅把翻譯看作一個封閉的生態系統，也沒有局限於中國學者那套類比生態學的話語體系來探究翻譯，其研究的對象和目的都遠遠超出傳統的翻譯研究。在本書中，作者所關注的是進入人類世後，即人類已經成為影響地球生態主要變量的語境下，翻譯如何影響二者之間的關係。

## 二、內容簡介

該書第一章探討了人類所處的生態環境已經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並

深究該議題應該成為語言、文化和翻譯研究關注點的原因。克羅寧首先探討了人類的角色。進入人類世後，人類已經從單純的生物學個體，轉變成能影響地質構造的地質個體，這意味著人類史與地球史開始融合。作者提出了一套新的價值體系來解讀翻譯，在某種程度上顛覆了我們對翻譯的理解，使我們對翻譯的成因和作用有了新的認識。作者以關注地球的未來為基礎，構建了一套有別於傳統的翻譯政治生態話語，並剖析了地域、復原力和關聯性等概念。翻譯處於各種資訊傳播的中心地位，這種關聯性也讓我們思考新媒體生態下“注意力”和“可見性”對於資訊傳播的影響和操縱。就注意力而言，當今翻譯的一個重要方面便是我們太過於強調產品（譯文的產出）而非過程（譯文產出所需的各種能源）。作者指出，翻譯產出所需要的手段（包括人文，社會和文化等方面），往往由於追求瞬時性、即時性和透明性而遭到忽視（3）。追求結果而無視手段，與無視地球生態資源（作為一種讓人類活動成為可能的手段）是並無二致的。克羅寧提醒我們，必須對手段予以足夠重視，正是基於這點，他把翻譯視作一種手段和方式，一種有利於自然生態系統的可供回收利用的能量。

第二章詳細探討了食物、語言和人類之間的關係。作者指出，語言與飲食是人類的兩項主要活動。因為食物的生產、分配及消費對大氣的碳排放有著重要影響，因此探討這一成因，是政治生態學的重點。其外，由於人與食物都在一個多語環境中遷移，翻譯對於考察這個遷移是十分重要的（4）。克羅寧深入探討了工業化的食物生產，並將其與日益增長的翻譯需求聯繫起來。作者提出，如果農用工業已經遭受慢食運動（Slow Food Movement）的質疑，我們是否有必要提出“慢語言”運動，重新思考語言作為一種公共利益的屬性。

緊接上一章討論翻譯在食物生產中的角色，本書第三章論述了人類與地球其他物種（作食物）之間的關係。克羅寧批判性地審視了人類例外論，即人類是特殊而例外的，是優於其他物種的。作者首度提出了“譯態”（tradosphere）這一概念，即“一切翻譯系統在地球的總和，資訊在有機體和無機體之間流通並轉化可供接收實體處理和理解的的所有方式”（71）。作者強調，在當今人類活動造成物種大規模滅絕的環境下，人類有必要重新思考跨物種的翻譯（interspecies translation），對人與其他物種的差異進行調解。這裏，克羅寧已經突顯了符際翻譯（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的必要，豐富了符際翻譯的內涵。作者指出，翻譯不應僅僅局限於研究人類語言的翻譯，進入人類世以後，我們有必要思考翻譯是否能為其他物種帶來改變，翻譯學科現有的工具是否依舊適用值得深思。

在第四章“偉大的轉變”，作者繼續分析了“技術與翻譯”的關係。作者指出，虛擬經濟所帶來的影響並不虛擬，而是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切切實實的影響。譬如，個人電腦存儲向雲存儲的轉向，導致各國建立起相應的大型數據中心，而這些中心的運作必須依賴能源供給，當中服務器硬體會用到污染環境的重金屬，對自然生態造成的影響是無比巨大的。資訊通信技術造就了一個虛擬世界，但卻對環境造成了實質的影響（6）。技術是資訊傳播的重要媒介，也是導致不同焦點的重要變量。人類作為資訊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必須重視當前的技術實踐對於生態的影響。作者談到，我們當前的經濟增長模式乃是基於無限資訊的需求，並不具有可持續性，因此有必要探討翻譯技術在未來所扮演的角色。我們是否有必要反思這個問題：追求無止境的翻譯增長模式是否對生態負責任？（6）了解決這個問題，作者提出從高科技（high-tech）的翻譯實踐往低科技（low-tech）轉變的可能性。



該書最後一章通過分析遊記的敘述模式，進一步考察了生態、語言和翻譯之間的關係。由於遊記作家在不同文化中遊歷，深刻體驗到不同的語言世界（多數情況下為弱勢語言），因此他們在語言中構建所感受的現實世界，必須依靠敘述的語言和方式。作家自身的母語是強勢語言或弱勢語言，對描述所感受的世界亦有重要影響。假如說語言差異是構成文化多元性的基礎，那麼這些差異和多元性如何被描述出來，便會深刻影響圍繞語言和翻譯而構建的生態敏感度（ecological sensitivity）（7）。在本章中，作者也繼續探討了注意力的問題。作者發現比起強勢語言，少數化語言（minoritized languages）更關注自然生態和地域文化的獨特性，這可以從少數化語言具有描述與自然生態相關的豐富詞匯中得以體現。

### 三、創新與啟發

本文集不落窠臼，勇於創新，在人類世的語境下從多個角度探究了生態翻譯，是一部很有參考價值的學術文獻。其研究跨越時空，對各種思想脈絡合並交叉分析，結合經濟學、人類中心主義、氣候變化等多個方面重建歷史語境，圍繞“翻譯、語言與生態”這個問題考察進入人類世後翻譯的角色和作用。該著作跨越了傳統的體裁和文本類型，內容包羅萬象，橫跨中世紀文學、當代旅遊隨筆、兒童文學、植根於本土語言的特有知識，甚至津巴布韋的特製水泵及動物交際的方式等等。這些看似不同的領域緊緊圍繞著一個主線展開——翻譯自身的生態系統、翻譯在生態系統的角色以及生態系統的翻譯。

本書具有豐富的實例和方法，充分利用了各個學科的最新術語，例如“注意力”便取自經濟學的“注意力經濟”（Attention Economy），即“眼球經濟”。作為一種管理資訊的方法，注意力經濟是將人類的注意力作為一種稀缺的資源，用以探究資訊管理等問題。翻譯同樣是涉及

資訊處理的重要載體，翻譯的主體是人本身，所以把注意力用來探究翻譯現象，便產生了一系列富有啟發性的見解。譬如，克羅寧提到，韋努蒂 (Lawrence Venuti) 關於譯者隱身的論說乃是基於印刷時代得出的思考，在當今資訊爆炸的後印刷電子時代，譯者隱身的問題有必要重新審視 (26)。

雅各森 (Roman Jakobson) 將翻譯分為三種類型：語內翻譯、語際翻譯，以及符際翻譯 (Jakobson, 1959)。克羅寧關於生態翻譯研究也大大拓寬了雅各森對於翻譯的區分，使翻譯研究不僅僅局限於語際翻譯，同時也極大的豐富了其他兩種翻譯形式的內涵。在生態翻譯的語境下，語內翻譯意味著作者或譯者，為了生態多元的目標和跨物種的和諧相處，必須有意識去豐富語言的張力，利用不同的語言手段去描述生態環境的變化所帶來的挑戰。從符際翻譯的角度而言，克羅寧對於翻譯的討論也超出了以人類為中心的交際活動，而包含了人與動物、有生命機體與無生命機體，甚至跨物種之間的交流。在該著作中，作者也借鑒了其他學科關於動物交際的最新研究成果。克羅寧的許多觀點發人深省，從人類世的角度探討翻譯現象極大地豐富了翻譯研究的維度，恰恰體現出翻譯研究的跨學科特質。

在本書，作者敘述的跳躍性非常大，時而將翻譯視為隱喻或比擬的手段，時而視翻譯為實踐，當中涉及人與環境的生態關係、人與人之間的政治關係，以及人與文本的關係等諸多方面。因而，在本書中，翻譯這個概念富於流動性，閱讀起來或感到不甚流暢。然而，瑕不掩瑜，作者對於生態翻譯本質的探討富有啟迪性與前瞻性，深具理論的廣度和深度。對於中國的生態翻譯研究而言，克羅寧的論著也值得我們借鑒。國內生態翻譯學的基本概念是從達爾文的“適應／選擇”進化論衍生而來，把翻譯生態喻指類比為自然生態，在同構隱喻的基礎上研究翻譯

現象。因而其研究的歸宿點依然指向翻譯研究，較多局限於翻譯策略的應用上，而不是探討翻譯和自然生態的相互關係。克羅寧的論著已經把考察對象擴大為人與生態之間的關係，把人（包括譯者）視作生態的重要一環來研究翻譯對於整個地球自然生態的影響。克羅寧關於生態翻譯學的研究目的和對象都已經超出了傳統翻譯研究的範圍，不但有生態之“名”，更具生態之“實”，恰恰是為了“瀕危的世界”而進行的翻譯研究（苗福光、王莉娜，2014: 81）。該著作拓展了翻譯研究和實踐活動的範圍，建立了翻譯和科學之間新的連接，從宏觀的角度描述了處於人類世翻譯活動的動態軌跡與規律，也反映出譯學研究的跨學科特質。

## 參考文獻

- Cronin, Michael (2003). *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2006). *Translation and Ident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2013). *Transl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2017). *Eco-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nd Ecology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 Jakobson, Roman (1957).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Reuben. Brower (ed.), *On Transl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32–239.
- Morton, Timothy (2013). *Hyperobjects, Philosophy and Ecology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苗福光，王莉娜（2014），〈建構、質疑與未來：生態翻譯學之生態〉，《上海翻譯》（4）：77–82。

## 作者簡介

劉康龍，博士，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語料庫翻譯語言學、實證翻譯研究、翻譯教學。電郵：klliu@polyu.edu.hk

# 回憶錄



## 香港翻譯學會 創會的二十年(1971-1991)(三)

劉靖之

### 一、訪問中國大陸和台灣、專題演講、研討會

香港翻譯學會在1981年慶祝十周年的一連串活動之後，繼續正常會務。1983年5月28日頒授“榮譽會士”銜給何丙郁教授和宋淇先生；在1980和1981年舉行的兩次研討會論文八篇，加上特邀專文四篇（我的〈論音樂翻譯〉、喬志高的〈世界性的口語〉、蔡思果的〈鑽石與石墨〉一詩為甚麼不能翻譯）和林以亮的〈現代譯壇的新方向〉），共12篇，宋淇主編，以《翻譯叢論》書名於1983年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當中1985年和1986年是執委忙碌的兩年。應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的邀請，香港翻譯學會代表團於1985年4月3至12日訪問了北京、杭州和上海的翻譯工作者、作家和學者，包括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秘書處、外文局、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等，以及出版社和圖書館等文化單位。學會會長賴恬昌、副會長劉靖之、義務秘書梁寶生、義務司庫李勉民、義務編輯金聖華，以及執委張同、丁紹源和余丹等八人，通過十天的訪問與交談，彼此增加了了解，建立了友誼，為日後的交流合作奠定了基礎。

訪問團訪問的單位和人士包括北京的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會長姜椿芳、副會長王子野和葉小夫；副秘書長馮亦代和林煌天、理事戈寶權等11人）；北京大學英語系與中文系（4人）；北京的翻譯家（葉君健、李芒、英若誠等10人）；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副院長錢

鍾書、所長葉水夫、研究員楊絳、副編審羅新璋等10人；北京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林爾蔚、副總編輯駱靜芝和王新善、高級編輯高清槐等12人）；北京人民出版社（總編輯張惠鄉等4人）；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屠岸、副總編輯綠原和張伯海等4人）等。在上海，訪問團與上海的翻譯界包括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副主席草嬰和包文棣、上海市出版局副長劉培棣、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社長石磊和副總編輯任溶溶與路修等10人，以及上海外國語學院院長胡孟浩、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副總編輯李良佑等各學系、語系、教研室負責人18人會見，並舉行座談。在北京，訪問團應楊憲益、戴乃迭夫婦之邀請，到他們居住的百萬莊外文局宿舍晚宴，席開兩桌，盡歡而歸。

這次學會訪問北京、上海翻譯、出版界和外國語學院的詳細內容，我曾以〈中國的翻譯界〉為題在學會主辦的“翻譯與現代中國”研討會（1985年7月在香港理工學院舉行）發表過，並收入我主編的《翻譯叢論一九八六》（劉靖之1986: 86–123）。這篇報告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的成立和組織結構、中國的翻譯出版和翻譯教學等，還報導了大陸翻譯家的意見、外國文學的研究和翻譯及中國翻譯工作協會會長姜椿芳的建議。附錄一開列了訪問團訪問的單位和人士（共73人）；附錄二是“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章程”（1982年6月23日通過）；附錄三是“中國翻譯工作協會領導機構成員和理事名單”（1982年6月23日通過，1983年5月20日增補）；附錄四是“上海外國語學院的教育體系”。

繼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之後，台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下稱“文建會”）也邀請學會赴台訪問，交流翻譯、翻譯教育和翻譯出版的經驗。我則覺得台灣行政院文建會可能計劃成立民間翻譯組織，想知道香港翻譯學會的創會經驗。學會一行五人——會長劉靖之、副會長金聖華、義務司庫何信勤、執委李勉民和丁紹源，於1986年12月5至11日

訪問了台灣的文建會、台灣大學、淡江大學、東海大學、中央圖書館、國立編譯館、行政院新聞局、筆會、天下出版社及皇冠出版社等。在12月8日舉行了座談會，由文建會副主任劉萬航主持，參加討論的有《中央日報》社長彭明（筆名彭歌，著名作家）、台大中文系教授林文月、翻譯家黃驥、國立編譯館館長曾濟群、中國廣播公司副總經理王曉寒、國立藝術學院講師林國源，以及台灣國立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張福塏。主辦機構文建會還為座談會提出了五項議題：一、目前翻譯所遭遇的問題及解決方法；二、翻譯與著作權問題；三、翻譯與稿費；四、台灣成立翻譯學會之可能性；五、台灣兩地翻譯之合作問題。

訪問團訪問了台灣大學、淡江大學及東海大學的外文系，與三所大學外文系的教授交換有關翻譯課程的意見。與香港相比，這三所大學外文系的翻譯課程，數量既少，又欠組織，影響教與學。有關翻譯教學及學術界人士對翻譯的看法，參閱金聖華〈台灣翻譯界概況〉一文。（1988: 58-78）。這篇報導詳細地報導了12月8日文建會主辦的“翻譯家座談會”上各學者的意見，訪問團訪問三所大學外文系學者對翻譯教育的看法、中國筆會和翻譯出版的狀況。

總結這次有關台灣的翻譯情況，我個人有如下印象和看法：一、台灣的翻譯正處於“無政府狀態”，一切都以市場銷路為依歸；二、翻譯教育：“翻譯只不過是外文系中無足輕重的一項科目”——對翻譯不夠重視；三、台灣有成立翻譯學會之需要，既可負起譯評工作，也可擔當推介譯著的任務；四、台灣的出版業非常興旺，1986年至12月初為止，共出版7,600種新書，其中翻譯著作佔極大比例。台灣的出版社有許多的規模相當宏大，如正中書局、世界書局、幼獅文化公司、正文書局、皇冠出版社、遠東圖書公司、台灣書局、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局及黎明文化公司等，出版了不少翻譯書刊。由於時間的關係，訪問團只訪問了

兩家極具代表性的出版社——天下出版社與皇冠出版社，前者成立五年餘，有僱員80人左右，其中一半以上有碩士學位；後者於1984年自建皇冠藝文中心，樓高七層、有畫廊、圖書館和資料室等。

執委會對中國大陸和台灣的訪問，產生了如下的效果：一、學會會長劉靖之和副會長金聖華代表香港的翻譯學會參加1986年4月在北京舉行的第一屆“中國翻譯工作者代表大會”，賴恬昌獲選為74位名譽理事之一，香港翻譯學會會長和副會長獲選為288位理事中的兩位香港代表。二、中國傑出的翻譯家楊憲益和戴乃迭於1986年9月27日與賴恬昌一起獲頒授香港翻譯學會榮譽會士銜；台灣的傑出翻譯家林文月與張蘭熙獲頒授同樣的名銜（1987年9月26日、1988年10月8日）；這之後陸續有中國大陸和台灣的翻譯家獲頒此榮譽會士銜，包括楊絳（1988）、戈寶權（1989）、蕭乾／葉君健／張谷若／余光中／齊邦媛／方平／彭鏡禧／許鈞等（1991、1994、2001、2005）（劉靖之 2006: 200–201）。

香港翻譯學會用了15年創立並發展會務，奠下了鞏固的基礎之後，開始跟鄰近地區的翻譯界互通訊息，進行交流。到了1986年，學會在會務、學術、出版及與中國大陸和台灣聯繫交流等方面，均有所進展。就以每兩個月一次的午餐例會的專題演講講者和內容來講，清楚地說明了學會活動的學術和專業水準。上文提及1971–1981年期間的專題演講，現在談談1981–1991這十年裏的專題演講。香港是國際城市，人來人往，有不少來港作短期講學的學者和專家。學會有各大學及學院代表，消息靈通。此外，還有本港大學的學者教授，因此專題演講的講者源源供應。在這十年裏，應邀來學會午餐例會作專題演講的、而《譯訊》有報導的有傳譯家鄭仰平、國學學者周策縱、翻譯家／編輯高克毅（1981）；中國科技史學者何炳郁、作家／編輯胡菊人、翻譯學者劉殿爵（1982）；企業家安子介、律師廖瑤

珠、漢學家閔福德 (John Minford) (1983)；律師關禮雄、翻譯學者黃國彬、《讀者文摘》主編林太乙 (1984)；翻譯學者周兆祥、翻譯家奈達 (Eugene Nida) (1985)；翻譯學者紐馬克 (Peter Newmark)、教育工作者 Cyril Thomas (1986)；作家蕭乾、執委金聖華、翻譯／編輯黃邦傑 (1987)；漢學家卜立德 (David Pollard)、翻譯家 Catriona Picken、英德翻譯家 Nigel Reeves、翻譯學者周愛華 (1988)；口譯家 Socorro Botero-Browning、翻譯學者吳少朋 (Shiu Pang E. Almberg)、詞典翻譯家羅志雄 (1989)；翻譯學者 Harry Simon、《讀者文摘》中文版總編輯鄭健娜、翻譯學者張南峯、加拿大詩人 Michael Ballock (1990)；翻譯學者方梓勳、翻譯學者劉宓慶、瑞典漢學家馬悅然 (Göran Malmqvist) (1991) 等。

上述專題演講裏，馬悅然的英語演講 “Thoughts on Translation and Procedure on Selecting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全文刊載在《譯訊》第32期1991年12月，頁7-10) 值得在此記上一筆。在演講完畢之後我問他：“為何不把諾貝爾文學獎改稱為諾貝爾文學翻譯獎？”馬氏答道：“諾貝爾的遺囑是不能更改的。”我後來在文章裏對此發表幾點意見：

一、想想真有點兒諷刺意味：高行健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馬悅然是高的作品譯者，那麼，馬的翻譯是否成了高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關鍵因素呢？肯定是。從高行健這一例看，諾貝爾文學獎真應該改成“諾貝爾文學翻譯獎”，馬悅然真應該與高行健平分此獎。由於馬悅然是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這一問題還多了一份尷尬。二、在我看來，文學獎的授予應看作品的文學價值，而文學價值只能靠閱讀原作直接評價；如果通過譯本授獎，那就成了翻譯獎。三、有人批評說“高行健不能代表中國作家”，馬悅然答道：“高行健是位傑出的作家，只代表他本人。”對這一回答我完全理解。馬悅然的話有兩點清楚說明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性質。其一，諾貝爾文學獎並非要授予世界最好的文學作品，只是獎給“眾多傑出作家之一”；其二，馬悅然的意思是說，諾貝爾文學獎，不是授予某一組織或某一國家，而是授予個人的，譯文的好壞對能否獲獎起至關重要的作用。(劉靖之 2002: 43, 44)



如上所述，諾貝爾文學獎的授予標準既不合邏輯也不公平，但中國文化界極為重視這一既不公平又不合邏輯的文學獎，何故？虛榮心作怪也！

除了專題演講，學會還主辦了研討會和論壇，包括“翻譯與社會”（1983年5月），主講者有李達三〈一九八四一、一九九七：翻譯者的美麗新世界〉、戴天〈採花與釀蜜——翻譯瑣談〉、鄧嘉彥〈翻譯、機器、人〉、黃霑〈廣告翻譯、蓄意叛逆〉；“翻譯與現代中國”（1985年7月），主講者有周兆祥〈我們從今以後不要再翻譯了——論現代化運動裏翻譯工作的態度及方法〉、劉靖之〈中國的翻譯界〉、金聖華〈普通話對翻譯的重要性〉、關禮雄〈中國法制的現代化——兼談有關翻譯問題〉；“多種語言社會的翻譯問題”（1986年9月27日），主講者有丁紹源〈受多種語言困擾的香港〉、陳佐舜〈香港大專課程的探討〉、黃兆傑〈教甚麼？〉、陳弘毅〈香港法定語文的發展〉；“翻譯研討會”（1987年9月26日），主講者有朱立〈媒介翻譯問題〉、廖姆姬〈翻譯教學〉、陳育沾〈即時傳譯的困難〉、楊寶坤〈香港雙語發展現況〉；“翻譯實踐”（1988年10月8日），主講者有黃邦傑〈翻譯的路向〉、關品樞〈香港應開展翻譯批評〉、龐林淑蓮〈投考會議傳譯員的竅門〉、張家偉〈現行法例翻譯上的幾個問題〉、陸文慧〈基本法的英譯問題〉；“翻譯及傳譯在香港”（1989年9月9日），主講者有鄭仰平〈連續傳譯筆記：藝術家的工具〉、蘇珈璐（Socorro Botero-Browning）〈三個主要國際會議中心的比較——如何令香港成為國際會議中心〉（“How Can Hong Kong Achieve International Status as a Multilingual Conference Centre—A Comparison With the Three Major Centres”）、潘定鈞〈翻譯之甘苦〉、歐成威〈雙法立法在香港的發展〉。

上述研討會的論文，大部份收入我主編的《翻譯叢論一九八六》、《翻譯叢論一九八八》和《翻譯新論集——香港翻譯學會二十週年紀念文集》。這三本論文集共收入文章，依次為10、10、27，共47篇。

## 二、二十周年慶祝活動

1991年學會成立20周年，免不了要舉辦活動慶祝一番。執委會有賴恬昌創會會員；也有中年一代實幹派，從1970年代中便參加執委會的決策討論；1980年代中還有年輕的學者和政府中文主任，執委會顯得朝氣勃勃。執委會決定主辦11項慶祝活動，如下，

### A. 學術活動

（一）學會聯同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美國夏威夷大學“語文、語言學及文學院”和“東西文化中心”聯合舉辦“亞洲太平洋地區翻譯與傳譯研討會”，範圍包括文學與翻譯、翻譯史、語言與翻譯交流、翻譯與技巧、翻譯教學、翻譯與傳譯的培育，以及東西方翻譯交流等，39位學者發了言。會議於1991年10月28至30日在香港大學開了三天，港校長王賡武致開幕辭。會議出版了論文集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Bridging East and West — Selected Conference Papers* (Seymour and Liu 1994)。

（二）頒授榮譽會士銜：由於慶祝學會成立20周年，執委會決定頒授榮譽會士銜予六位人士：文學翻譯家張谷若、作家兼翻譯家葉君健、學者翻譯家劉紹銘、作家兼翻譯家蕭乾、作家兼翻譯家余光中，以及本人。頒授儀式於1991年10月30日在上述研討會最後一天結束後舉行，有關這六人的贊辭參閱《譯訊》第32期和《香港翻譯學會簡史》（劉靖之2006：109–174）。

（三）文圖集出版：由我負責編輯出版兩部文集：《翻譯新論集——香港翻譯學會二十周年紀念文集》和《翻譯工作者手冊》，前者收入了學會主辦的研討會論文和特約論文27篇，後者介紹中國的翻譯概況、翻譯理論在各國概況、翻譯與傳譯人才的培訓、翻譯與傳譯的種類與標準以及翻譯設備等五個方面。附錄有十份文件，包括翻譯工

作者憲章、翻譯機構、參考書目及校對符號等。這兩部文集和手冊先後於1991年10月、11月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

(四) 香港翻譯學會文憑試：為了評核缺乏學歷的翻譯人士申請學會會藉，經過多次討論，並得到香港考試局的支持和鼓勵。執委會於1988年初委託丁紹源、黃邦傑和龐林淑蓮三位執委就申請入會資格之公開考試問題進行研究，並向執委會提出報告。丁紹源於1989年初提交報告。執委會經仔細考慮後認為此事需要從長計議，於1989年11月委任工作小組，小組召集人為劉靖之、秘書Cyril Thomas、組員金聖華、余丹、丁紹源、龐林淑蓮、何偉傑、李成仔及Harry Simon。工作小組經過三次會議，於1990年秋向執委會提交報告。執委會於1991年初議決申請入會者，除執委會邀請免試外，申請者需經考試及格後才能入會。香港考試局已接受學會委託，統籌辦理考試事宜。首次公開考試於1991年12月21日舉行，計有逾150人報名，及格者可申請為附屬會員。另一種為高級文憑考試，及格者可申請為本會會員，考試於1992年夏舉行。

## B. 籌款活動

(一) 傅雷逝世25週年紀念展：學會於1991年10月25日與香港商務印書館聯合在銅鑼灣商務印書館舉辦這次紀念展，傅雷的次子傅敏特地從北京來港主持開幕儀式。

(二) 學會於1991年10月29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傅雷紀念音樂會”，由傅雷的長子傅聰鋼琴獨奏，曲目包括傅雷喜愛的作品，抒發25年來對父親的懷念與追思，令當晚兩千多名聽眾深為感動。

(三) 1991年10月30日，學會在香港香格里拉酒店舉行學會成立20週年慶祝晚宴，有二百餘會員和朋友出席，為這一年的慶祝活動劃上完滿的句號。

上述紀念慶祝活動，令學會名聲廣為傳播，深受社會有關人士的重視，會員人數大幅度增加，從1991年3月的260名左右增至1992年6月的482名，計有榮譽會士21名、會士22名、會員408名、學生會員29名、附屬會員2名。據《譯訊》第32期報道（1992年6月），學會慶祝20週年活動共有十項，但是我計算下來應該有11項：一、“亞洲太平洋地區翻譯與傳譯研討會”；二、頒授榮譽會士銜予六位對翻譯有傑出貢獻的人士；三、出版學術論文集和翻譯手冊；四、香港翻譯學會文憑試，有關此文憑試可參閱我為《譯訊》第33期（1992年6月）撰寫的〈翻譯專業考試〉（頁4-5）；五、學會與市政局於1991年8月31日在香港大會堂劇院舉行“雙語立法與法律翻譯”，有四位講者：梁定邦〈雙語法例諮詢委員會的工作〉、裁判司李宗鏐〈中文法律書籍的編寫〉、香港政府律政署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嚴元浩〈雙語法例的制定〉、香港城市理工學院應用語言學系首席講師冼景炬博士〈法律翻譯培訓〉；六、香港政務總署及半島青年商會聯合主辦的“全港青年翻譯及傳譯比賽”，由學會會員擔任比賽的顧問（劉靖之）、總評判及副總評判（金聖華、黃邦傑）以及評判（陳善偉、王宏志、區劍龍、余丹、范文美、黃燕堃、方蔚蕓、廖梅姬等）；七、學會會員金聖華、黃邦傑、范文美、黃維樑、吳兆朋及張南峯應邀翻譯加拿大詩人的詩作，刊登香港大學於1991年7月出版的〈加拿大詩歌〉；八、朗文（遠東）有限公司、牛津大學出版社及區永熙每年各捐贈獎學金一萬元港幣予五名本科生和一名研究生；九、學會於1991年10月29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傅雷紀念音樂會”，由傅聰鋼琴獨奏；十、學會於1991年10月25至29日與香港商務印書館合辦“傅雷逝世25週年紀念展”，傅雷的次子從北京來港主持揭幕儀式；十一、學會於1991年10月30日在港島香格里拉酒店舉行20週年慶祝晚宴，筵開16席，會員與嘉賓歡聚一堂，學會成立20週年之盛事也！

據《譯訊》報道，“傅雷紀念音樂會”，除開支出，共籌得款項50萬元港幣！

### 三、廿年來的變化

我於1974年2月開始參加學會兩月一次的午餐例會，1976年6月開始擔任執委，參與會務決策，從編輯（1976–1980）、副主席（副會長）（1980–1986）到會長，然後斷斷續續地做過七屆，共計13年的執委會主席（1986–1988、1988–1990、1994–1996、1997–1998、1998–2000、2000–2002、2002–2004），貫穿1970年代至2000年代。2004年我退任所有執委會的職務，但仍然是《翻譯季刊》編輯委員會主席，有時客串《譯訊》編輯，並經常以榮休會長的身份參加執委會，以盡顧問之職責。

參與學會這段時間，從1974至1991年，見證了香港的變化及其從第三世界發展至亞洲四小龍之一與亞洲國際金融中心。於1967年的暴動直接或間接令中文成為香港的兩種法定語文之一，那是1970年代中之後的事；中英有關香港問題的談判使中英互譯變成工作和生活中越來越重要的事。1980年代中，香港只有兩所大學設有翻譯課程，香港大學中文系秉承英國漢學教育傳統，與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和翻譯研究中心有著不同的理念和學習研究方法。中大翻譯系在一定程度上傳承了中國五四文化的傳統，以文學翻譯為主。事實上，以北京與上海為中心的中國翻譯界，五四以來大致上是由作家壟斷，如茅盾、巴金、魯迅及林語堂等，他們把自己心愛的外文著作譯成中文，希望中國讀者能和他們共同享受他們深深喜愛的文學作品，並非純粹為了增加收入。傅雷翻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貝多芬傳》和《托爾斯泰傳》，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傅雷曾嘗試過多種職業，最後才專心翻譯巴爾扎克的著作，那是1949年之後的事，那時他已無田可賣，

要靠翻譯維持生活。至於學者如錢鍾書為甚麼不翻譯古典名著？我相信錢鍾書的興趣太多，他抽不出時間來翻譯，非不能也！

中國大陸五四以來的翻譯傳統偏向文學與人文，香港的翻譯傳統則是殖民的、商業的、生活化的，因此是本土的、實用的。有一次在台北開會，一位留美華裔學者對我有感而說：“香港與台北不同的地方是香港受英國文化影響，有中產階級，有精緻文化；台北缺乏這種中產階級，因此就沒有精緻文化。”這位美籍華裔學者指的是香港的英國統治者、英國商界以及洋化了的華人階層，不是香港一般市民。香港的上層社會的確有些精緻的東西，那是從英國和歐洲帶來的，但95%以上的本土香港人過的是“本土”生活。在香港，英語、英文統治不懂英文英語的95%以上的中國人，因此需要中間人——口頭的及文字翻譯，也因此是殖民地的、商業的、生活化的翻譯。由於英文、英語統治，因此貪污氾濫，直到1970年代中廉政公署成立才逐漸減少貪污。

到1970年代中，人們還能見到過海渡輪上本地政府告示的一些“殖民中文”，那是一些中文不通的政府本地公務員的“傑作”，英國人的上司根本不重視政府指令如何傳達給市民，因此那時的中文告示成為“奇文共賞”的“殖民中文”，也就是古文、粵語、英語語法混雜的怪文，如“沿步路過”、“如要停車，乃可在此”等。到了1980年代，香港政府的“中文主任”數目增加、中文水平也有所提高，情況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各大院校如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中文大學翻譯系和校外進修部、理工學院等均設有翻譯課程，為香港社會各行業培養訓練翻譯人才，香港翻譯學會在翻譯教育和對提高在職翻譯人員等方面貢獻良多。正由於香港的殖民地特點，令香港在商業、金融、工業和貿易等方面的翻譯走在中國大陸和台灣這兩個單語社會的前面，也是自然合理的現象。

如楊曉榮所說，我的《翻譯論集》代序〈重神似不重形似——嚴復

以來的翻譯理論〉象徵了中國本土翻譯理論發展史的結束，那麼香港的翻譯發展形態，在1980及1990年代成為推動中國翻譯理論邁向新階段的催化劑。繼中文大學的翻譯系和翻譯研究中心成立，香港理工學院、香港城市理工學院、嶺南學院、浸會學院（後四所學院於1990年代中升格為大學）及公開大學在1970及1980年代紛紛設立翻譯系和翻譯課程。此外，還有一些私立的大專院校如樹仁大學、恆生商學院、珠海學院等均有翻譯系和翻譯課程。這些翻譯畢業生的就業機會相當廣泛，他們不僅僅可以負責翻譯的工作，還可以以兩文三語的多文化背景來擔任各式各樣的職位。

香港翻譯學會也跟隨着香港社會的變化而調整會務的形式和方向，1970及1980年代會務注重專題演講、研討會、出版論文集等，同時還與中國大陸和台灣翻譯聯繫、合作；1990年代以後，各大學翻譯系、翻譯課程的講座和研討會頻繁，於是學會減少專題演講，但繼續與公眾圖書館合辦翻譯講座，以推廣翻譯知識和興趣。在海峽兩岸三地，地小人多的香港在1970年代初成立全港性的翻譯組織，一如其他專業組織如醫學會、工程師學會、建築師學會、會計師學會、法律學會及大律師公會等。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要到1982年才成立，而台灣要到九十年代才成立翻譯學會。在專上學院的翻譯系和翻譯課程，香港也走在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前面，這說明了殖民地的香港，把處於劣勢的語文和翻譯變成翻譯的優勢，在全方位的翻譯領域上成為大中華的典範。

由1971至1991年這20年，香港的語文和翻譯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 參考文獻

孔慧怡 (2017)，〈宋淇，幾番起落的人生——不帶感傷的回憶之十六〉，《都市文藝》89: 44-48。

- 嶺南大學文學與翻譯研究中心 (1997), 〈賴恬昌——當代作家口述歷史〉, 3月14日, 視頻, [http://Commons.ln.edu.edu.hk/oh\\_cca/18/](http://Commons.ln.edu.edu.hk/oh_cca/18/), Digital Commons@Lingnan University
- 林以亮 (1974), 《林以亮論翻譯》, 台北: 志文出版社。
- (1976), 《紅樓夢西遊記》, 台北: 聯經出版社事業有限公司。
- 劉靖之編 (1981), 《翻譯論集》, 香港: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1981年8月初版; 經三聯書店授權, 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於1989年10月在台北出版, 並於1993年在台北出版了修訂版)。
- 編 (1986), 《翻譯叢論一九八六》, 香港: 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 編 (1987), 《翻譯叢論一九八八》, 香港: 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1987年11月。
- 編 (1991), 《翻譯新論集——香港翻譯學會二十週年紀念文集》, 香港: 商務印書館 (1991年10月初版; 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4月台灣初版)。
- (1991), 《翻譯工作者手冊》, 香港: 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1991年11月初版; 台灣商務印書館, 1993年4月初出版)。
- (2002), 〈翻譯與諾貝爾文學獎——中譯英隨筆〉, 《中國翻譯》23(6): 43-44。
- (2006), 《香港翻譯學會簡史》, 香港: 香港翻譯學會。
- 宋淇編著 (1983), 《翻譯叢論》, 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
- 宋以朗 (2014), 《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 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 香港翻譯學會, 1972-2016, 《譯訊》, 第1期 (1972年8月出版) 至第52期 (2016年10月出版)。
- 楊曉榮編 (2012), 《二元·多元·綜合——翻譯本質與標準研究》, “英漢對比與翻譯研究”之七 (總主編: 楊自儉、王菊泉), 上海: 外語教育出版社, 9月第1版。
- 蔡倡畫廊 (2017), 〈賴恬昌〉, Asian Fine Arts網頁 [http://www.alisan.com.hk/tc/artists\\_detail.php?Id=20](http://www.alisan.com.hk/tc/artists_detail.php?Id=20) (瀏覽日期: 2017年7月30日)。
- 余見英編 (2013), 〈賴恬昌先生著作書目初稿〉 (Yu Fung-ying: <http://www.wykontario.org/index.php/featured-articles/1093-2013-07-13-00-36-47>) (瀏覽日期: 2017年7月30日)。
- Lai, T. C. (ed). 1976. *The Art and Profession of Transla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Asia Foundation.
- Seymour, Richard K., and C.C. Liu (ed.) (1994).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Bridging East and West—Selected Conference Papers*. Honolulu: College of Languages,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Hawaii and The East-West Center.



## 稿約凡例

《翻譯季刊》為香港翻譯學會之學報，歡迎中、英文來稿及翻譯作品（請附原文及作者簡介）。有關翻譯作品及版權問題，請譯者自行處理。

### 一、稿件格式

1. 請以電郵傳送來稿之電腦檔案。
2. 來稿請附200—300字英文論文摘要一則，並請注明：  
（1）作者姓名；（2）任職機構；（3）通訊地址／電話／傳真／電子郵件地址。
3. 來稿均交學者審評，作者應盡量避免在正文、注釋、頁眉等處提及個人身份，鳴謝等資料亦宜於刊登時方附上。
4. 來稿每篇以不少於八千字（約16頁）為宜。

### 二、標點符號

1. 書名及篇名分別用雙尖號（《》）和單尖號（〈〉），雙尖號或單尖號內之書名或篇名同。
2. “ ” 號用作一般引號；‘ ’ 號用作引號內之引號。

### 三、子 目

各段落之大小標題，請依各級子目標明，次序如下：

一、／A．／1．／a．／(1)／(a)

### 四、專有名詞及引文

1. 正文中第一次出現之外文姓名或專有名詞譯名，請附原文全名。
2. 引用原文，連標點計，超出兩行者，請另行抄錄，每行入兩格；凡引原文一段以上者，除每行入兩格外，如第

一段原引文為整段引錄，首行需入四格。

## 五、注 釋

1. 請用尾注。凡屬出版資料者，請移放文末參考資料部份。號碼一律用阿拉伯數目字，並用（）號括上；正文中之注釋號置於標點符號之後。
2. 參考資料  
文末所附之參考資料應包括：（1）作者／編者／譯者；（2）書名、文章題目；（3）出版地；（4）出版社；（5）卷期／出版年月；（6）頁碼等資料，務求詳盡。正文中用括號直接列出作者、年份及頁碼，不另作注。

## 六、版 權

來稿刊登後，版權歸出版者所有，任何轉載，均須出版者同意。

## 七、贈閱本

從 2009 年夏天開始，作者可於 EBSCO 資料庫下載已發表的論文。如有需要，亦可向編輯部申領贈閱本。

## 八、評 審

來稿經本學報編輯委員會審閱後，再以匿名方式送交專家評審，方決定是否採用。

## 九、來稿請寄：[translationquarterly@gmail.com](mailto:translationquarterly@gmail.com)。

## Guidelines for Contributors

1. *Translation Quarterly* is a journal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Contributions, in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should be original, hitherto unpublished, and not being considered for publication elsewhere. Once a submission is accepted, its copyright is transferred to the publisher. Translated articles should be submitted with a copy of the source text and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text author. It is the translator's responsibility to obtain written permission to translate.
2. Abstracts in English of 200–300 words are required. Please attach one to the manuscript, together with your name, address, telephone and fax numbers and email address where applicable.
3. In addition to original articles and book reviews, review articles related to the evaluation or interpretation of a major substantive or methodological issue may also be submitted.
4. Endnotes should be kept to a minimum and typed single-spaced. Page references should be given in parentheses, with the page number(s) following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year of publication. Manuscript styles should be consistent; authors are advised to consult earlier issues for proper formats.
5. Chinese names and book titles in the text should be romanised according to the "modified" Wade-Giles or the pinyin system, and then, where they first appear, followed immediately by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ranslations.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terms obvious to the readers (like *wenxue*), however, are not necessary.

6. There should be a separate reference section containing all the works referred to in the body of the article. Pertinent information should be given on the variety of editors available, as well as the date and place of publication, to facilitate use by the readers.
7. All contributions will be first review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and then anonymously by referees for its suitability for publication in *Translation Quarterly*. Care should be taken by authors to avoid identifying themselves. Submissions written in a language which is not the author's mother-tongue should preferably be checked by a native speaker before submission.
8. Electronic files of contributions should be submitted to [translationquarterly@gmail.com](mailto:translationquarterly@gmail.com).
9. Given the accessibility, from summer 2009, of the journal via the EBSCO database, authors will no longer receive complimentary copies unless special requests are made to the Chief Editors.

## 《翻譯季刊》徵求訂戶啓事

香港翻譯學會出版的《翻譯季刊》是探討翻譯理論與實踐的大型國際性學術刊物，由陳德鴻教授及倪諾誠教授出任主編，學術顧問委員會由多名國際著名翻譯理論家組成。資深學者，如瑞典諾貝爾獎評委馬悅然教授、美國學者奈達博士及英國翻譯家霍克思教授都曾為本刊撰稿。《翻譯季刊》發表中、英文稿件，論文摘要（英文）收入由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編輯的半年刊《翻譯學摘要》。欲訂購的單位或個人，請聯絡：

中文大學出版社

地 址：香港 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中文大學出版社

電 話：+852 3943 9800

傳 真：+852 2603 7355

電 郵：cup-bus@cuhk.edu.hk

網 址：www.chineseupress.com

## Subscribing to *Translation Quarterly*

*Translation Quarterly* is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and is a maj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publication. Its Chief Editors are Professors Leo Tak-hung Chan and Robert Neather, and its Academic Advisory Board is composed of numerous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specialists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field. The journal has previously included contributions from such distinguished scholars as the Swedish Nobel Prize committee judge Professor Göran Malmqvist, the American translation theorist Dr. Eugene A. Nida, and the English translator Professor David Hawkes. *Translation Quarterly* publishes contribution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English abstracts of its articles are included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bstracts*, edited by UMIST, UK. Institutions or individuals who wish to subscribe to the journal should contac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dd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852 3943 9800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bus@cuhk.edu.hk](mailto:cup-bus@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http://www.chineseupress.com)

##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

- Subscriptions are accepted for complete volumes only
- Rates are quoted for one complete volume, four issues per year
- Prepayment is required for all orders
- Orders may be made by check (Payable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Hong Kong or US dollars, or by Visa, MasterCard or American Express in Hong Kong dollars
- Orders are regarded as firm and payments are not refundable
- Rates are subject to alteration without notice

## ➤ Orders and requests for information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852 3943 9800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bus@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Fax: +852 2603 7355**

**Order Form**

Please enter my subscription to

*Translation Quarterly*, beginning with No.87 to 90(2018).

Subscription and order	Rates
1 year	<input type="checkbox"/> HK\$624 / US\$80
2 years*	<input type="checkbox"/> HK\$1,123 / US\$144
3 years**	<input type="checkbox"/> HK\$1,498 / US\$192
Back issues (No.1 to No.86)	<input type="checkbox"/> HK\$180 / US\$23 each (Please list issue no. _____, total _____ issues.)

Please circle your choice.

Prices are at discount rate, delivery charge by surface post included.

\* 10% discount.

\*\* 20% discount.

☐ Attached is a check in HK\$ / US\$\* \_\_\_\_\_ made payable to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ircle where appropriate)

☐ Please debit my credit card account HK\$ \_\_\_\_\_. (Please convert at US\$1 = HK\$7.8)

I would like to pay my order(s) by: ☐ AMEX ☐ VISA ☐ MASTER CARD

Card No. (including the 3-digit security code): \_\_\_\_\_

Expiry Date: \_\_\_\_\_

Cardholder's Name: \_\_\_\_\_

Cardholder's Signature: \_\_\_\_\_

Please send my journal to: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Telephone: \_\_\_\_\_ Fax: \_\_\_\_\_ E-mail: \_\_\_\_\_

Ref: 20140402



中文大学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www.chineseupress.com  
HONG KONG, CHIN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Hong Kong  
Tel.: +852 3943 9800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bus@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